



1. 南正 M7: 22 陶狗 (3)



2. 岩上墓葬 M46 陶猪圈



3. 岩上 M19 铜带钩



6. 新街 M7 镏金手镯



5. 皇后台 M1: 6 瓷瓶



4. 六间房 M6: 1 青花粉彩花蝶罐

国家体育馆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文物研究所



2. 银簪



3. 珠子



1. 釉瓷瓮



4. 玻璃瓶

北京文博

博
初
題

目 录

2006年第4期(总46期)

文物工作

恢复御河原貌与皇城传统文化理念的发掘及保护 孔繁峙(5)

博物馆学

北京博物馆学会奋进与丰收的十年 马希桂(17)

博物馆图书资料数字化的途径 周 丹(23)

关于异地展览的几点思考 蒋 潇 王鹏远(26)

考古简报

国家体育馆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31)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工作圆满结束
..... 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40)

平谷区王辛庄镇西杏园村北的汉代窑址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平谷区文物管理所(43)

文物研究

浅谈新石器时代鸟类形玉器 虞海燕(46)

从出土文物看东周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联系 胡传耸(5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元代铜权 王燕玲(56)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婚俗文书举要 李彩萍(65)

北京史地

北京地区长城概述 张展(72)

北京先农坛的建筑组群布局与坛内诸神 董纪平(80)

阮旻锡及其《燕山纪游》考 车萍萍(85)

文物保护

空调系统造成的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与对策 刘树林 刘恩迪(91)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2006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杨康明(95)

《北京文博》2006年总目录 (98)

封面:北京先农神坛

封底:北京先农坛具服殿

封二、彩插一:北京市宣传贯彻《长城保护条例》大会在八达岭召开

彩插二、三: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工作圆满结束

彩插四:国家体育馆墓葬发掘简报

封三: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续八)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任:宿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平 马法柱 王丹江 王玉伟 巴爱民 刘建业 刘超英 杨玲 张展

宋大川 陈平 陈旭 吴梦麟 姚安 赵其昌 晋宏逵 徐伟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舒小峰 韩永 韩扬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敏

主编:张展 副主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韩建识 陈倩 高智伟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L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4, 2006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Restore Royal River to Original Appearance and Excavate Opinion of and Prevent Imperial City
Conventional Culture *by Kong Fanzhi*(5)

MUSEOLOGY

Ten-Year Advance and Success of Beijing Museum Association *by Ma Xigui*(17)
Approach to Digitization of Books Materials in Museum *by Zhou Dan*(23)
Some Consideration on Long-Distance Exhibition *by Jiang Xiao, Wang Pengyuan*(26)

ARCHEOLOGICAL REPORT

Excavation Report on National Gymnasium Tombs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31)
Successful Close of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 Work of Diverting Water from South to North 1st
Stage Project in Beijing ... *by Diverting Water from South to North Archeological Team*(40)
Kiln of Han Dynasty in North of Xixingyuan Village Wangxin Zhuang Town in Pinggu District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Pinggu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43)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On Bird-Shape Jewellery in Neolithic Age *by Yu Haiyan*(46)

- Research on Relation of Yan Culture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and Yuhuang Temple Culture by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by Hu Chuansong(53)
- Bronze Weight in Yuan Dynasty Stored i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by Wang Yanling(56)
- Essentials of Marriage Custom Documents Stored in Beijing Folk Custom Museum by Li Caiping(65)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General Survey of Great Wall in Beijing by Zhang Zhan(72)
- Building Group Layout and All Gods in the Beijing Xiannong by Dong Jiping(80)
- Study on Ruan Minxi and His Works *Records of Traveling on Yan Mountain* by Che Pingping(85)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 Microorganism Pollution to Indoor Air Caused by Air-Conditioner System and Countermeasure by Liu Shulin, Liu Endi(91)

DATA AND INFORMATION

-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3rd Quarter of 2006) by Yang Kangming(95)
-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in 2006 (98)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ü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Ba Aimin,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Yang Ling, Zhang Zhan,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Wu Menglin, Yao An, Zhao Qichang, Jin Hongkui, Xu Wei, Gao Kajun, Guo Xiaoling, Cui Guomi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Vice-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yahoo.com.cn

恢复御河原貌与

皇城传统文化理念的发掘及保护

孔繁峙

最近,东城区已开始对皇城北部历史上的御河水系故道进行改造,整治这一区域的环境,搬迁占压河道的住户,清除填埋河道的渣土,重现河道的历史遗迹。这是我市实施历史名城和皇城保护规划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继皇城根遗址、菖蒲河遗址整治之后的又一项意义重大的名城保护工程,必将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流经皇城内外的御河,是元代于大都城内开凿的一条重要的城市供水及漕运水道。历史上在其流经的皇城内分布有众多的寺庙、府邸、商家店铺、四合院等,构成一道具有老北京特色的古典园林、皇宫府第、百姓民居相互交融的历史风景线。只是民国以后,随着皇城墙的拆除,城市供水方式的改变,御河才逐渐废弃填平,以后又在其故道遗址之上,逐步形成了未经规划的百姓民居。由此可见,御河流经的皇城内区域,应当是一条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和浓郁古都风貌的重要区域,这既表明了御河这一区域的历史功能和性质,也反映出了它的传统景观和文化特色。这项工程的目标,正是通过恢复御河后门桥至北河沿地段的水系

及两侧环境的整治,搬迁拆除故道遗址上的杂乱民居,清除填埋的堆积物,恢复并形成御河故道的历史水系与古都传统建筑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风貌。

一、御河故道传统景观及文化特色的恢复

皇城御河,是北京城内历史上的一条重要水系,它与北京城的形成、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放弃了当时的金中都旧城,向东北转移,另建新的都城——大都城。由于水源是城市存在的基础,所以,元大都的选址与最终确定,是与当时金中都北侧被称为白莲潭(后称积水潭)的宽阔水面和丰富的水源分不开的。大都城的设计与营建,完全是以白莲潭为中心进行的,将整个潭面,包括太液池在内,都围括在大都城内,这一规划思路,除使城市的发展具有了充实的水源外,还使得元朝北方的经济命脉——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终点码头处于大都城的中心。《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

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精通天文历法和水利工程的大科学家郭守敬精心设计、组织实施,引白浮泉水入积水潭,使积水潭水量大增,进而开凿通往大运河的河道,这一工程,经万宁桥向东南方向,经元皇城东侧向东南方向出城直通张家湾与南北大运河直接沟通,使积水潭成为元代漕运终点。这一重大水利工程,对元代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漕运河道,使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直达大都城内,使积水潭周边区域成为元大都最繁华的经济中心。据《燕京杂咏》描述:开通漕运河道以后,积水潭周边及钟鼓楼一带,商贸发达,万商云集,“南风吹到运粮船,万斛香粳倍上年”,使通惠河及积水潭里“舳舻蔽天、粮船万千”,场面十分壮观。

由此可见,北御河应该是一条北京城市赖以生存的、有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古老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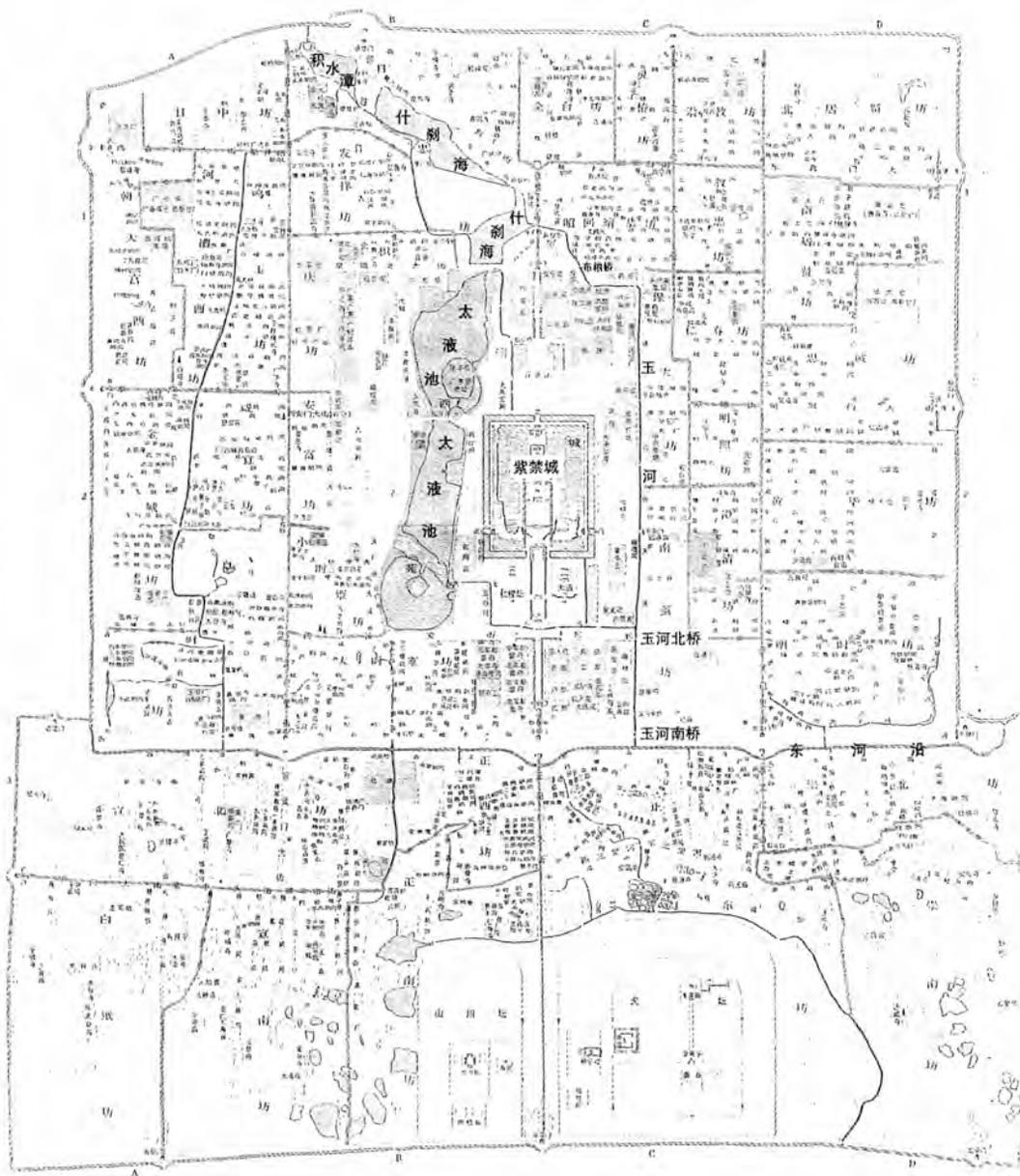
1. 整治工程应再现御河的古老历史与文化。御河在北京城市建设、政治、文化及水利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开展的北御河整治工程,不仅关系到北京历史名城及皇城保护的问题,同时,还必然涉及到元代以来通惠河的发展历史与传统文化。因此,在北御河整治工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下两项重要内容:

一是,应把发掘和展示通惠河这一古都历史上伟大水利工程的悠久历史做为一项重要内容。根据《通惠河志》记载,元建大都城后,粮赋供给仍仰仗江南,朝廷十分重视漕运的作用,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上奏说:“都邑乃四海会同之地,贡赋之人,非漕不可,若由陆路运,民力惫矣”,建议“易穿凿河漕,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至达,诚国家永久之力”,元世祖忽必烈遂下令修建和整治南北运河的各段。到至元二十八年,京杭运河南自杭州向北已达通州,加上由海运到达的一百三十万石漕粮,都集中在通州等待往大都城运送。但是,通州至大都城的五十余里路

程,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因道路不平,每到雨季“驴畜死者不可胜计”。元代的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详细勘察了大都的水资源状况和周围地形的特点后,提出了修建通惠河的宏伟规划。至元二十九年春季开工,至元三十年秋季竣工并使用,当江南的粮船成队地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时,舳舻蔽水,盛况空前。元世祖忽必烈特为此河道赐名为通惠河。据北京水利专家段天顺先生研究考证,元代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浮泉,下至通州李二寺河口,全长164里,大体可分为四部分:一是白浮瓮山引水工程,起自昌平凤山下的白浮泉,至瓮山泊(今昆明湖),长约60里,完全是人工修建的引水渠,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其工程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据《元一统志》记载,引水渠沿线曾汇聚了王家山、两虎眼、一亩泉、马眼泉等诸泉,特别是在沿泉水与河渠交叉处,修建了防止洪水沿河道下泄,确保城市安全的“清水口”工程12处,解决了引水与汛期防洪的矛盾。二是,整治扩建瓮山泊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在进水口和出水口建有水闸,便于控制水的流量,瓮山泊也就成为北京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水库。三是,在通航河道上修建闸坝工程。元代通惠河自瓮山泊以下,经长河、高粱河汇入积水潭,然后从万宁桥(后门桥)流向东南,经今东不压桥入皇城,由北河沿、南河沿,向城东南出东便门,沿今通惠河至通州。由于北京地区西高东低,坡度过陡(东西高差二十余米)使河水无法缓流,为使河道保持一定水位便于行船,郭守敬沿河道修建了船闸11处,共24座。从上游至北运河口修建船闸的顺序是:万寿寺的广源闸2座,高粱桥的西城闸2座,德胜门的朝宗闸2座,万宁桥的澄清闸3座,其上闸在万宁桥下,中、下闸在东步粮桥胡同和北河胡同,在今台基厂的文明闸2座,在今船板胡同的魏村闸2座,在东便门外的庆丰闸2座,在今高碑店的平津闸3座,在老龙背村的普济闸2座,在今通州新华大街的通州闸2座等,以保证河道的水量和行船。四是,

明北京城

万历——崇祯年间(公元 1573—1644 年)



(引自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

通惠河与白河的衔接工程,利用地势,减少白河与通惠河的比降,可使船队从白河直接驶入通惠河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使粮赋的漕运工程获得巨大成功。终元一代,通惠河始终是北方及大都城的生活及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元末明初定都北京以前的几十年间,由于缺少维护,致使通惠河部分河段湮废,沿线屡遭水害,《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记载:“永乐四年八月癸卯,北京刑部言:宛平、昌平二县,西湖景(昆明湖)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堤岸百六十丈,命发军民所治”;《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又记载:“永乐五年五月丁卯,北京刑部言:‘自西湖景东至通州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请以民丁二十万,官给费用所治’。命以运粮军士竣道,其置闸俟更议。未几,闸俱埋,不复通舟”。可见通惠河在明代初期,由于疏于管理维护已近于荒废。

明永乐决定建都北京,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修建北京城的同时,十分重视对通惠河的治理,在元代通惠河固有河道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城的修建,对原漕运河道进行了两项重大调整:一是利用新建的环经北京城的宽大护城河,将元代直达积水潭的运粮码头调至东便门的大通桥下,因此,明代通惠河又有大通河之称,并在朝阳门内修建了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大型粮仓,同时,新开通了正阳门南三里河至张家湾的河道。二是将元代积水潭、玉河及城内河道修建为城内的供水河道,并结合城市中轴建筑的确定,在元代故道上重新修建了万宁桥,外护东皇城墙,将流经皇城外侧的河道变为皇城内侧的一条御河,同时修建“东不粮桥”,使漕运粮船失去了通航的可能(成为不能运粮之桥)。《明宪宗实录》行水金监卷一百一十有详实记载:“上以命鼎、毅遂同参将袁佑等,亲诣昌平县元人引水去处,及宛平、大兴、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将行船古迹,逐一踏勘。及据元史,并各闸见树碑文,

所载事迹,稽考回奏。云,闸河原有旧闸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船得进入城内海子湾泊。今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难循故道。行船须用从宜改图。……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张家湾运河口,袤延六十余里,旧无河源。正统间因修城壕,做坝蓄水,兼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濠口三里至八里,始接运河旧渠,两岸多人家庐舍坟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旧河,入张家湾白河。”又据《明熹宗实录》行水金监卷一百三十记载:“十月辛巳,浚京城壕成。自东便、朝阳、东直、安定、德胜、西直、阜城、西便、正阳九门及重城,共用夫一百五十万八百九十名,匠一千二百八十九名,班军积日三万三千十二名……,监工科道魏大忠等,因言壕之源出玉泉山,经高粱桥,抵京城西北而派为二:一循城之左而东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而东,宜按旧闸之地形高下,次第布之,……德胜门之水南入关,周行大内,出御河,近且北淤南壅。而嘉靖庚戌修筑重城,地势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俟异日清其源,审其势,疏其脉,达其支,以总汇于大通桥。又须理葺诸闸,节宣蓄泄,以壮金汤而固风气”。明、清两代,积水潭至东便门大通桥段的通惠河道,只发挥其为城市供水、排水的功能。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化城市的供水、排水方式的改进与发展,自积水潭南流七百余年的御河,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了,这次开展的御河整治工程,应刻意恢复和展示御河形成的历史内涵。

二是恢复北御河历史的传统文化特色。自元代开凿通惠河后,引自白浮、瓮山泊之泉水,经高粱河,入和义门北水关,注积水潭,下万宁桥,绕皇城,向东流至通州运河,使漕运船队直达城内积水潭,带来了元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御河沿岸和积水潭周围分布的寺庙、店铺、商肆、作坊比比皆是,贸易发达。由于地处皇宫一侧,人文活动频繁,聚集于此的一批文人名士留下了很多著名诗篇,颂扬了通惠河的宏伟规模,反映了

通惠河流域及周围环境的经济、文化繁荣景象。《长安客话》卷六记载曹代萧诗“霏甍烟光上苑通,紫泉缭绕御河东。梯航万里随风入,遥见云开五色中”,形容了航船在通惠河上行驶的盛大场面。《长安客话》卷六刊载元马祖常形容通惠河的诗曰:“天下名山护此邦,水经曾见注高粱。一觞清浅出昌邑,几折萦回朝帝乡。和义门前通辇路,广寒宫外接天潢。小舟最爱南熏里,杨柳芙蓉纳晚凉”。诗人马祖常在《御沟春日》诗中,对御河的景象给予了更为深刻的描述:“御沟流水晓潺潺,直似长虹曲所环。流入宫墙才咫尺,便分天上与人间”。反映了元代皇城内外不同的景致及特色。

明初,北京城北垣南移,漕粮水道东移城外,御河及积水潭等原有河道及周围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此段从历史上的漕运水道逐渐变成市内景色秀丽、寺庙民居环绕的风景胜地,在河道两侧分布有药王庙、御河庵及数十条胡同街巷。御河内流水清澈见底,两岸古槐浓郁,高柳垂水,不少的高官贵族、巨商大贾汇集于此,但更多的还是沿河而居的平民百姓,河道两侧逐渐形成了许多或横平竖直,或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成为京城内一处以百姓为主,商贾权贵、名人雅士共居的区域,有着浓厚的市井民俗。御河南段流入皇城之内的皇家禁地,绕东皇城根南流与金水河相汇,是一派红墙绿树、小桥庭院的皇家气派。到清代,皇城的皇家禁地被打破,在南、北河沿逐渐形成民居宅院,成为百姓生活居住的市井民居。随着时光岁月的推移,数百年来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传统胡同、四合院市井生活环境形成的民情民俗与御河的人文景观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御河区域内历史的传统文化特色。这一特有的历史区域传统环境经清末和民国时期虽已衰落,尤其是有特色的传统建筑由于长年失修而衰败,但是,时至今日这一区域的历史风貌仍然依稀可见。

不难看出,御河是一条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古代人工运河和古都城市

的供水设施,与北京城历史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因此,为有效保护和展示御河故道与古都城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目前对御河所开展的环境治理工程的总体规划原则,应该是整治、保护、恢复发展:

关于整治,主要是指整治北御河流经区域的总体环境。从历史上看,北御河是40年代以后逐渐废弃、填埋河道而成为居住区域,由于这些房屋是搭建在御河故道和堤岸上,除房屋院落布局无规则外,很多房屋基础不实,质量普遍较差,加之多年失修和居住人口的骤增,已成为房屋破旧、居住拥挤、生活条件恶劣的区域。据统计,在御河故道所建的各类房屋600余间,住户达400余户。这次整治工程,在搬迁占压河道的住户后,将拆除全部杂乱建筑,清挖河道的填埋物,显露出历史上的御河故道及泊岸。

关于保护,主要是在整治工程中,保护这一区域内的文物建筑和有价值的四合院建筑。在清理工程中,尤其要保护好历史上著名的东不粮桥(东不压桥),和元、明、清时期所建的河闸、桥基、堤岸砌石及皇城墙基等历史遗迹。

关于恢复和发展,是指整治工程要以恢复御河及这一区域的原有面貌为目的,最大限度地体现御河的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又要结合北御河及这一区域的现状及功能,在保持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体现出现代的需求,根据开放、利用、展示的需要将沿河道路、堤岸防护等传统工艺技法及两侧建筑型制与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保护、恢复与继承、传统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能使上述原则在整治的工程中得以体现,在工程实施中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采用科学的考古发掘方式开展御河故道的清理工作。为再现御河故道的原貌,河道填埋物的清理应与考古发掘相结合,运用科学的考古发掘方式,首先确定河道堤岸的准确位置和历史遗迹,在几个重要地段,通过开展大面积的考古发掘,确定御河在元、明、清各时代的宽度和泊岸的工程

做法及时代变化;然后,集中发掘清理著名的“东不压桥”(东步粮桥)遗址和皇城北城墙遗址,寻找和发掘元代文献中记载的澄清闸遗址,保护好残存的河闸遗迹等,在开放的御河公园中保护和展示发掘出土的各类建筑遗迹。

二是,保护好御河两侧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持其传统格局的完整性。据现场调查,在此项工程范围内,分布有普查登记的文物单位5处,如华严寺、火神庙、玉河庵等,同时还发现保存现状较好并具有保留价值的传统四合院建筑18处。这类建筑都应原地原状加以保留,经过环境整治和部分修复后,可与这一区域的寺庙、胡同、传统民居共同再现御河两岸的民俗文化与风貌特色。

三是,要分段处理北御河两侧的景观效果。因时代的变迁和御河使用功能的变化,御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段的文化特点曾有着很大差异,如御河自万宁桥(后门桥)至平安大街段,其两岸的建筑特点及区域性,主要是体现和代表了元代以来的市井民俗,而平安大街以南的河段,则处于明清皇城范围以内,这一区域的两岸景观,应突出明清时代皇城内的局、署等四合院建筑的传统特色。

四是,御河两岸的建筑风格应与两侧历史街区的胡同街巷紧密结合。在御河故道上的杂乱建筑拆除后,两岸新恢复的临水建筑将是御河景观建筑的第一个层面,这类传统建筑的型制与格局,应充分考虑到历史上皇城内外的区域差别,尽量恢复和保持不同区域传统建筑的风貌特点。从两侧再向外延伸并与之相连的众多胡同、街巷及四合院建筑,应是御河两岸景观建筑的第二个层面。在规划建设上,要保持两个层面建筑的和谐与联系,使御河两岸新恢复的景观建筑与两侧的历史街区在形制上有机结合,这样,可使御河两岸分布的文物古迹、文化遗存和各类传统建筑构成一个个既有着凝重的立体感、又有着丰富层面的北京文化的景观系列。为进一步突出后门桥的影响及景观效果,可将后门桥两侧建筑的恢复与什刹

海宽大的水面空间景观联系起来,使这一区域的景观效果得以丰富和扩大,从而大大加强御河景观的整体效果。

二、皇城传统文化理念的发掘与保护

1. 明清皇城的历史功能与传统特色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阶级产生的突出标志,而城市的建设和布局就是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在我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发展史上,皇城的确立和建设,始终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为主导,在全城建设的布局中,皇城始终占据都城的核心位置。考古成果表明,在辽代的南京城和金代的中都城以及元代的大都城的建设中,都将皇城置于全城的重要位置,环其四周营造都城的城墙与城门。明代北京城在规划建设之初就确定了都城与皇城的关系,北京城的主体建制仍是以宫城、太庙、社稷坛、中央官署组成的皇城为核心,并在元大都城墙的基础上修建了外廓城,明清的皇城同宫城(紫禁城)在都城的总体布局上是有机联系为一体的。皇城的整体规划与建设,是封建社会的礼制法度与我国千百年传统建筑艺术的有机结合,其完美的规划布局,壮观的建筑造型和高超的建筑艺术以及威严宏伟的气势,使得封建帝王的至尊地位十分突出。明清两朝的中央管理体制是帝王独尊、内阁参政、朝臣辅佐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即皇帝、内阁、六部、五府组成的皇权专制的统治体制。而皇城的规划建设正是适应了这种封建专制体制的需要,建设布局上,皇城从四面围绕紫禁城,在红墙的东、西、南、北四面各辟一门,为突出皇城正南门的地位与作用,在承天门(天安门)南设立了大明门(清朝又在承天门前的东、西两侧分别增建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及围墙),将王朝最高统治机构的部、署、衙门分别布置在大明门(大清门)至承天门中轴线的两侧,其左侧布置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朝廷部门;右侧布置朝廷的最高军事管理部门——前、后、左、

右、中五军都督府。这种将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六部五府集中设置在皇城南侧的“左文右武”的布局方式,不但使皇帝的至尊地位更为突出,而且还使皇宫的内廷、外朝与皇城的气势一脉相连,加重了皇城的地位与威严,充分体现了明清两朝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

在皇城以内紫禁城之外,除分布有左祖、右社、三海(西苑)东苑、景山、大高玄殿等御园及皇家宗教建筑外,还设置了一整套直属皇家内府管理的、为皇宫服务的大型机构及大批建筑——明朝内府分设的十二监、八局、四司,即二十四衙门。这套内府机构门类众多、设置庞杂,如十二监:设有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设有: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设有: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全面负责皇家的宫殿、御苑陵墓的营造、辇轿管理、“圣训”的记载、“实录”、“玉牒”的收藏、宫廷祀典礼仪诰敕、印信的掌管以及宫中服饰、用具、饮食的制作、储藏与供给等等。如此庞大的机构,众多衙门的用地与建筑,大都设立在皇城之内的东南、东北、西北等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堂所、作坊、仓房等院落,其功能是向宫廷和帝王统治提供各种服务、制作与管理。

2. 明清皇城功能的演变与发展

明代皇城为“外人不得入”的皇家禁地,是一座专为宫廷提供防卫和各种服务的皇宫的外围城。满清入关以后,仍将紫禁城做为皇宫继续使用,但皇城的管理、服务功能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允许八旗的部分人员在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城门内居住,并把明朝设在皇城内的部分官府衙门、厂局改建为王府和民居宅院,同时,在皇城内修建了一批寺庙。清朝初期,还在明代的基础上将为皇宫的服务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在皇城内重新设置了负责宫禁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共设立七司三院(苑)。七司有:广储

司,掌内府库藏,领银、皮、瓷、缎、衣、茶六库;都虞司,掌内务府武职官铨选及畋渔之事;掌仪司,掌内廷礼乐及考核太监品级;会计司,掌内府帑项出纳及庄园地亩之事;营造司,掌宫廷修缮工程;庆丰司,掌牛羊畜牧之事;慎刑司,掌审谳上三旗刑狱案件。三院(苑)有:上驷院,掌御用马匹等;武备院,掌管制造器械;奉宸苑,掌景山、三海、南苑等处的管理等。可见,皇城的原有功能仍继续保留。

清朝中期曾对皇城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及部分扩展,据《国朝宫史》记载:“皇城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明清皇城进入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皇城也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皇宫禁地被彻底打破。为了城市的发展和解决城内的交通问题,当时的民国政府对皇城的改造利用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对原封闭的皇城墙进行拆除和改造:根据《燕都丛考·城池篇》的记述:自民国元年以后的十六年间,先后拆除了长安左、右门,东、西、北三面皇城墙和城门,于皇城南墙新辟南池子门、南长街门和新华门等。二是将皇城内的各类衙署、作坊、仓房改造为民居宅院、胡同、街巷,逐步成为百姓的居住区域。三是将紫禁城、太庙、社稷坛、北海等皇宫御苑辟为国人参观游览的场所。在中山公园的石碑上铭刻着民国十四年发生在皇城内的这一重大变化:“民国肇兴,与天下更始。中央政府即于西苑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而皇城宅中,宫墙障塞,乃开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为东西两长街,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巨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因当地九街之中,名曰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西趋西华门,俾游三

海及古物陈列所(故宫)者,跬步可达。西拓缭垣,收织女桥御河于园内,南流东注,迤邐以出皇城,撤西南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燕都丛考》也记述了当时的景象:“社稷坛自民国三年朱启铃长内务时代,改为公园,辟门于南,名曰中央公园,是为北平公园之始。嗣后先农坛公园、北海公园等继之,而终不如中央公园之地位适中,故游人亦甲于他处。春夏之交,百花怒放,牡丹芍药,锦绣成堆。每当夕阳初下,微风扇凉,品茗赌棋,四座俱满。”

由此可见,自明朝以来,北京皇城的使用功能及性质曾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在明朝,皇城整体上是专为宫廷服务的皇宫“外围城”,是封建等级制严格的皇家禁地。到清代初期,皇城的使用性质有所调整,将皇城的东、西、北三门的一定区域,安排了部分旗人居住,此外还在皇城内修建了一批寺院、天主教堂等建筑;清中期,重建了皇城城墙,同时,增筑了长安左、右门及围墙,加重了皇城南门(天安门)在全城的作用及社会影响力。总体上看,清代的皇城已从明朝纯为宫廷服务的“单一”功能,发展为服务、居住、宗教活动等多种功能。随着民国的成立和中国封建帝制的消亡,皇城的使用功能也发生了性质上的彻底变化:首先是明清两朝延续500余年历史的紫禁城、景山、三海等御苑都先后辟为国人游览的公园;设于皇城内专为宫廷服务的七司三院,全部改为百姓居住的民居、四合院,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出现和形成了胡同、街巷等;一批近代建筑如京师大学堂、北大红楼、地质馆等院校和圣心、佑贞等教会学校也先后建于皇城之内,特别是民国初期将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及城门彻底拆除后,使人感到,皇城与内城融为一体,历史上的皇城似乎已经消失了。至今,明清皇城给人们的印象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一座具有独特形制的历史建筑及地域概念了。

3. 皇城传统文化的时代特色

紫禁城在明清两朝始终是封建帝王对

全国的统治中心,在其整体建设布局上,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意识得以充分体现,规模宏大的皇宫建筑群坐落在皇城及全城建筑的中轴线上,具有完美的布局形式和高超的建筑艺术。为突出其重要地位,在皇宫前两侧按“左祖右社”建了太庙和社稷坛,在皇城前“千步廊”两侧设置了“六部五府”等衙署,高度集中了统率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这种独特的布局思路,充分体现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主题思想和皇权高于一切的建筑规制,以及封建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适应和满足封建帝王实施统治(前朝)、生活(后宫)、游乐(御苑)等方面的需要。皇城内各类宫殿建筑,至今仍能展现明清时期那种博大恢弘、巍峨壮观的皇家气派,具有历史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反映了明清时期封建帝王主宰一切的时代观念,使世人仍能领略到封建皇权的威严。

按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皇城内设置的庞大的内府体系管理机构,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文化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明朝在皇城的内府机构分设十二监、八局、四司共二十四个衙门,清承明制,其内府机构设有七司三院。明清内府各衙门其下所属更是分门别类,系统庞大而繁杂,设官分职,照章运作,保证朝廷的统治及皇家生活的各种需要,体现了封建君主专制机构内传统的等级管理秩序。

随着清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壮大,皇城内使用功能的不断增加,清代皇城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多种文化相融汇的局面:

一是,皇城内出现了民居建筑区域,与明代不同,清代皇城的东安、西安、地安三门内均允许居民迁入居住。前明内府各衙署所在地,大部转变为民居胡同、街巷,如内官监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惜薪司胡同等,特别是地安门内以东等地已逐渐形成大面积的民居宅院,大量的居民已在皇城内居住。

二是,在皇城内修建了一批佛教寺院,使佛教文化开始在皇城内传播。据有关史

料记载,明代曾在皇城内建有皇家专用的道教庙宇——大高玄殿,清代初期开始陆续在皇城内修建一批佛教寺庙,如清顺治八年(1651年)在皇城南河沿敕建普胜寺;康熙二十年(1681年)建万寿兴隆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将清睿亲王府改建成玛哈密噶喇庙,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重新修葺扩建,后将该寺赐名为“普渡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建静默寺;清雍正六年(1728年)敕建宣仁庙,俗名风神庙,以祀风神;雍正八年(1730年)敕建凝和庙,俗名云神庙,以祀云神;雍正十年(1732年)于北长街敕建昭显庙,俗名雷神庙,以祀雷神;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明代番经厂和汉经厂的遗址上,修建了法渊寺、嵩祝寺和智珠寺等寺庙,这些环绕紫禁城修建的佛教寺庙,说明皇城内的佛教活动已十分盛行。

三是,在皇城内出现了西方的天主教等教堂建筑,西方的文化已在皇城内产生影响。据《燕京开启略》等文献的记载:在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及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由于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一批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而受到朝廷的礼遇,清康熙皇帝十分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并为当时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创造和提供条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在皇城西安门内为法国耶稣会建“救世堂”一所;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康熙帝批准,在皇城内的蚕池口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清政府还在1886年将原建于西苑附近的北堂迁建至皇城西安门内西什库,称为“西什库教堂”,迁建后的北堂,还建有修道院、修女院等一批附属建筑,成为北京最大的教堂。此外,在康雍年间,还在北京城内重建和创建了南堂、西堂及东正教的圣玛利教堂。在皇城内出现的西方天主教等教堂建筑,应当被看做是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及清代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教堂的传教活动,在清代的皇城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并开始产生其独特的影响。

四是,在皇城内出现了新型的学堂建筑,使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在皇城禁地得到发展。清代后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维新潮流的推动下,清政府被迫改革以往封建式的传统教育,学习和采纳西方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内容。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皇城内修建了京师大学堂,设立分科大学。1918年在皇城内建立了北大红楼、北大地质馆,为北京大学的主体教学建筑,又先后在北河沿建设了一批二层西式教学楼,设立译文馆。1928年法国教会所属的仁爱遣使会,在北海北侧的皇城内建立了圣心中学和佑贞女中。1929年在北海西岸兴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等。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清代皇城已从明代的皇家禁地变为局部“解禁”的开放区域,其功能也从明代单一为宫廷服务的皇宫“外院”,变化为内府的衙署机构与民居宅院相混杂的区域,特别是一批佛教寺院、西方天主教堂和近代学堂等建筑的出现,使皇城最终成为多种功能并存及皇家文化、市井民俗、佛教场所、西方传教活动、文化教育等多种文化相融汇的独具特色的区域。

4. 关于皇城历史文化保护中的几个关系

一是,皇城内明清两朝的历史建筑及遗存的关系。皇城自建成500余年来,保存了明清不同时期及不同形制的各类建筑,这些历史遗存,反映了皇城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及时代特色。从目前皇城的整体状况看,尽管是不同时期的建筑种类繁多,但是,明朝的建筑及遗存,仍是构成皇城的主体内容和整体框架:皇城的核心内容——紫禁城,基本上保持了明代的整体格局和建筑式制,其建筑宏伟庄严不减当年;分布于皇宫前面的“左祖右社”、西侧的“三海”(西内)、北侧的大高玄殿、景山、东侧的皇史宬等当初的建筑,仍完整地保持着明朝的历史面貌;皇城现存四面的城墙及遗迹,仍是明朝皇城的原有范围,特别是保留至今的天安门两侧的皇城南侧城墙及部分西墙,基本是明朝初期的原有建筑。东皇城根地区开展的大规模

住户搬迁、环境改造工程,发掘和展示了明代皇城东侧城墙的历史遗迹,确认了明代皇城东墙的位置和走向,菖蒲河地区的环境整治改造,初步恢复了明代皇城的局部历史景观。非常明显,明朝的历史建筑是以皇宫御苑等皇家建筑为主,在现今皇城内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清朝基本上完整地继承和使用了明朝的皇宫及御苑的规制,并在顺治和乾隆时期增建了北海的白塔和在景山五峰上添建五亭,使两处御园的景致更为完美。但从总体看,清朝在皇城内的建筑,多以寺庙、宅院等民俗建筑为主,主要是分布在紫禁城周围的宣仁庙、凝和庙、昭显庙、普渡寺、福佑寺、嵩祝寺、智珠寺、万寿兴隆寺、静默寺等建于清中期以前的寺院。此外,清代初期以来逐渐建设了大量的四合院建筑,在皇城的东、西、北三门内所分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等历史街巷,大都保持着清代的建筑格局。

从皇城内历史建筑的整体景观效果看,明清两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既有时代的延续性,又有各自的时代特色。气势宏伟的明代紫禁城等皇宫、御苑建筑群,代表了中国历史建筑等级和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紫禁城之外的传统寺庙、胡同、街巷、四合院等民居建筑,体现了老北京市井民俗的传统气息,有着丰富的都城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是大片平缓的传统街巷、四合院建筑,青砖灰瓦,朴素典雅,其本身就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同时,它又作为紫禁城皇宫外围的建筑衬托,对故宫、景山等皇家建筑群的周边环境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由此可见,明清两个时代的建筑,在皇城内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二是,皇城内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与传统文化特色的展示。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消亡,皇城内各类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皇城东、西、北三面城墙被拆除,昔日的皇宫御园都先后做为“古迹”和公园向国人开放;皇城内大量传统建筑被社会所占用,原内务府的

各类衙署建筑辟为民居宅院,各类寺庙为学校、医院、机关所占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不合理的使用方式,不仅对皇城内的各类历史建筑造成了严重的损坏,而且影响了其社会价值的发挥。近年来,随着皇城整体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皇城内的各类历史建筑,已引起人们对其价值的关注与思考:

关于衙署建筑,因用于宫廷的服务管理机构,明清时期多分布于紫禁城外的东、西两侧和皇城的东北区域,至今在黄化(瓦)门等地区,还依稀可见历史上的胡同、四合院等原有格局。其中在景山西侧陟山门街的按院胡同,还较完整地保留了一处清代内务府衙门以及为皇宫供冰的“雪池冰窑”等建筑,目前都为住户和单位所长期占用。这类建筑,反映了明清时代封建官僚机构中的等级制度,是皇城历史建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其历史的时代特色。

关于佛教建筑,皇城内除明代所建的道教庙宇——大高玄殿外,以清康熙时期所建的佛教寺庙为最多,其庙宇都环绕于紫禁城周围。在规划布局上,还特别将传统祭祀风、云、雷、雨四神的——宣仁庙、凝和庙、昭显庙、福佑寺等庙宇,分别建于临近宫城的东、西两侧,这种布局方式,显然是把紫禁城比做众神护卫的宇宙中心,更加重了皇权至上、天子至尊的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和皇宫的建筑气派。尤其使人关注的,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皇城内为蒙古活佛章嘉胡图克图所建的来驻地和佛教场所——嵩祝寺和智珠寺,充分体现了清政府为国家安定及民族和睦而对少数民族首领给予的高度关注。

关于民居四合院,皇城内出现民居宅院最早从清初开始,先是允许旗人在皇城的东、西、北三门内居住,后将前明设于皇城内的二十四衙门所属的大部分房屋转为民居,使民宅逐渐形成胡同、街巷相连的民居区域。到清代末期,皇城的东、西、北三门内的较大区域及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都已发展为大面积的四合院区域。这是皇城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清代皇城内出现大面积的

民居宅院,不单纯是改变了明代皇城“民不得入”的皇家禁地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清朝前期的政治稳固与社会安定,在这种环境下,皇宫及朝廷的安全不再需要皇城这块“民不得入”的禁地做为防护的保障。

可见,上述各类历史建筑,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特别是皇城内的衙署、寺庙等建筑,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文化特色。今后,应结合皇城内区域性的环境整治,搬迁占用的单位和住户,逐步恢复皇城内重点地区历史建筑的原貌,使其传统文化特色得以充分展示。

三是,原有历史建筑名称与现有建筑的关系。明代皇城,因管理内廷诸事务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其内府二十四署所属的十二监、四司、八局等诸机构的办公、服务及厂、库、作坊等设施,几乎占据了皇城内除紫禁城、三海等宫殿、御苑之外的全部地区,同时,都以当时所在的监、司、局及厂、库确定为当地的名称。清初,在明二十四署的基础上,成立了内务府衙门,统管内府诸事,顺治十三年至十八年期间,曾一度分设十三衙门,后又裁撤,合并设立七司三院。由于清政府允许旗人在皇城内居住,故将内府各衙署用地,放在宫城外朝西路仁智殿旧址,建内务府分署,其所属司、院官署皆设在宫城内或西华门外的南北长街。此外,还将大量的内府诸库移至宫城之内,如广储司(即明代的承运库)的银、皮、瓷、缎、衣、茶六库,除部分瓷库在武英殿南,其余皆移至太和殿前后廊庑配房内,承办内务府器物、陈设、装饰用品的造办处(即明代的御用监)先迁于养心殿,后移至慈宁宫茶饭房等等。将腾出的前明皇城内的二十四署办事机构所用建筑,多改为民居宅院,但其原有名称都保留沿用,如目前的胡同街巷中仍有酒醋局胡同、火药局胡同、内官监胡同等等。

《燕都丛考》内城总说篇中,详细考证了这一变化:“……南长街之西,……曰平

署,今为华北大学,……紫禁城西华门外西南里许,乃前明御用监旧址也,房舍尽为民居。……南长街而北,……其东为都虞司署、为营造司署、为房租库,今俱改为民居”;“……景山后大街,其北曰内官监,今改为恭俭胡同,……又西曰地安门大街,……街之西有上驷院,今改为民居”;《芜史》记载:“北安门内黄瓦西门之里,则内官监也”;《日下旧闻考》的记述更为详实:“监今废,其地犹名内官监胡同。内有大佛堂,其碑记备列黄华(瓦)门营造库、米盐库、油漆库、外铁库、婚礼作、东行、西行、西瓦厂、石厂、黑窑厂、神木厂、铸钟厂、供应厂、备用厂、金殿厂、稻田厂、蜂窝厂、东花房、马鞍房、玻璃局、外冰窑等名目,与《水部备考》及《明史》所载多合”。皇城历史上的衙署名称,至今仍被许多胡同、街巷所沿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地域历史文化。通过这种时代的历史地域名称,可以使人们形象地看到明代皇城的规制和各类建筑分布,更能反映出皇城的悠久历史和明清两代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清政府,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将皇城的使用性质进行了调整,把部分内务府机构迁建于宫城之内,原宫城内二十四署的管理设施及建筑,转为民居。经过清朝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皇城内的大片胡同、街巷和四合院民居,这一变化过程,是皇城几百年历史发展的真实反映,对此,应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保护好皇城内延续至今的原地域的历史名称;同时,也要妥善地保护好自清代以来形成的、并保存至今的传统民居。一定要看到,这一地区不同时代的历史名称与现有建筑的融合与统一,是皇城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皇城内的危房改造工程应采取特别慎重的方式,保护皇城内建筑的历史格局,以使这一具有传统特色的四合院民宅建筑群得以保留和延续。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北京博物馆学会奋进与丰收的十年

马希桂

1996年至2005年是北京博物馆学会事业大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十年。团体会员由1996年的75个增至105个,个人会员由374名增至583名。本着“办实事、见成效”的方针,十年来,学会团结全市博物馆界,热情为他们服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北京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

一、学术研究与交流

这十年,正是处于世纪之交,处于博物馆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人们对博物馆的定位、功能和科学化的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在此背景下,学会先后组织学术会议、研讨会和专题座谈会等40余次,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推进了各单位的学术研究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1. 举办学术会议

1997年至2003年学会先后举办了三次北京地区博物馆大型学术会议,即1997年11月第二次、2000年12月第三次、2003年12月第四次学术会议。仅以2003年12月在中国科技馆召开的第四届学术会议为例,有40多家博物馆的专家和馆长17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105篇。全体代表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就“求实创新——博物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探讨和论述。会议还邀请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做了《博物馆现状

和未来对策》的书面报告;同时,还邀请北京市社科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钱光培教授、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魏小安研究员以及原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严瑞源先生,分别作了关于《首都文化发展战略》、《旅游市场与博物馆发展》和《当代博物馆的管理理念》的报告。

2. 开展专业交流

学会通过各专业委员会,每年都组织一定数量的研讨会或座谈会。

从2001年至2005年,学会每年召开一次文物保管工作研讨会,针对新形势、新特点,设定不同的主题,如《文物的保管、保护、利用和征集》、《文物藏品在展览、提用、运输中的包装与保管》、《文物的保管征集、鉴定与建档工作》和《博物馆藏品的规范化管理》等。参加研讨会的除北京一些博物馆分工保管工作的馆领导和保管部同志外,还邀请部分省市兄弟博物馆负责这方面的领导参加,省际之间的交流对提高北京地区博物馆保管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博物馆教育功能越加显得重要,特别是1992年北京地区博物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活动以来,急需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改进,学会与有关单位于2001年12月在昌平区举办《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教工作研讨会》,有30余位馆领导和社教部主任参加。大家就“如何深化教育基地的建设”为主题进行了研讨。对今后完善教育基地的社教工作,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志愿者走入博物馆,并受到社

会和博物馆界的关注和重视,2003年9月,学会及时召开了“博物馆志愿者座谈会”,邀请已经开展志愿者活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和宋庆龄纪念馆以及部分志愿者交流了开展活动以来的情况、经验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志愿者也以亲身体会畅叙了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体会和收获。这次座谈会今后博物馆开展这方面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

1999年11月,学会陈列设计专业委员会结合北京地区大规模进行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造的现状,召开了以“如何树立精品陈列观念,推出精品展览”为主题的研讨会,并结合我市新推出的优秀陈列展览进行了观摩座谈。

3. 拓宽省市间交流,促进本地区事业发展

为加强北京地区博物馆与外省市博物馆的联系、交流和友谊,借鉴、吸取他们的长处和经验,促进博物馆宣教工作和宣教人才的成长,1998年11月,由学会与市文物局联合举办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陕西五省市社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广泛交流了各省市在社教工作方面的经验和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2000年6月、2002年10月先后在河北承德、天津组织召开了“京、津、冀三省市社教工作研讨会”;2003年11月在北京,2005年8月又在内蒙组织召开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五省市社教工作研讨会。其中学会承办了2003年有43个博物馆60余人参加的“第一届华北地区博物馆社教工作研讨会”,对提高五省市社教工作水平和推进社教工作的深入开展收到良好的实效。

如今,一年一度的华北五省市社教工作交流研讨活动,已成为定式。

4. 开展学会之间的交流活动

开展学会之间的交流,是新形势的需要,也是学会工作新的开拓。

1997年与北京旅游学会联合召开了

“名人故居座谈会”;1998年8月组织召开了“部分新建馆和非团体会员馆领导干部座谈会”,从多角度开发博物馆资源,通过旅游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提高博物馆的社会效益;2003年11月学会与北京市档案学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联合召开了“文物档案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学术座谈会”。2005年12月21日学会与园林学会、北京科技咨询研究中心和马来西亚环球软件,共同举办了“公园风景区——博物馆系统管理信息化论坛”。100多位来宾莅会。与兄弟学(协)会的合作与交流,扩大了学会活动的新领域,有利地推进学会工作向更高层次面的开展。

5. 积极开展赴台湾、欧洲访问和学术交流

为促进海峡两岸博物馆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学会应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文化资产交流促进会之邀,组织了“北京博物馆馆长学术交流考察团”,于2002年12月4日~17日前往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有14位馆长参加。由于北京是第一个大陆省市级博物馆团体组织的赴台文博考察团,因而倍受台湾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历史博物馆馆长黄光男教授,台湾中华文物保护协会王度理事长,台湾图书馆馆长庄芳荣教授,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文化资产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黄永川教授等热情欢迎和接待。在台湾博物馆学会精心安排下,交流团与台北市博物馆界同仁举行了“台北——北京两地博物馆现状交流座谈会”。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馆、鸿禧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台中自然博物馆、高雄历史博物馆、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等15个博物馆。走访了日月潭、民族村、阿里山等民俗名胜古迹。这次交流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路经香港时,考察团还参观了香港历史博物馆、科技馆和艺术馆。

在组织台湾博物馆交流考察活动后,在北京博物馆界引起一定的反响,特别是在“博物馆全球化”理念提出之后,国际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2004年9

月,学会组织了“北京地区博物馆赴欧洲博物馆考察交流团”,前往德、意、法、荷、比、卢等八国参观访问。考察团由8个博物馆的11位同志组成。先后参观了法国卢浮宫、凡尔塞宫、东方艺术博物馆、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德国法兰克福邮电博物馆和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等,并与德意志博物馆进行了座谈交流,参观了该馆文物修复和复制工厂等。

交流考察活动是短暂的,但它使我们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使中西方博物馆有了直接交流,在彼此的交流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人才的培训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新的博物馆不断涌现,大批没有受过博物馆专业培训的人员走进博物馆行列,老的博物馆工作者也需要更新知识和观念,掌握新的信息与技术。学会始终把培训博物馆各类人才视为根本大计,有计划的举办讲解员、文物保管员、馆长研讨培训班、新任馆长培训班等30余次,还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多次合作举办“全国文博系统文物鉴定班”等。

1. 馆长培训班

博物馆事业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各博物馆都在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验,并积累有一定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进行交流、研究和总结,提高各馆领导的理论和专业水平,以推动本馆的改革与创新。正是在这种形式和需求下学会与市文物局于198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期“北京地区博物馆馆长研讨培训班”,每期一个主题,一周左右时间。围绕主题请专家授课、主题发言和交流座谈等,至1998年已举办了十届。

在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培训水平的基础上,学会与文物局采纳了部分馆长提出的要求,希望能组织大家赴外省市改革较早的博物馆进行参观、交流,既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又有利于推动本单位的深化改革和创

新。自1998年至2005年,学会先后三次组织赴重庆、四川、新疆和甘肃、青海等地博物馆进行参观考察和座谈。通过参观、考察、座谈、总结,大家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对思考本馆改革和工作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培训中,我们还针对馆长工作忙、时间紧的特点,推出了短期讲座的培训办法,同样也能达到丰富专业知识,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1997年7月22日~23日,学会与市文物局举办“博物馆学系列讲座”,有47位馆长参加。会上特邀博物馆专家吕济民、王宏钧、苏东海、马自树等就“现代博物馆规范”、“对博物馆在改革开放中的几个问题的思考”、“我国博物馆的现状和发展战略”、“博物馆的安全与防范”等专题进行讲座。大家一致认为,四位专家讲座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并能理论联系实际,收获很大。2002年、2004年,先后又举办“北京地区新任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北京地区博物馆馆长、文委主任研讨培训班”,均采取培训、座谈的形式进行。

2. 讲解员和文物保管员培训班

为了提高讲解员和文物保管员的业务水平,几年来,学会多次组织培训班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培训,并且利用学会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在培训本市博物馆人才的同时,还为兄弟省市博物馆培养人才。

1998年7月,由学会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承办的“全国部分省市博物馆系统讲解员培训班”就有10个外省市41名讲解员参加;1999年11月,举办了一期文博系统“群教工作管理人员培训班”,有来自9个省市的33名学员参加;2004年,我们尝试与高校联合办学,由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博物馆讲解员高级培训班”,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福建等16个省市37个博物馆的47名讲解员参加培训,除听专家授课、参观博物馆、观摩聆听讲解和实习外,还参加了国家语言委员会举办的

标准普通话测试,其中有五位取得一级甲的成绩,全班 87% 的学员取得一级乙以上的成绩。

为了提高和推动全国博物馆系统整体讲解水平、培养高水平的讲解人员,中国博物馆学会近几年连续组织二次全国讲解大赛,北京博物馆学会和市文物局积极组织参加,每次参赛前都经过选拔、培训、彩排、汇报表演等训练。2001 年 8 月北京团参加了“全国革命纪念馆延安杯”讲解员邀请赛,选手们不负众望,获得团体一等奖、3 人获得二等奖、1 人获得三等奖。2004 年 9 月,北京代表队在有 29 个省市代表团参加的“全国博物馆雷锋杯讲解大赛”上,又获得团体一等奖;在个人决赛中,北京队 3 人获得个人赛一等奖,1 人获得二等奖,两次都取得好成绩。参赛结束后,学会组织了专场演讲汇报,在京博物馆讲解员、社教部主任和主管馆长等近 100 余人进行了观摩。此项活动的开展对北京地区博物馆讲解员整体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无疑具有深远影响和推动。

除此,学会自 1998—2000 年每年为海淀走读大学传统文化学院文物鉴定与保管专业学生举办暑期讲解员培训班,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就业能力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5 年 11 月 7 日~23 日,还专为即将开放的人艺戏剧博物馆培训了讲解员并进行了普通话的测试。

3. 通过参观实践提高业务和管理水平

学会经常组织博物馆的馆长和业务干部参观一些新建馆和新展览。通过观摩、座谈达到培训与提高干部管理和业务水平目的。如:2001 年 3 月 17 日,毛主席纪念馆管理局新办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展览开幕后,学会与文物局组织博物馆的一些馆长和业务干部前往参观学习。2001 年,宋庆龄故居基本陈列改造完成后,学会组织了 10 余位博物馆陈列设计人员前往参观学习并组织座谈。2002 年,组织部分博物馆馆长

和业务人员对刚刚建成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印钞造币博物馆等,以及近期推出的新展览进行了参观学习,有 24 个博物馆的馆领导和业务人员 36 人参加。通过参观、座谈,大家认为学到很多东西,收获颇丰。

三、书刊的编辑出版

1. 编辑出版《北京博物馆年鉴》

《北京博物馆年鉴》,是学会成立以后下大力气坚持不懈的一项重点工程。

1988 年以来,学会已编辑、出版《北京博物馆年鉴》共五卷。这五卷《年鉴》记录了 1912 年至 2003 年这 90 多年当中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发展轨迹。《北京博物馆年鉴》的编辑出版,是北京地区博物馆界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它为研究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发生、发展;研究北京的人文历史、科技文化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资料。

2. 编辑出版多种图书

为记录北京地区博物馆学研究的成果,提高研究成果的利用,使其发挥更大的学术价值,学会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后及时组织力量,积极筹集资金,分别于 1998 年 9 月、2001 年 11 月、2004 年 9 月编辑出版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博物馆藏品保管学术论文集》等。除此,还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明十三陵博物馆》、《访问北京——北京人之旅博物馆卷》等博物馆旅游丛书。用于指导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工具书——《博物馆社会教育》,在各位编辑人员的积极努力下也于最近出版。

四、咨询和陈列设计服务

1. 为博物馆提供咨询指导

近年,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不少的馆所进行了改扩建工程。为了帮助一些博物馆搞好陈列和馆舍改建,学会应博物馆

之邀,经常为一些博物馆的改陈或新展览提供咨询和业务指导。先后为中国地质博物馆老馆改建和新展览的推出;对中国邮票博物馆开馆前展览方案进行了审定;对门头沟区博物馆新馆推出的展览和颐和园澹宁堂的复原及陈列提供咨询指导,等等。无论从陈列内容到艺术形式、从设备到用材等方面都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使新展览更具有时代感和高品位,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2. 为博物馆提供设计制作服务

学会陈列艺术专业委员会,聚集众多的博物馆陈列艺术方面的专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的水平,利用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为博物馆提供设计制作,一直是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97年以来,先后为博物馆设计制作的展览有:颐和园《澹宁堂复原和古家具展览》、陶然亭公园《慈悲庵园史陈列》、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陈、宋庆龄故居改陈、颐和园文昌院恢复和《珍贵文物展览》、市政协中山堂《孙中山与北京》展、北京戏曲博物馆《刘志复京剧脸谱展览》等。因专业委员会不以赢利为目的、造价低、费用少,展出效果好,在质量上得到充分保证,因而使委托单位甚为满意。

五、社会教育与科普活动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担负着对不同层次的观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任务。为此学会特别重视并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把思想性、知识性与娱乐性融为一体,利用重大事件、重要节日适时开展教育活动。

1. 抓住热点问题,适时开展教育活动

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让青少年了解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为此,学会与市文物局联合举办了“迎接香港回归”演讲活动。自1997年3月开始,从9家博物馆抽调9名优秀讲解员组成“迎接香港回归”演讲团,经过系统培训,5月12日在大钟寺博物馆门前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首讲仪式,此后下工厂、进学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演讲近百场,听众达10万余人次。这次演讲活动使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了香港的历史,加强了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同时也使讲解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锻炼。

2. 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冬夏令营

1988年,学会组织了北京市中小學生“了解祖国、热爱祖国”博物馆冬夏令营以来,到1997年已举办了20期,每期2~3天,安排参观6~7座博物馆。接待学生总数达15000余人次。通过冬夏令营,同学们不仅学到知识,受到教育,而且开阔了视野,振奋了民族精神。

3. 积极开展科学普及活动

2001年10月,社科联举办首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学会推出了博物馆科普讲座与咨询活动。2001年讲座由原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张宁主讲《文物的收藏与鉴赏》,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主讲《北京的博物馆及其特色》等,听众达150余人。学会还参加在西单科技广场举行的“科学、文明、社会”为主题的科普咨询活动,通过展板、咨询、发放宣传品,介绍了北京博物馆和文博知识,并耐心解答了群众提出的问题。以后社科联举办的每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学会都积极参加。

学会与市文物局、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在西单文化广场科普画廊举办了“首都十六家博物馆专题科普知识展览”。展期自2003年9月至2004年4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展出的“新版人民币防伪技术——送你一双慧眼”;北京警察博物馆的“警察与市民点滴接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水

下考古”和中国工艺博物馆的“陶瓷——火与土的艺术”等,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市民在同一地点领略到多个博物馆的风采,学到多方面的科普知识,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4. 积极参与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了促进世界博物馆事业的兴旺发达,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和关注,确定每年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博物馆学会与市文物局自1996年开始,在全国率先组织纪念活动,除因2003年“非典”中断一年外,至今连续举办九届。每届依据国际“博协”发布的纪念主题,进行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学会除参加主会场的咨询活动外,还负责组织学术讲座和文物鉴定,深受观众喜爱和好评。这种规模宏大的纪念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不仅是博物馆知识的大普及,也扩大了各馆的知名度。

学会所以能为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些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体会如下:

第一、学会的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市文物局的领导和支持,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同时,学会要主动接受市社科联和社团办的指导和支持,及时了解和掌握有关信息和政策,使学会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与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密切合作,是学会顺利开展各项活动的有力保证。使学会能够充分发挥市文物局联系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二、学会要紧密团结北京地区博物馆广大群体,热心为博物馆服务,多办实事,一切为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着想,才能得到博物馆的支持,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第三、充分发挥秘书处和四个专业委员会(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陈列设计专业委员会、社会教育与服务专业委员会、文物保管专业委员会)的作用,这是学会开展丰富多彩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专业委员会中一批热心于学会工作的委员,学会的大量工

作就难以完成。

第四、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保护基金会和广大会员馆对学会工作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如:《北京博物馆年鉴》的编辑出版,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多种教育活动的开展等,都得到了一些单位在经费设备和人力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各种活动得以如期顺利进行。

应当看到,学会的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如何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如何多方面、更有效的为博物馆界和会员服务;如何发挥各位理事和会员的作用;如何加强与国内外博物馆界的联系和交流等,都有待我们去改进和加强。

展望今后几年,学会将迎来我国“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北京将迎来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盛会。随着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发展,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人民群众文化的需要必将不断增长,博物馆事业将有更大的发展前途,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机遇,应加倍努力工作。我们将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文物局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和市社科联的热心指导下,在各有关单位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努力探索,辛勤工作,与时俱进,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加强各项学术研究和交流,利用各种方式积极为博物馆界培养人才,举办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科普教育,加强与兄弟省市和国际博物馆界的往来与交流。充分发挥学会作为学术性群众团体的作用,成为联系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桥梁和纽带,为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兴旺、发达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博物馆图书资料数字化的途径

周 丹

图书馆是信息存储、传播与综合分析研究的学术机构,博物馆的图书馆则以本馆的专业特征,进行该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信息的特藏。而长期以收藏文字出版物为主的图书馆,在 21 世纪则必然要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图书馆将凭借自身文献信息资源库的独特优势,积极进行信息技术与已有功能的互动整合,通过数字化提高文献信息化的效率。这就要求,不仅对现在开始或正在发生的信息用各种工具或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而且还要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信息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古今信息都能在计算机上处理,并在网络上传输和提供检索。

在这个进程中,文献资料工作的内涵没有质的变化,文献资料仍然是物质基础,是信息服务的工具,与传统资料工作不同的只是加工手段与加工深度的改变,是文献资料附加值的增加。数字化作为信息处理技术手段在文献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数字化建设中要首先进行文献资源库的数字化,注重对传统信息资源的兼容,不仅仅是全文信息,多媒体信息,而且二次文献和书目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

实施图书资料数字化技术处理需优选软件。DIPS 数字系统是以全文检索技术为核心,集资源数字化加工、信息采集挖掘整理、数据库建设管理、内容检索利用于一体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基础平台软件。

该系统有两大技术特点,一是图文数据库技术,解决了图像文献不能进行内容检索的难题;二是采用了支持基于 PDF 格式文档的全息数据库,做到检索直接命中到页,并对检索结果进行标注显示。

DIPS 数字系统由 DIPS 数据加工、DIPS 内容管理和 DIPS 网络发布三个子系统组成。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分别形成了数据加工、数据管理、数据发布三个不同的应用面。

DIPS 数据加工系统是 C/S 结构的网络系统,一个或多个客户端用户能够独立或协同完成纸质资源的数字化加工,可以对各种已有的电子资源进行的批量处理、转换、导入等获取系统原始数据,再经过对数据进行识别、压缩、装订、标引、校对、审核等深加工处理,形成 DIPS 数据库的源数据。DIPS 数据加工系统具有流程清晰、责权分工控制明确、可加工资源类型丰富以及允许大量批处理环境灵活设置等特点。

DIPS 数字系统具有以下技术和功能:

图文关联数据库:即让图文自动关联,以文本作为检索依傍,以图像作为检索结果。实现方式是以经济便捷的手段获取正确率不低于 95% 的文本并建立索引,让原稿图像与该文本相关联,读者通过检索文本即可查找到相关的原稿内容,有选择的进行文本或图像资料查阅和下载利用。

资源的深层揭示:对深层标引的文献,不单只检索出所需记录,而且是直接命中到

页,同时,实现检索点的反显。此技术对大部著作、系列丛书等海量数据的使用尤为突出,开创了中文全文检索领域对内容进行深层揭示的先河。

完整的密级管理和权限控制方式:系统有严格的五级(公开、内部、秘密、机密、绝密)安全管理机制和灵活的权限控制方法,另有系统级、数据库级、记录级、字段级等复合安全控制手段。

图文资源数字化加工:百页纸质图书在20分钟内,轻松完成从图像的扫描、文字识别、优化压缩、装订标引、校对审核、入库建立索引、直到网上动态发布,并能立即对内容进行浏览、检索和使用。图书资料的数字化处理,首先要优选处理系统方案。

DIPS 数字文献处理系统是在众多图书馆数字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它的优秀的资源架构是系统可兼容多种信息资源类型,支持海量数据的高效管理;完整高效的资源加工方案,使得各种信息资源的加工在高速下实现多人协同成为可能;在高效、灵活、全面的全文检索技术保障下,查全、查准、性能优秀。其重点特色在于高质量的检索。

多年以来,国内文献数字化的一大难点就在于大量的纸质文献内容转化为数字化信息的难度。传统的做法是将传统纸质文献经过扫描工作转化为图像格式进行存储,虽然这种形式可以保存文献的本来面貌而且工作量最小,但是图像格式无法进行文字的检索工作,难以提供查询功能。而转换成文本格式可以解决查询、检索的功能问题,更为实用,但获取文本的工程大、成本高且周期长。这成了数字图书馆建立的最大阻力之一。而将图像格式优良的阅读效果和文本格式检索功能结合在一起,利用文本做检索索引文件,将图像文件作为检索结果,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检索而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确保了应用结果的准确性。

DIPS 数字文献处理系统,是面向图书、情报、档案等领域数字化服务的平台,能够高效快捷地开发出互联网环境下的中英文

全文检索数据库系统。系统结构先进,面向用户:采用 Internet/Intranet 工作模式,结构灵活、开放性好、便于维护;面向内部管理:采用 C/S 体系,具有实时、安全、功能强等特点。系统的主要特征有:

一、加工高效

数据加工系统能完成对纸质信息的快速扫描及批处理 OCR 识别,因文本仅作为检索的依傍,无须严格校对,再加上对文本及图像文件的装订、标识、优化等工作,均半自动化进行;另外系统为用户提供二次开发的 API 接口,使得各种类似 Marc 格式、各种非标准格式图象及符合 ODBC 模式的关系型数据库外部数据进行自动转换变得十分方便,大大提高了文献数字化的工作效率。

二、检索全能

虽然现在能够完全进入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料库中的文献仍然不全面,但也基本建立了 10TB 的信息资源。在海量存储的保障下,高效的、精确的检索功能就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很有效率的检索到需要的资料,越庞大的资料库越没有利用价值。DIPS 数字文献处理系统成功地做到了检索直接命中到页的检索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文献索引的检索直接查询到包含检索关键词的某一文献资料的某一页上,而且这一检索速度已经可以达到亚秒级成绩。同时在检索方式上,在主题、关键词、分类、逻辑组合等方式的基础上,攻克了英文前后文匹配、联想扩展、跨库和关键词跨行、跨页的技术难关,属于全文检索领域的先进技术。

优异的全文数据库性能,可实现全文检索,检索信息快、准、全。全文检索手段多,包括各种逻辑组合检索、循序渐进检索、英文的前方一致和后方一致检索、基于词典的扩检和缩检。对检索结果能按命中点的多少进行排序,并能以图文方式显示或打印,

满足了用户高查准率和高查全率的要求。

三、管理方便

系统支持文本型和图文型两种数据库。数据库字段类型丰富,保证 ODBC 模式数据的完全导入。根据数据库结构动态生成相应的 Web 端用户检索界面模板文件,管理员可以通过对模板文件的修改来设定个性化的界面风格。数据库管理具有通用性,可根据需要随时创建数据库,定义、修改库结构。数据维护性好,数据库中数据记录的更新方便快捷。

四、系统安全

具有系统级、数据库级、记录级、字段级安全控制机制;具备身份验证及权限核查功能,权限控制严密。可按系统管理员及用户的不同,分别为其定义操作权限;可为每一用户限定数据库的检索集合。对来自 Web 端的每次请求,系统均进行权限核查,严格杜绝越权操作。如发现用户的违法操作,管理员可强行终止其权限。系统通过详尽的日志记录用户的每次操作,用以控制内部人员违规操作和系统维护技术分析。

图书资料以光盘形式存储,将网络光盘镜像服务器直接联上图书馆计算机网络,读者通过网络工作站检索、阅读资料,并可实现 INTERNET 阅读图书资料,检索迅速、全面,减少借阅手续,降低运作成本。

五、导入灵活

由于国内外文献数字化的工作已经开展很久,现实工作存在着多种产品、多种格式并存的情况,而且加上新的文献资料已经采用 PDF 等各类电子文档进行保存,因此作为数字图书馆的文献处理系统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导入能力。DIPS 数字文献处理系统在多年实际运行和开发的基础上支持多种格式导入:支持 MARC 数据导入;关系

数据库数据导入;各种电子文档格式导入;PDF 格式文件导入。

同时以现在新兴的 XML 是作为界面和交换数据标准,支持 TXT、XML 格式文件的导出。XML 作为微软力推的可扩展标记语言,具有排版、文本发布、数据存储等特色,可以说是结合数据库和文本排版于一体的未来格式文件。这就为将来大量文献数据的广泛应用提供灵活开放的数据接口。

六、后续开发

作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优秀工具之一,它以其高效的数据加工、安全的系统维护、发布自动化、界面人性化、检索快捷稳定而著称。在其后还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开发更多后续新技术,以适应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变革。流媒体数据库的引入,使得多媒体的信息表现形式也可以通过网络展现传统文献的方方面面;网上信息资源的抓、整、编、发,既为数字图书馆开拓了更为广泛的互联网信息获取渠道,又实现了文献资源的网上发布途径;中文信息自动化处理,将为我国文字内容的处理开创新的局面。

馆际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图书馆是一项结合社会各界信息资源的伟大工程,只有建立全社会体系的资源共享体系,才能真正发挥数字图书馆的魅力。电子资源应用的门户,庞大信息资料库是信息门户的必要保障,互联网和数字化信息的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电子资源的时代特色。

综合 DIPS 数字文献处理系统的技术特色和强大功能,在信息资源的采集、管理上提供了成熟的解决方案。该系统目前已被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文献中心等文献单位所采用,并获得了广泛认可。

博物馆图书资料的数字化工作若引入该系统,将为博物馆图书资料部的信息化建设,为博物馆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服务提供方便。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助理馆员)

关于异地展览的几点思考

蒋潇
王鹏远

为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许多博物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去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使社会公众得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享受,更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目前,异地展览工作缺少规则标准,管理模式比较粗放,相关法规对于展览文物的管理规定不够全面,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如何对异地展览工作进行规范,搭建一个科学的管理平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此,笔者拟从工作实践出发谈几点看法,期望与文博界同仁共同探讨。

一、组织管理

展览作为文化产品,其最终完成包括两个过程,即围绕展览的“生产”展开的过程及其管理过程。生产过程,是将展览所要表达的主题以及设计者为此所作的艺术和技术构思物质化;管理过程则主要指对完成展览所要求的资源进行组织协调,如资金、设备、时间、人员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科学的组织管理,很难实现生产的目标和目的。因此,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有计划性。展览部门每年应提出展览计划,提交博物馆领导研究决策。展览计划包括:年度内拟举办展览的数量、展览选题策划以及相应的落实措施。异地展览事先需要宣传推广,寻找合作方,展览何时、何地能够举办往往难以预见。但出展单位可以在馆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设计多种展览选题和展览规模,以应对展览市场的选择。笔者所在的国际友谊博物馆由于没有自己的馆舍,举办异地展览成为其主要业务工作,也逐渐形成自身一大特色。为了适应展览市场的需要,展览信息部在挖掘馆藏资源的基础上,策划了“和平绿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礼品特展”、“世界瑰宝——当代世界艺术珍品展”、“佛国遗珍——国礼中的佛教艺术”、“秋水莹润——欧洲瓷器精华展”、“物华天宝——国礼中的饰品艺术”、“原始之味——非洲

木雕艺术展”、“大海的胸怀——邓小平礼品展”、“世界的敬意——毛泽东礼品展”等多个选题,每年大约可以举办10个左右常规性展览,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拓了空间。

展览项目确定后,应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合理分工,责任到人,避免工作的随意性和时间的紧迫性。一些博物馆为增加展览的时效性,很少考虑工作步骤与时间安排,筹展时间仓促,随意性强,不仅影响展览的质量和成效,也给文物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二,组织保证。博物馆通常由展陈部门负责展览工作的协调,按各自职能,由部门操作。其优点是分工细致,职权明确,可以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发挥专业人员的才能,但部门之间有时缺乏协调性。这是体制的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行政协调,交流信息,提倡在注重全局利益的前提下照顾局部利益等措施加以解决或缓解。

近年来,有的博物馆开始尝试实行项目负责制,即从相关业务部门中指定一个负责人,其他人员配合,项目组负责整个展览的协调和调动,以及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制作布展等具体操作。项目负责制将展览工作衔接成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将人力资源有机地整合到展览工作中,不仅有利于展览的顺利运作,也可以培养业务人员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加强责任心,是值得尝试的管理模式。但不论采取部门操作还是实行项目负责制,博物馆馆长都应是强有力的组织协调的核心。

在展览的组织机构中,应以专业人员为主。专业人员对相关业务工作有一定的把握,在工作中能默契配合,减少工作环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外出布、撤展时,展览组应以熟悉文物展览的专业人员和文物保管部门的专业人员为主。尤其是布展阶段,非业务人员参与布展,很可能造成一些不良后果。比如,易于出现文物损伤以及有损文物的布展方式,布展质量得不到保证,等等。这一点尚未得到博物馆的普遍重视。

第三,努力做到责、权、利的统一。责权相称或责权一致,是国内外管理学界公认的定律。权力是承担责任的保证,而责任则是行使权力的目的。责权相称还必须加强激励机制。长期以来,博物馆奖惩机制不明,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内部运行机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事业的要求,严重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情绪不高,易于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求创新。为此,一些博物馆通过机制改革等措施,打破平均主义,实现多劳多得。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等通过实行项目负责制,责权明确、奖励倾斜,取得良好的效果。国际友谊博物馆通过制定展览奖励办法,对展览工作进行量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上述举措是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展览工作顺利进行的有益尝试。

二、场地考察

异地展览要选择安全设施齐全、展出条件较好的展览场所,这是保障文物安全的基本条件。在展览协议签订之前,出展单位应派保卫人员和业务人员赴展出地进行实地考察。

安全考察的主要内容:第一,人防情况。是否有保卫机构,保卫人员配备如何,展览期间是否安排保卫值班,有何相关制度。第二,物防条件。展厅建筑物墙体是否坚实;窗户、通风口、管道进出口是否有防护栏;展厅出入口是否装有防盗门,能否满足观众高峰期疏散的要求。第三,技防条件。展厅里是否有防火、防盗报警设施和灭火器材。第四,治安状况。文物运输沿途及展厅周边的环境是否复杂,是否对文物安全构成威胁,等等。对展览场地不符合安全条件又无力解决的,应拒绝举办展览。

业务考察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展厅建筑条件,包括布局、参观路线、展厅空间(门厅、空间尺度)、墙面、采光等。其中,应重点考察展厅的采光方式,照明设备如何,有无截紫滤光措施。第二,展厅环境气候。是

否安装空调系统、使用温湿度调控设备及调湿材料。第三,展览设备,包括展柜、台座、支架、板面等。除了样式和规格,还需了解是否坚实、安全系数大、密封程度高。这些内容也是能否举办展览的重要依据。专业人员对此要有充分的了解,才能选择适宜的展品,进行相关设计工作。

过去,异地展览主要是博物馆馆际交流,安全设施和展出条件绝大部分符合展览要求。随着博物馆展览尝试进行市场化运作,跨行业间的合作逐渐增多,展出地点也不仅限于博物馆了。对于这种合作,前期考察显得尤为重要。

三、签订协议

协议是整个展览的执行依据,因此应当仔细推敲协议的各个细节。展览协议主要由正文和一系列附带条款、附件构成。正文主要内容包括:展览举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名称;展览名称、时间、展出场地;展品的安全、运输、赔偿的责任和费用;展品的点交方式及地点;展出单位参加开幕式人员、工作人员的安排及其所需费用;展览费用的数额、支付方式;媒体宣传、赞助活动、展览冠名权以及有关知识产权问题。

在附件中,除了展品清单外,还可以就安全责任、赞助等具体问题细化,从而和正文一起形成一份完整的展览协议,对整个展览的内容和流程进行规范和明确。在展览协议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展费的支付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与文化公司、广告公司等单位合作时,应要求对方在协议签订后,向展出单位支付定金,其数额一般不低于文物使用费的20%,余款应在展品起运前付清。定金一方面可作为展览的启动资金,另一方面也是对承办方的一种制约。

第二,展品的点交方式及地点。明确何时由双方派出多少人员到场清点、核实展品;采取何种针对性的安全保卫措施;需要何种相关设备和工具;是否在检查、确认展

品有无伤残后拍照为证,并由双方代表多少人在展品点交单上签字,一式几份,由谁保留存档,都要一一说明。展品点交单是展品情况的实际报告,也是在涉及赔偿时的重要依据。

第三,展览内容。明确承办方不可随意更改、增删展览内容,包括展览名称、文字说明、辅助展品等。如要改动,事先必须得到出展方的书面认可,避免展出不适宜的内容,出现政治错误。

第四,对文物保护做出相关规定,明确双方保管展出文物的共同权利和义务。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展出文物用途、期限的规定,各自的原则。要强调未经出展方书面同意,承办方不得异地展出;不得将展览举办权转让给第三方;不得照相、仿制、复制。第二,对定期检查展出文物做出规定。展出过程中,承办方应定期到展厅查验展出文物,了解现状并确认是否安全。例如:纸质品的卷翘、变色,金属质品的褪色、氧化,木质、漆器和陶质品的开裂,等等。发现问题应立即与出展单位联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文物安全。第三,对展出文物的保养修复做出规定。承办方不得随意清洗、修复展品。第四,意外损坏事故的处理原则。

第五,签订《安全措施责任书》,进一步明确展出文物的安全责任。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承办方负责展品自到达展览场地至展览结束期间的安全责任。第二,对展览场地的安全条件提出要求。在无技防设备的情况下,要加强人防力量。第三,对值班制度提出要求。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展厅及死角地带要设专人看守;值班人员要严格交接班制度;每日认真做好防火安全检查。第四,对应急预案等提出要求。第五,明确赔偿责任。

四、异地展览的设计

从展览的性质、承办方的展厅条件以及文物保护的角度考虑,异地展览设计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物展品的选择。一是数量不宜过多。承办方提供的展厅面积有限,大多在500~600平方米左右。一般情况下,以120件(套)以下实物展品为宜。异地展览一般要长途跋涉、辗转颠簸,展品数量过多,会给运输带来不便,也不利于文物安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一对矛盾,利用的频率越高,保护的任務就越重。因此,要合理确定实物展品的数量。二是尽量减少那些体积大、份量重、不宜搬运的展品。这类展品基本上要采用直接式外包装箱装运。如果这类展品的比例多了,会给运输以及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带来压力。另外,由于没有量身定做的展柜,体量超常的展品或与其他展品一并放在普通展柜里展示,或裸放在临时展台上。普通展柜里回旋余地有限,体量较大的展品又需要不少人手来搬运,因此很容易发生事故。而临时展台上的三维展示,也给文物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三是根据展厅的环境条件选择展品。异地展览时,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展厅建筑条件。例如,有的展厅已安装控制室内温度、湿度的空调设备,而相当多的展览场所要靠自然调节。因此在选择展品时,要了解展厅的环境因素,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文物的影响,确保文物的物质安全。

第二,文字内容及辅助展品的设计应强调“以我为主”。在借助社会力量办展时,由于涉及到对藏品文化内涵的诠释,双方出发点和目标不完全一样,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方面的歧义会影响产品的开发。以国际友谊博物馆的展览为例:1998年在珠海展览时,承办方为制造新闻点,把展览名称定为“总统礼品特展”。因展览中仅有寥寥几件是总统赠送的礼品,与标题有出入,故而引起观众质疑;2005年在东莞展览时,承办方擅自展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标准像,与展览主题不符。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给展出单位造成负面影响。博物馆担负着社会教育职能,严谨性和科学性应是展览工作遵循的原则。有的展览兼具很强的政治性,甚至涉及到外交关系,所以无论哪个环节出现纰

漏,其影响都非同小可,应予以高度重视。

五、藏品出库、包装和运输

提用藏品应遵循藏品出入库制度及批准手续。健全的规章制度,是藏品科学管理的依据和准则,也是藏品有序地得到完善保护和使用的保证。在藏品出库前,文物保管部门应按展出文物清单,做好准备工作。一要对展出文物清单予以确认。如:核实藏品原始信息是否准确;藏品是否正在展出或保养修复当中。二是必须对展出文物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保护状况不好的文物一律不准展出。另外,要提供详尽准确的藏品现状记录。提取藏品时,相关人员要按照有关规定填写提用凭证(或称“提陈单”),并对藏品的数量和现状进行认真核对。在查验藏品现状时,文物保管部门应指出一些已损坏的部位和潜在的危險,以便为文物利用中的有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在交接手续上,应采用“一单制”或“跟单制”,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责任到人。

展品包装是保障展品安全的重要因素。要点如下:一是包装材料的选用。制作内、外包装箱均应使用目前国际通用的复合木质材料为板材,亦可采用制造飞机专用的铝合金,此种材质轻巧坚固,是目前文物包装运输中国际通用的材料。禁止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原木为材料。包装箱的防震层材料应选用质地柔韧、弹力好的高密度吹塑板及泡沫塑料。填充物应选用海绵、各种密度的聚氨酯板和高密度聚苯板等,禁止使用旧报纸、卫生纸、纸屑、锯末、麦秸、砂土等作为填充材料。

二是包装箱制作要求。常规式外包装箱应具有坚固性及较强的防震、防冲撞、抗压和防水性能。异地展览的运输方式主要是陆运,因此外包装箱的尺寸规格应适合集装箱装载。箱外表显著位置要有防倒置、防雨、易碎标识并标明箱号。外包装箱表面不应有突出的锁扣等装置,以避免箱体移位时发生拉挂等现象。直接式外包装箱用于一

些体量超常的展品。对于份量较重的展品,应选用质地坚实、承重力强的板材,必要时可用木方作框架、横撑加固,并加厚防震层。由于内包装箱(盒)的防震层直接接触展品,其材料应选用细密、柔软、弹性好的中密度吹塑板为宜。根据展品需要,箱(盒)内应放置防虫剂、干燥剂等。对于箱内结构复杂的内包装,须附装箱示意图或在箱体外表加注警示性文字。

三是展品包装程序。首先,根据需要,将展品外面包裹一层绵纸,以起到保护器物表层、增加防震、防止移位的作用。然后,以适当的包装方法将展品固定于内包装箱(盒)内,直接式展品则直接固定于外包装箱内。接下来,将若干个内包装箱(盒)码入外包装箱内。注意将份量较重的展品放在下面;轻的放在上面。不要将份量重的展品集中装在一、两个外包装箱里,以防止箱子过重,增加搬运难度。内包装箱之间空隙要用海绵等进行填实、固定。装箱时,要填写装箱单一式两份,一份存入相关外包装箱;另一份由展览组人员保存。展品全部入箱后,需核对装箱单进行确认。最后,将外包装箱上锁、封箱。

文物运输是举办异地展览最棘手的问题,应遵照有关规定,提高使用交通工具的级别,确定可靠的运输方式,禁止搭乘公交车运输文物,并避免在雨、雾、严寒、风沙等恶劣天气运输。要做好全面而详细的工作计划,尤其做好在最不利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出现事故的预案。

异地展览的运输主要有火车运输、飞机运输、集装箱汽车运输三种方式。火车运输需要对展品进行多次搬运、保安难度大;飞机运输快速、安全,但对于重量级和巨型文物无能为力;专业运输公司的集装箱汽车运输,可以减少搬运次数,实现门对门的搬运,符合国际上最为通用的惯例。为了防潮,可

采用车内恒温的密封式卡车;为了避免震动颠簸,应限速在每小时 80 公里以内。究竟采取何种运输方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文物到达展出地,应请求当地公安部门负责护送。运抵展出场所后,要及时核查文物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的现象,发现问题要马上提出,并做好记录,分清责任一方。

六、布展安全

在现场布置阶段,展厅及展柜内的施工、制作等工程应全部完成。布展前,展厅应进行清场,除双方布展人员及保卫人员外,其他人员原则上不得入场。异地展览常会遇到很被动的情况。有时,临近开幕了,而展厅施工尚未结束,展陈设备还在组装当中。为了赶时间,只能一边施工,一边布展。此时,尽管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文物的安全,但这终究不是正常的工作程序,应尽力避免。

展览组应遵循“以我为主”的原则,始终参与布展工作,一方面可以发挥指导作用,提高布展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监督保障作用,避免因合作方不熟悉文物而导致文物的损伤。布展完成后,应将展厅、展柜进行拍照,留档备查。应注意的是,展览组应保持相对稳定。布展人员对展品情况、展厅情况比较了解,如果撤展时人员变动太大,一方面影响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则不利于文物安全。总之,举办异地展览应以博物馆学基本理论为指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和有关规章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杜绝随意性,使异地展览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作者为国际友谊博物馆副研究员)

国家体育馆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建设中的国家体育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一路的南边,水景路的西边,南与国家游泳馆相邻。2004年8月23日至9月6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队在該馆内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27座,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7座,均为竖穴土圹墓。以下依埋葬特点,将各墓形制分类加以叙述。

1. 搬迁墓7座。编号分别为04GTG:M1、M2、M3、M10、M13、M24、M25

M1:位于该发掘区的西北部,方向290°。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口长1.86米,墓底长1.36米、宽西边0.8米、东边0.7米、深1.4米。

M2: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方向15°。方形竖穴土圹。长1.4米、宽1.3米、深1米。

M3: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西邻M2、南距M1约1.5米,方向295°。长方形竖穴土圹。长1.8米、宽西边1米、东边0.9米、深0.8米。

M10:位于发掘区的西北部,方向10°。长方形竖穴土圹。长1.8米、宽1米、深1.5米。未见遗骨,仅残留一棺迹,长1.6米、宽北边0.8米、南边0.7米。

M13: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方向350°。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7米、宽1.3米、深0.8米。未见遗骨及棺迹。

M24: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北,方向18°。长方形竖穴土圹。长1.9米、宽1.5米、深1.2米。未见遗骨,仅残留一棺迹。

M25:位于发掘区西南部,方向258°。长方形竖穴土圹。长3米、宽西边1.9米、东边1.7米、深1.9米。未见遗骨,仅残留一棺迹,长2米、宽东边0.7米、西边0.8米。

2. 瓮棺葬 8 座。编号分别为 04GTG: M5、M6、M9、M18、M19、M20、M22、M26

M5: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10°。呈不规则形状, 长约 2.2 米、宽约 1.08 米、深 1.5 米。在坑底中部偏东有三个黑瓷瓮, 呈南北向一字并排, 瓮内均盛满水, 有较多骨渣并伴有少量块状木炭。其中 1 号、3 号(由南向北)瓮底部周围有较多骨渣及炭灰, 且瓮底部均有铜钱。

M6: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20°。呈不规则形状, 长约 1.66 米、宽约 0.89 ~ 1.77 米、深 1.3 米。在中部有一小坑, 三个瓷瓮呈三角状摆放。瓮内均盛满水, 有较多碎骨块, 并有火烧痕迹, 瓷瓮底部有较大块状木炭。

M9: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15°。竖穴土坑, 呈不规则形状, 口大底小。墓口长约 1.8 ~ 1.9 米、底长约 1.4 ~ 1.6 米、宽约 1.2 ~ 1.5 米。底部有南北向瓷瓮三个。北部有一瓮, 瓮高约 0.72 米, 弧顶, 底宽 0.6 米、进深 0.38 米。瓮内盛满水, 有较多碎骨, 并有火烧痕迹。其中 1 号瓮(由南向北)底部有铜钱 2 枚。

M18: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30°。刀把形, 竖穴土坑。1.5 ~ 1.7 米处有一大方砖盖(长、宽 0.53 米、厚 0.08 米), 盖下是东西二道砖砌墙(四层厚 0.2 米, 砖长 0.28 米、宽 0.12 米、厚 0.045 米)。墓长约 1.4 ~ 2.32 米、宽约 0.8 ~ 1.4 米、深 1.6 米。其中 2 号瓮盖顶部中间有一铜扣, 3 号盖顶有浅黄色料珠(由南向北)。

M19: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30°。刀把形, 长约 0.9 ~ 1.24 米、宽约 0.48 ~ 0.94 米、深 1.3 米。坑底中间有二瓷瓮, 呈南北向摆放。内有较多碎骨渣, 并有火烧痕迹。

M20: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350°。长方形竖穴土坑砖室墓。长 2 米、宽 1.8 米、深 1 ~ 1.52 米。在深 1 米处为一砖室, 顶部有二块大方砖, 南北向排列(单砖长、宽 0.53 米、厚 0.08 米), 盖下是砖室墓, 口小底大, 无铺底砖。砖室长 1 米、口宽 0.44

米、底宽 0.66 米、深 0.52 米。(砖长 0.28 米、宽 0.12 米、厚 0.045 米), 内置瓷瓮两个, 瓮盖均放置瓮北侧底部。

M22: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15°。不规则形, 竖穴土坑。长 1.3 ~ 1.5 米、宽 1.2 ~ 1.4 米、深 1.3 米。坑底西北部有一圆形小坑, 径约 0.5 米、深 0.1 米。有一瓷瓮棺置于坑内, 瓮内有料珠 1 颗。

M26: 位于发掘区东北部, 方向 15°。刀把形, 竖穴土坑。长约 2 ~ 2.26 米、宽约 1.25 ~ 1.9 米、深 1 ~ 1.6 米。东部有一平台, 宽约 1.2 米。西部为深约 0.6 米的坑槽, 内置南北向瓷瓮四个(由南向北编号)。瓮内均有较多碎骨, 并有火烧痕迹。其中 3 号瓮内盛满水, 4 号瓮内底部有银簪 1 件(残)、耳环 1 件。

3. 单棺墓 7 座。编号分别为 04GTG: M4、M7、M11、M12、M14、M21、M23

M4: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20°。长方形竖穴土坑。长 2.7 米、宽北边 1.1 米、南边 0.9 米、深 1.1 米。头向北, 仰身直肢。棺长 1.9 米、宽北边 0.6 米、南边 0.5 米。

M7: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90°。长方形竖穴土坑。长 2.6 米、宽东边 0.96 米、西边 0.9 米、深 1.3 米。头向东, 仰身直肢。棺长 1.86 米、宽东边 0.72 米、西边 0.56 米。

M11: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北边打破 M12), 方向 125°。长方形竖穴土坑。长 2.4 米、宽 1.1 米、深 1 米。头向东, 仰身直肢。棺长 1.9 米、宽东边 0.6 米、西边 0.4 米。

M12: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被 M11 打破南部), 方向 96°。长方形竖穴土坑。长 2.5 米、宽 1.06 米、深 2 米。头向东, 仰身直肢。棺长 1.9 米、宽东边 0.8 米、西边 0.6 米。

M14: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55°。长方形竖穴土坑。长 2.3 米、宽东边 1.1 米、西边 1 米、深 1 米。头向东, 仰身直肢。棺长 1.7 米、宽东边 0.7 米、西边 0.5 米。

M21: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 方向 90°。长

方形竖穴土圹。长2.4米、宽1米、深1.8米。头向东，仰身直肢。棺长2米、宽东边0.8米、西边0.6米。

M23:位于发掘区西南部,方向346°。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4米、宽南边1.1米、北边1.2米、深1.5米。头向北,仰身直肢。棺长1.66米、宽南边0.6米、北边0.7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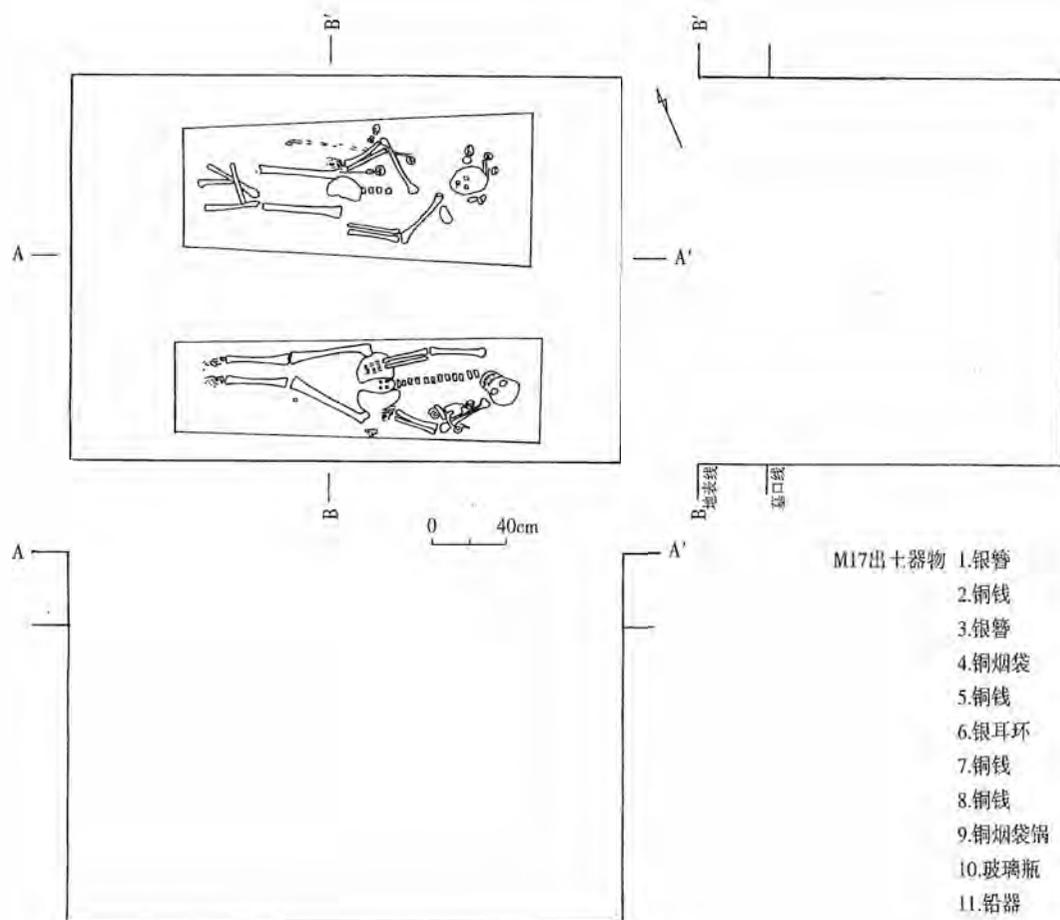
4. 双棺墓4座。编号分别为04GTG:M8、M15、M17、M27

M8: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方向130°。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6米、宽2米、深1.6

米。头向东,仰身直肢。北棺长2.1米、宽东边0.92米、西边0.8米。南棺长2米、宽东边0.8米、西边0.66米。

M15: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方向105°。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6米、宽2米、深1.6米。头向东,仰身直肢。北棺长1.9米、宽东边0.8米、西边0.72米。南棺长1.9米、宽东边0.8米、西边0.7米。

M17: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方向110°。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6米、宽2米、深1.6米。头向东,仰身直肢。北棺长1.9米、宽西边0.66米、东边0.8米。南棺长2米、宽西边0.5米、东边0.56米(图一)。



图一 M17 平剖面图

M27:位于发掘区中部偏北,方向 80° 。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4米、宽东边2.1米、西边1.8米、深1.6米。头向东,仰身直肢。北棺长1.9米、宽东边0.6米、西边0.5米。南棺长1.64米、宽东边0.6米、西边0.43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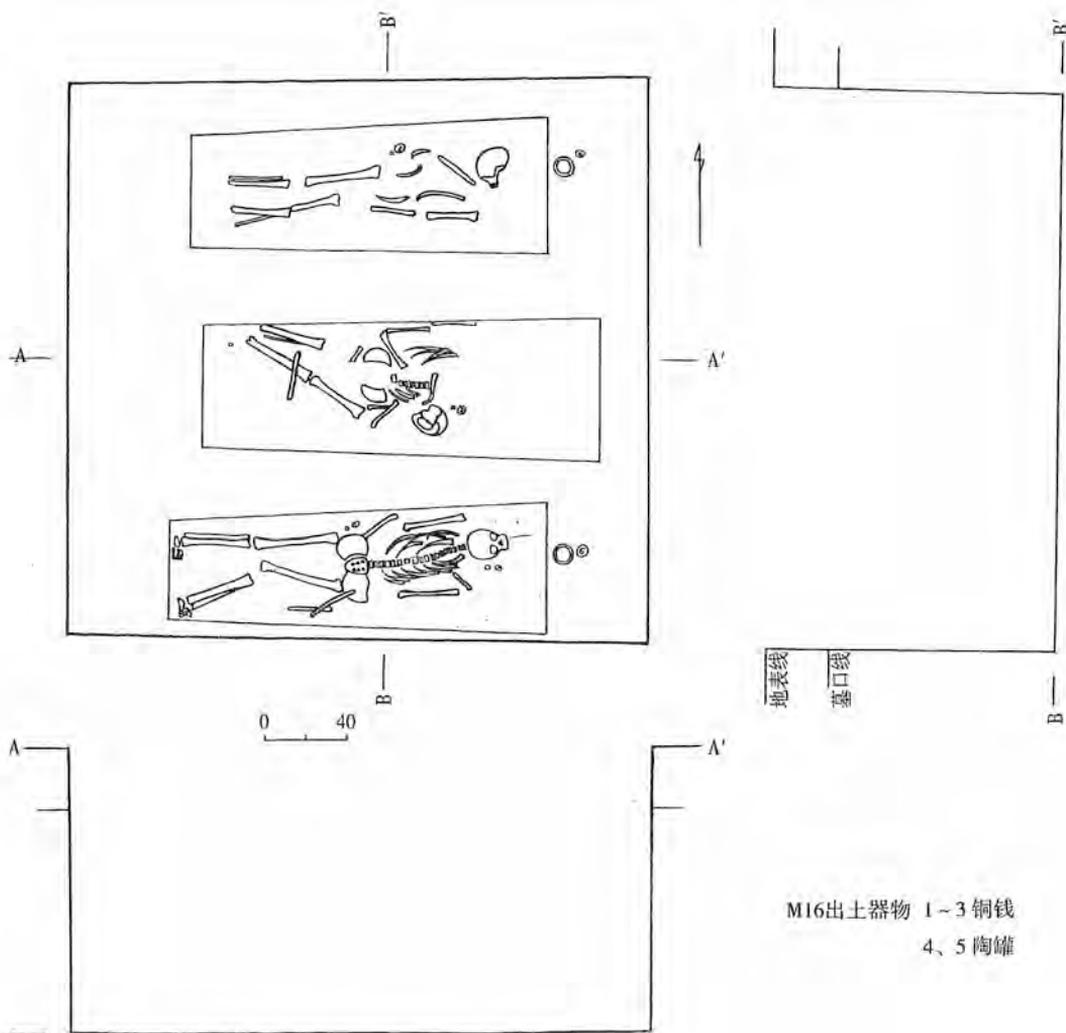
5. 三棺墓1座。编号为04GTG:M16

M16:位于发掘区西北部,方向 90° 。长方形竖穴土圹。长2.9米、宽东边2.8米、西边2.72米、深1.1米。头向东,仰身直

肢。(三棺由南向北叙述)1号棺长1.9米、宽东边0.6米、西边0.5米。2号棺长2米、宽东边0.7米、西边0.6米。三号棺长1.8米、宽东边0.66米、西边0.55米。另1、3号棺头前各放1陶罐(图二)。

二、随葬器物

出土的随葬器物共117件(所出铜钱按1件计),有陶器、瓷器、银器、铜器、铅器、玛瑙饰、玻璃器等。现分别介绍如下。



图二 M16 平剖面图

1. 陶器 6 件,均为罐。据口沿、腹部形制的不同分为三型

A 型 4 件。器形较小。泥质红陶,口沿至上腹部施黄釉。侈口,圆唇,短束颈,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据口沿形制的不同可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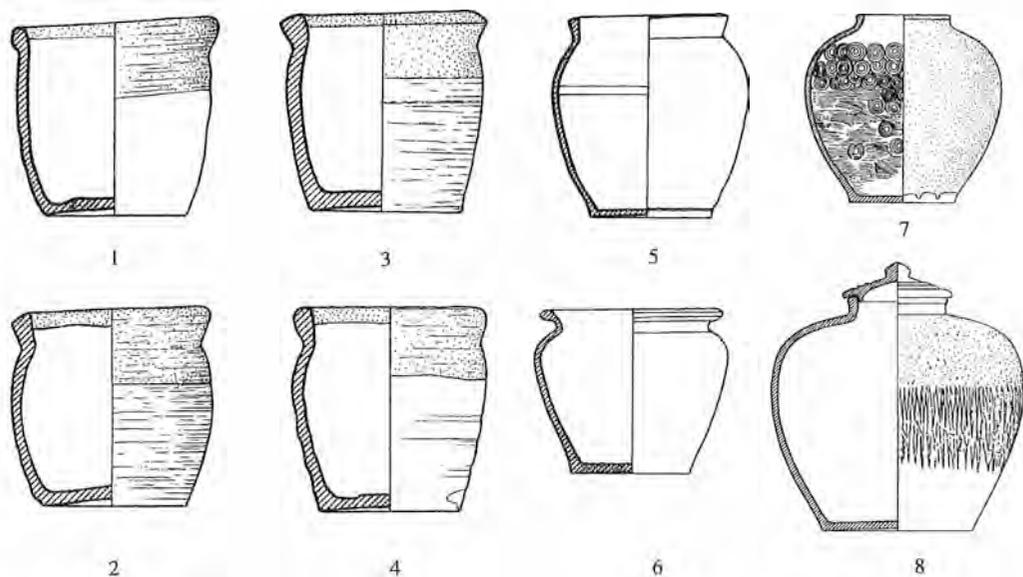
I 式 1 件(M7:1)。侈口稍大,唇薄。口径 11、底径 7.8、高 10.6 厘米(图三:1)。

II 式 3 件。侈口稍小,唇厚。M16:4,口径 10、底径 7.2、高 9.9 厘米(图三:2)。

M16:5,口径 10.6、底径 7.8、高 10.5 厘米(图三:3)。M27:1,口径 10.2、底径 7.2、高 10.8 厘米(图三:4)。

B 型 1 件(M23:1)。器形较小。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折沿,束颈,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圈足。口径 9.4、底径 7.3、高 11.4 厘米(图三:5)。

C 型 1 件(M27:5)。器形较小。泥质红陶,口沿至上腹部施黄釉。侈口,圆唇,卷沿,鼓腹,平底。口径 10.1、底径 6.6、高 9.15 厘米(图三:6)。



图三 出土器物

1. 陶罐(M7:1) 2,3. 黄半釉陶罐(M16:4、M16:5) 4,6. 陶器(M27:1、M27:5) 5. 灰陶罐(M23:1) 7,8 瓷瓮(M5:1、M18:1)(1~6为1/4,7,8为1/16)

2. 瓷器 21 件,均为瓮。分为两型

A 型 9 件。无盖,敛口,方圆唇,坡颈,颈、肩有折棱,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平底。标本 M5:1,器身内外皆施黑釉,外底不施釉,内壁有同心圆环釉痕以及施釉时留下的刷痕。口径 20.5、底径 22.4、高 40 厘米(图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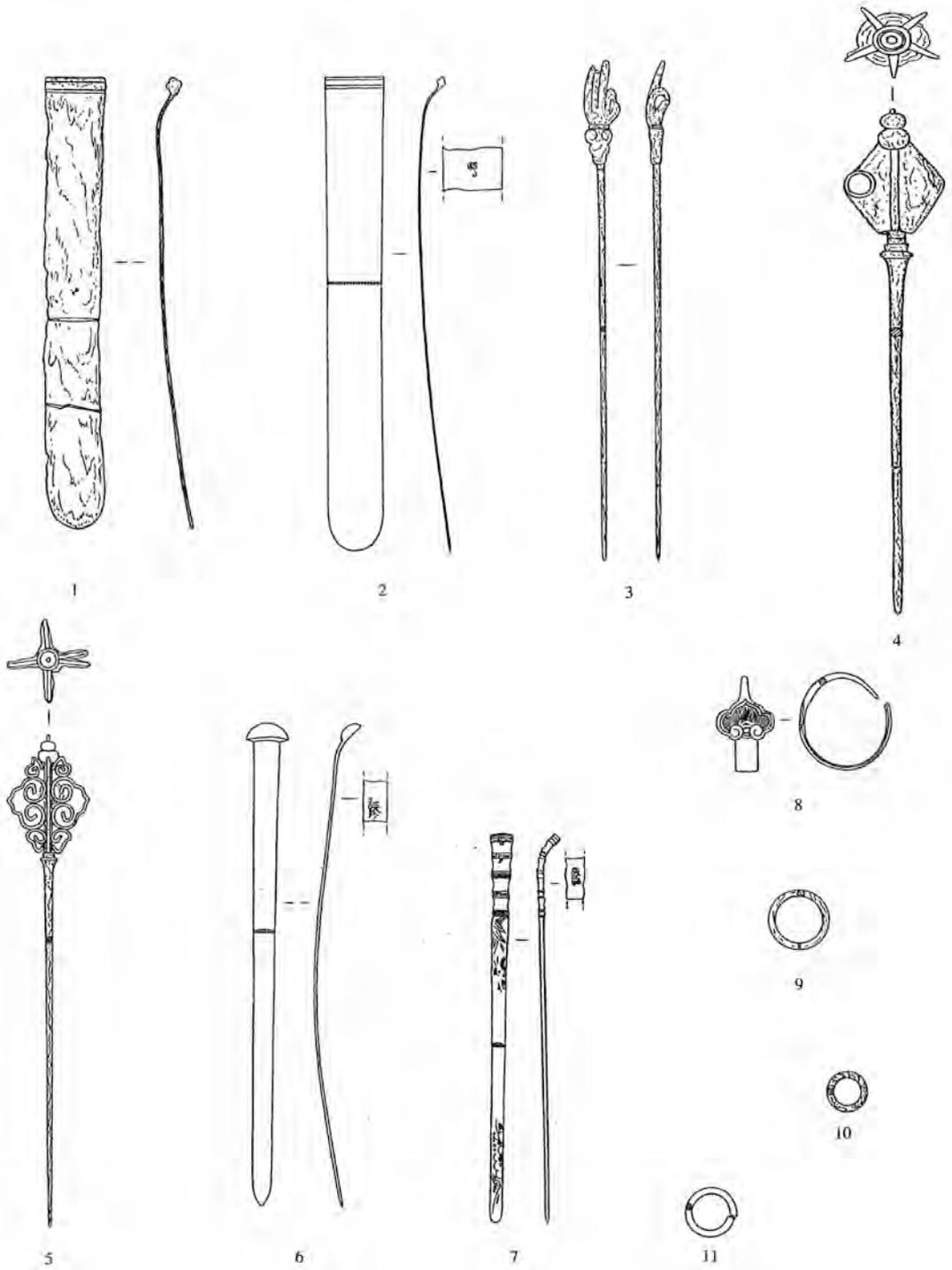
B 型 12 件。帽形盖,直口,方圆唇,直颈,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平底。标本 M18:1,盖外施绿釉,内不施釉;器身内外皆施釉,

外底不施釉,外壁肩以下部位有流釉现象。口径 21.4、底径 32.4、高 59.6 厘米;盖高 9.1、径 23.8 厘米(图三:8;彩四:1)。

3. 银器 23 件,有簪、耳环

簪 12 件,据器体形制的不同,分为四型。

A 型 2 件。簪体宽扁弯曲,簪首呈花朵形。M4:1,长 15.2 厘米,宽 2 厘米(图四:1)。M17:1,长 16.05 厘米,宽 2.55 厘米(图四:2)。



图四 出土银器

1、2、3、4、5、6、7 银簪(M4:1、M17:1、M8:1、M8:2、M17:3、M8:3、M27:3)

8、9、10、11 银耳环(M17:6、M4:2、M14:2、M27:4)

B型5件。簪体呈圆锥形。M8:1,簪首为一佛手,手指圆而细长,拇指与食指合拢,似作拈花状;簪首与下部之间为卷云头形手腕。长17.1厘米(图四:3)。M8:2,簪首为五面形禅杖,残留一环,杖顶呈葫芦形。禅杖为佛教用物,一般指僧人所用的手杖。长14.3厘米(图四:4)。M17:3,簪首为银丝缠绕成的六面形禅杖,杖顶呈葫芦形,簪首与下部之间有细颈。通长16.45厘米(图四:5)。

C型4件。簪体扁平,下端为三角形尖状,簪顶作圆帽形。M8:3,长16.2厘米(图四:6)。

D型1件(M27:3)。簪体扁平,簪首为竹节状,共四节,器身饰有竹叶纹、花草纹。长12.9厘米(图四:7;彩四:2)。

耳环11件。据器体形制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5件。形状近似“C”形,一端篆刻一花朵形,花朵顶端呈圆尖形,底端作扁平状。M17:6,直径3.2厘米(图四:8)。

B型6件。圆环形,两端相接,素面。M4:2,直径1.8厘米(图四:9)。M14:2,直径1.4厘米(图四:10)。M27:4,两端接口稍重叠。直径1.6厘米(图四:11)。

4. 铜器9件,有勺、扣、簪、鼻烟壶、烟锅、钱币等

勺1件(M3:1)。身呈椭圆形,柄弯曲微上翘,柄首宽扁稍弧。勺口径4.6、通长10.7厘米(图五:1)。

扣1件(M18:4)。柄部为环形,扣体为圆球形。直径2厘米(图五:2)。

簪3件。M14:1,簪体扁平,下端残,簪首为花叶造型,叶茎弯曲,簪首与下部之间有四道凸棱。残长9.6厘米(图五:3)。M17:2,簪体扁平,上端弯曲,下端残,簪头呈花骨朵形。残长8.3厘米(图五:4)。M26:5,簪体扁平弯曲,簪首为一动物头部,张嘴瞪目,顶卧双角,造型生动。长9.5厘米(图五:5)。

鼻烟壶1件(M8:6)。壶形为扁圆体,

短颈溜肩,圆口圈足。表面光滑,晶亮剔透,上饰零星点线纹。半圆形盖顶端的方钮套一圆环,盖下端有一扁平塞,肩部、腹部有对称的两对圆环。壶高7.8、腹径5.4、口径2、底径2.2厘米(图五:6)。

烟锅2套。整体为铜质,由烟锅、烟杆、烟嘴三部分组成。烟锅,圆形,烟杆剖面呈环形,中间有孔,孔由锅到嘴渐细,烟锅与烟嘴分离,中间用藤木连接,便于清除烟油垢,烟嘴端头呈圆帽形。M17:4,烟锅直径2.35厘米,烟杆长16.8厘米,通长20.7厘米(图五:7)。M17:9,烟锅与烟杆之间有三道凸棱,烟锅直径2.1厘米,烟杆长15.1厘米,通长20.6厘米(图五:8)。

钱币76枚。有乾隆通宝等。圆形,方孔,宽缘,对读。直径2.4厘米。

5. 其他58件,有石器、铅器、玛瑙饰、玻璃器等

石料珠6颗。M18:5,圆形,中心有穿孔。直径1.25厘米(图六:1)。M22:2,圆形,中心有穿孔。直径1.25厘米(图六:2)。M8:7~10,圆球形,无穿孔。M8:8,直径3.5厘米(图六:3)。M8:7,椭圆形,无穿孔。高4.5厘米(图六:4)。

铅器1件(M17:11)。残损严重,难辨器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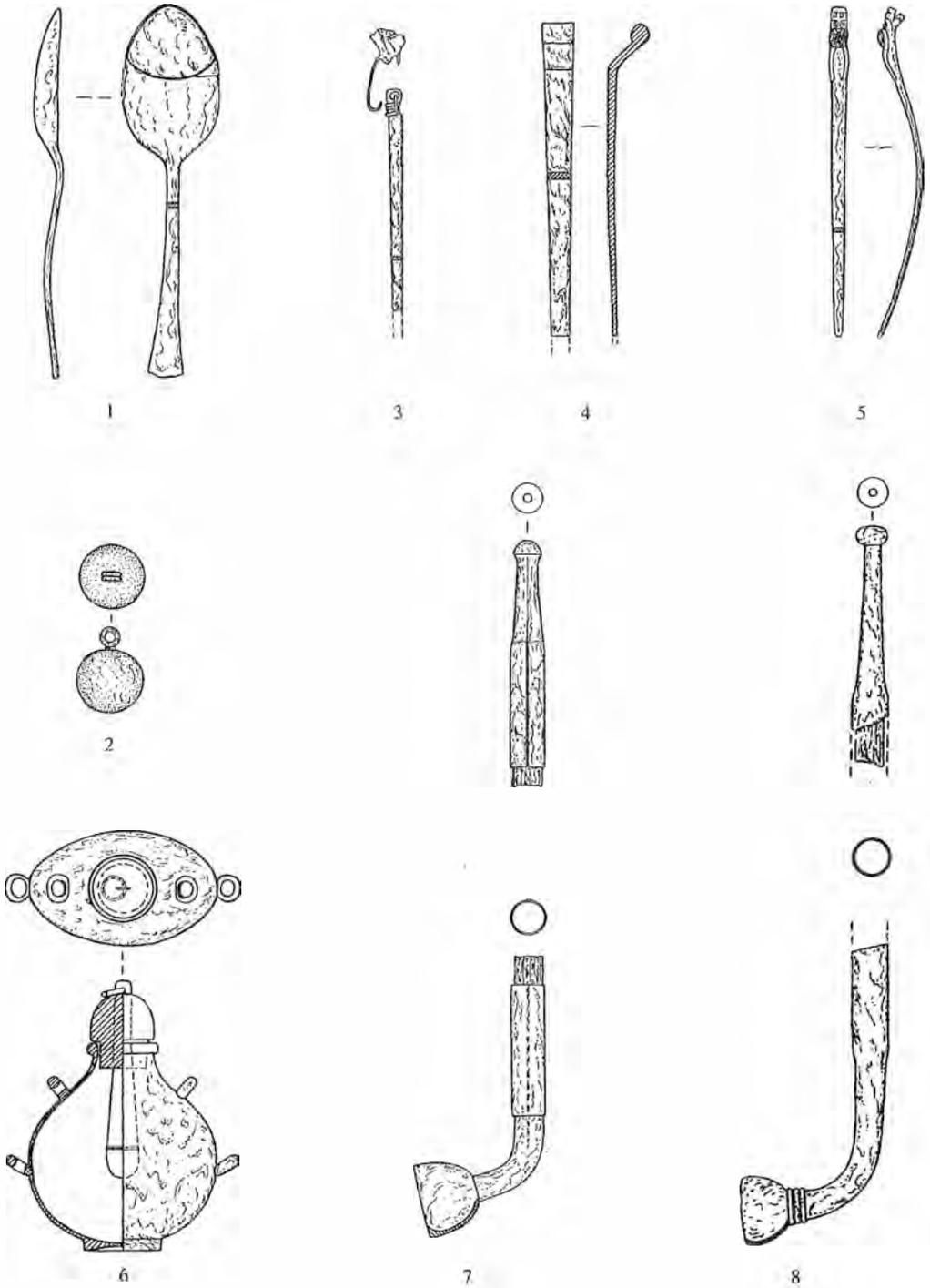
珠子50颗(M8:5)。圆形,中心有穿孔。大小不一,大者直径1.5厘米(图六:5);小者直径1.1厘米(彩四:3)。

玻璃瓶1件(M17:10)。呈扁体长方形,侈口,平沿,尖唇,短颈微束,斜肩直腹,平底附矮圈足,素面。通高8.65、口径1.9、底径2.7厘米(图六:6;彩四:4)。

三、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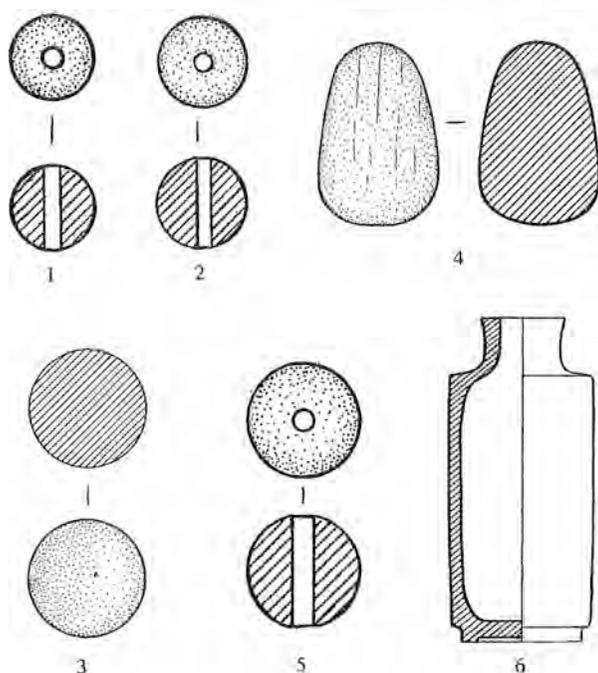
通过对本批墓葬的发掘清理,我们对该地区墓葬的年代及墓葬习俗、墓室构造情况有了初步认识。

迁移墓7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圜墓,土质松软,墓坑边沿不整齐。其中除M3内



图五 出土铜器

1. 铜勺(M3:1) 2. 铜扣(M18:4) 3、4、5. 铜管(M14:1、M17:2、M26:5)
6. 铜鼻烟壶(M8:6) 7、8. 铜烟锅(M17:4、M17:9)(1~8均为1/2)



图六 出土随葬器物

1,2,3,4,5. 石料珠(M18:5,M22:2,M8:8,M8:7,M8:5)
6. 玻璃瓶(M17:10)(1,2,5为1/1,余为1/2)

清理出铜勺1件外,其他墓葬中均未发现骨架及任何遗物。

清代墓葬20座,有瓮棺墓、单棺墓、双棺墓和三棺墓。瓮棺墓呈不规则形及刀把形,单棺墓、双棺墓和三棺墓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圜墓。出土的器物中,陶器较少,器类也仅为罐一种。瓷瓮较多,均为瓮棺所出。此外,墓葬还出土有石器、铅器、玛瑙饰、玻璃器等。M18、M20两瓮棺顶部均有大方砖盖,M18盖下有二道砖砌墙,M20盖顶下是砖砌墓室,口小底大,无铺地砖。

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所清理的27座墓葬,均为中小型墓葬,墓葬级别不高,应为社会中等或一般阶层身份的墓葬。总之,该批墓葬的清理,为研究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丧葬习俗及本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执笔:张智勇 张治强
胡传耸 刘凤亮
绘图:刘坠生

(上接第84页)

寸,凡水形瓮均周围凿池,储水以祭”,(《清会典事例》卷865)共9座石瓮,27个神位。明代嘉靖时期,方泽坛每岁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神及陵寝诸山从祀(《明会典》卷81)。《清会典事例》中记述说“(乾隆)十七年奏准,天神地祇坛本无专祀,为祈雨则祇告于坛”(卷1082)。在我国关于岳镇海渎、名山大川的祭祀起源很早,祭祀也很广泛。既有朝廷的官府祭祀也有民间百姓的祭拜。关于皇陵山,明代永乐时期建山川坛时便在正殿设有钟山及天寿山之神位,这些山都是明帝陵所在。清代延续了明的做法,将祖先的陵山,包括关外的陵山均予祭祀。清代的五陵山分别为启运山

(永陵)、天柱山(沈阳东陵)、隆业山(沈阳北陵)、昌瑞山(遵化东陵)、永宁山(易县西陵)。明代皇帝曾亲祭祀太岁神,至清“凡祈晴祈雨祈雪,皆三坛并举”(《清会典事例》),遣官致祀太岁、天神、地祇三坛。若寻得所祈则遣官行报谢之礼。天神地祇坛现在坛壝残存。2001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地祇坛内幸存的石瓮迁入先农坛内坛西南予以保护,于其北以花坛植被形式模拟复原了地祇坛。

(作者为原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工作圆满结束

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

一、前言

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是继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之后,全国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广、涉及发掘地点最多、层次最高的文物抢救大会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文物考古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中央领导和相关部委领导的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陈至立等中央领导亲自对南水北调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示“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先行”。

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被列为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和 2006 年重点工作目标。市文物局责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成立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专门负责南水北调北京段的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家发改委、国调办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指导下,房山区文物管理所密切配合下,经过十个月的紧张发掘,北京段南水北调一期工程(拒马河至大宁水库)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圆满结束,并通过了考古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验收。目前考古队将工作重心转入室内整理及报告编写工作。

二、主要工作内容

在前期勘探及发掘过程中,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健全制度、规范工作

针对南水北调考古发掘工地多且分散,技工和工人较多这一情况,考古队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文件,制定了《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队内管理制度》、《工地管理制度》、《南水北调文物安全责任》等制度。依据国家文物局所颁发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制定了《探方发掘记录要点》、《灰坑发掘记录要点》、《窑址发掘记录要点》、《墓葬发掘记录要点》等技术规范。确保了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二)严格要求,精探细掘

针对南水北调管线分布较长,遗迹众多这一情况,考古队制定了《文物勘探技术规范》。勘探时做到每孔必记,发现现象立即重点勘探,确保不漏探,发现的文物遗迹现象结合重点勘探予以确认。

考古发掘基本上做到对遗址和墓葬分布较密集的墓葬区进行探方发掘,由上至下由晚到早逐层清理的科学方法揭露遗迹现象。采用彩色正片、负片、数码摄录像的形式留取发掘成果。对每一处重要遗迹取土样进行浮选研究,对人骨全部清理鉴定。完成了每处文物遗迹点的文字和电子版记录档案。

(三)加强保卫、确保安全

针对发掘现场紧临村庄,围观群众较多、人员混杂这一情况。考古队采取了在发掘区外以警戒线圈围场地、限制闲杂人员进入、发掘工地实行 24 小时值班等安保制度,确保考古发掘现场及文物的安全。同时制作了保护文物的标志牌及条幅,每一处考古发掘工地都有两块《文物保护法》的宣传板,加强文物保护教育。文物考古发掘工作期间,没有发生一起文物被破坏或丢失

事件。

三、考古发掘成果

自去年7月起,南水北调管线勘探工作共完成勘探面积272万平方米,探明遗迹19350平方米。从而为全面开展发掘工作提供了确凿依据。

在此基础上,去年11月初至今年8月底,考古队先后完成了南正遗址发掘区、岩上墓葬发掘区、六间房墓葬及坟庄遗址发掘区、皇后台墓葬发掘区、顺承郡王家族墓地发掘区(包括新街、辛庄、瓦井、周口、西周各庄遗址)、丁家洼遗址发掘区、前后朱各庄墓葬发掘区(包括丁家洼村东墓葬、羊头岗村北墓葬和村南窑址)、果各庄遗址发掘区8处遗址点共计1636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彩二)。时代跨度为战国、汉、唐、辽、金、明、清,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20余座、窑址13座及灰沟、灶址等其他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瓷器等大量各类遗物。

南正遗址位于长沟镇南正村北,共分为三个发掘区,I~III区发掘面积共计约666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42座、墓葬26座、陶窑7座、灰沟6条、灶址5座。出土的陶器(彩三:1)、石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总数约有千余件,延续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辽金。

战国时期的主要遗迹为灰坑和陶窑,器型主要为夹云母红陶圈底釜、粗砂灰陶瓮、夹云母灰陶折腰釜、细砂灰陶豆等,并出有大量的板瓦和筒瓦,饰纹瓦当10余枚。

南正遗址的墓葬计有汉代墓葬23座,辽金时期墓葬3座。汉墓以东西方向居多。由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生前财富、风俗习惯不同,墓葬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三种类型,部分墓有券顶、棺台或器物台。多数墓已被盗掘,骨架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分已不存。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铜器、骨器、石器、玉器次之,并出有大量的“货泉”、“五铢”铜钱。

南正遗址所清理汉墓不仅反映了拒马

河流域在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汉代居民的文化风俗和经济状况。将对研究这一地区乃至北京南部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岩上墓葬区位于长沟镇南正村西北部,发掘面积为3250平方米。根据墓葬的开口层位、随葬器物组合可将其分为战国至西汉初期、东汉至南北朝、清代三个时期,墓葬70座。

清理战国至西汉初期瓮棺葬14座、竖穴土坑墓30座。瓮棺葬均为南北方向,以完整或残破的陶瓮套接而形成,少数瓮棺内发现残存人骨和牙齿。竖穴土坑墓以单人葬为主,棺内人骨保存较差,发现的随葬器物较少,有鬲、豆、铜带钩等。

清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砖室墓10座、砖石混构墓2座。墓向以南北方向为主,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三种类型。墓葬多数被盗,发现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类型有陶釜、鬲、豆、罐、盆、壶等实用器及猪圈、灶、俑等明器(彩三:2),还有少量铜器(彩三:3)。

清理清代墓葬14座,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青花瓷碗、铜簪、“康熙通宝”等。

岩上墓葬区的出土遗物为了解和研究本地区墓葬制度的演变、社会习俗的变迁提供了众多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战国时期燕文化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间房墓葬区位于长沟镇六间房村东,发掘面积计约350平方米,共清理清代墓葬10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头向皆朝北。这10座墓以双人合葬墓为多,有明显的迁葬习俗。合葬墓中西棺皆为女性,东棺为男性。出土随葬品有青花瓷瓶(彩三:4)、瓷碗、铜手镯、铜簪、“康熙通宝”和银头饰等,铜器、瓷器皆较为珍贵。六间房墓葬的出土文物,是研究清代中晚期民俗的重要资料。

坟庄遗址位于长沟镇北郑村北,发掘面积为650平方米,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灰坑2个。出土器物以夹云母红陶釜、瓮、

钵等为主。这是了解当时手工业制陶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皇后台墓葬发掘区位于韩村河镇天开村东,分为东区和西区,发掘面积总计为500平方米。清理辽金时期墓葬两座,陶窑一座,出有黄釉瓷瓶、灰陶罐等遗物(彩三:5)。所清理之墓葬在形制上具有辽代小型砖室墓的特征,它的发现对研究辽金时期丧葬习俗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顺承郡王家族墓葬区,包括新街、周口、瓦井、辛庄、西周各庄5个地点。

新街墓葬区位于周口店镇新街村北,分为两区,发掘面积共约22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0座,出有陶器、铜器等物(彩三:6)。新街所清理的明清墓葬,为研究明清两代北京地区的墓俗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周口遗址位于周口店镇周口村东,发掘100平方米。清理窑址1座。大体年代为辽代前期。西周各庄遗址位于韩村河镇西周各庄村东,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清理窑址1座,年代大致属辽金时期。周口及西周各庄陶窑的发掘,对于了解该地区古代陶窑的结构、制陶工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填补该地区古代制陶业演进中的缺环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辛庄墓葬区位于周口店镇辛庄村东,发掘面积75平方米,清理清代墓葬3座。两座为单人葬,一座为双人合葬,仅有少量随葬品。

丁家洼遗址位于城关镇丁家洼村西南,共分为三个发掘区。发掘面积达285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127个,灰沟4条。

根据遗址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形制,大致可将遗址分为春秋早中期、春秋晚期、春秋战国之际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发现的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的铜器、玉器、动物骨骼等。陶器以夹云母陶为大宗,次为夹砂陶和泥质陶。陶色以红、褐为主,灰、黑次之。纹饰以绳纹为主(又有粗、细、抹光之分),还有少量的弦纹、附加堆纹等。主要的器型包括鬲、豆、盆、罐、纺轮等。

丁家洼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系统发掘的春秋时期燕文化居住生活遗址,填补了东周燕文化既往考古发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遗址内涵丰富,为东周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具体的资料,也必然使学界对于东周燕文化面貌的认识更加深入。

前后朱各庄村墓葬位于城关镇(包括丁家洼村东墓葬、羊头岗村北墓葬和村南窑址),总共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共清理唐、宋时期墓葬4座、窑址3座,出土各类质地文物20件。

前后朱各庄墓葬发掘区所清理的3座唐墓,为研究唐代燕山南麓地区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这3座唐墓具有明确的纪年,时代相距较近。其中1座带斜坡墓道,2座为竖井墓道,对研究晚唐时期墓葬的分期以及斜坡墓道向竖井墓道的转变等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三座陶窑为研究东周及辽金时期燕山南麓地区的制陶工艺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陶窑形态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果各庄发掘区位于青龙湖镇大、小苑上村,完成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辽金时期灰坑3座,发现清代砖窑1座。所发掘的砖窑反映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砖瓦业的烧造工序。

南水北调考古勘探及发掘过程中,运用了GPS卫星定位、全站仪测绘、浮选仪提取古植物遗存、氢气球、气艇等设备进行高空摄影等高科技手段,全面获取最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必将有力地推进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在发掘过程中,贯彻、宣传和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唤起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成为向公众、向社会全面展示国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大舞台。

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文物保护工作,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掘工作的完成,对于抢救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执笔:张治强、郭京宁、孙勤、陈亚洲、马绍山

平谷区王辛庄镇西杏园村北的汉代窑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平谷区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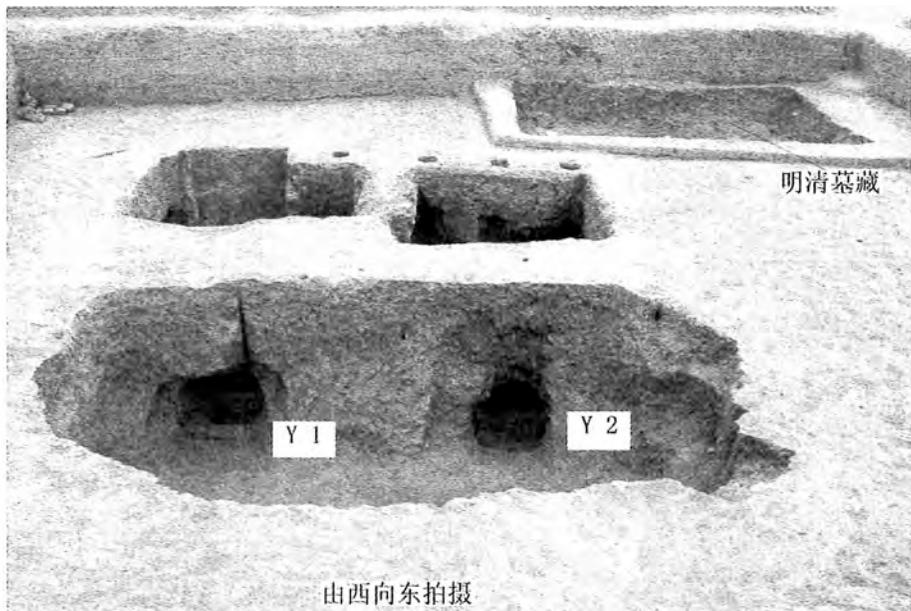
2006年3月至4月,为了配合北京市平谷区北山路道路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平谷区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对工程占地范围内勘探到的窑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清理。此窑址位于王辛庄镇西杏园村北乐园公路东侧,此处原为一片果园,考古工作者同时勘探到古墓8座,窑址大致位于古墓发掘区的中部。

窑址的发掘采用探方形式开挖,南北长10米,东西宽10米。探方的东南角第①土层下,暴露出明清墓一座。窑址位于探方的中部偏北,土层第③层以下,打破生土层,窑口距地表85厘米。其中,第①层为耕土层,厚25~35厘米,土层松散湿润,呈灰褐色,内含有较多的植物根系、木炭灰颗粒、少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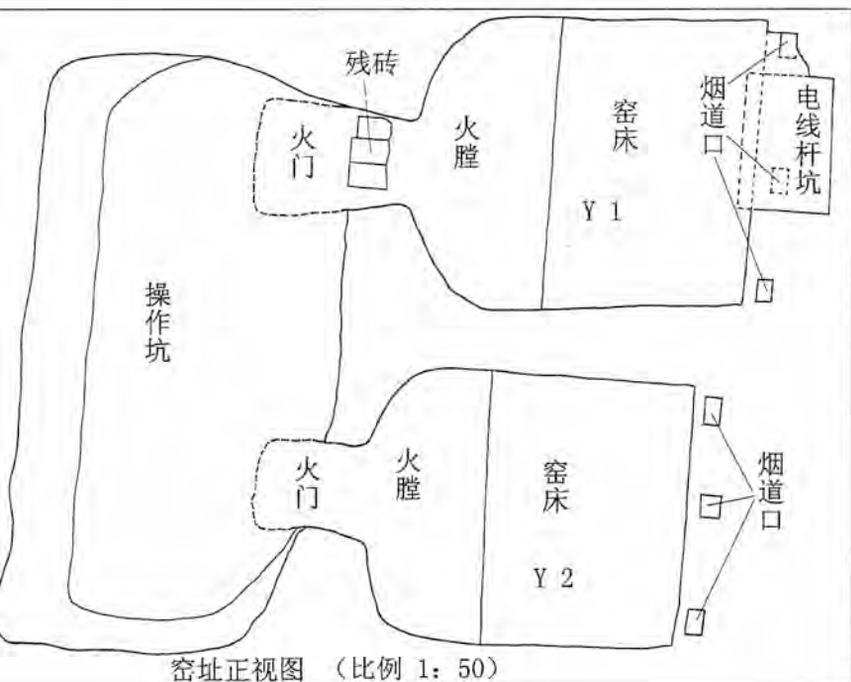
的残碎瓦小块状,该土层堆积分布均匀。第②层为明清土层,距地表25~5厘米,该土层厚度为25~35厘米,土层较为松散湿润,呈黄褐色,内含有少量的植物根系、少量的木炭灰颗粒,此土层分布于整个探方,地层堆积均匀。第③层为唐宋时期土层,距地表50~70厘米,厚度为20~25厘米,土质较硬,呈黑褐色,内含有极少的残砖块,砖面一侧有粗直绳纹,砖宽14厘米、厚6厘米,该土层堆积均匀。

一、窑址的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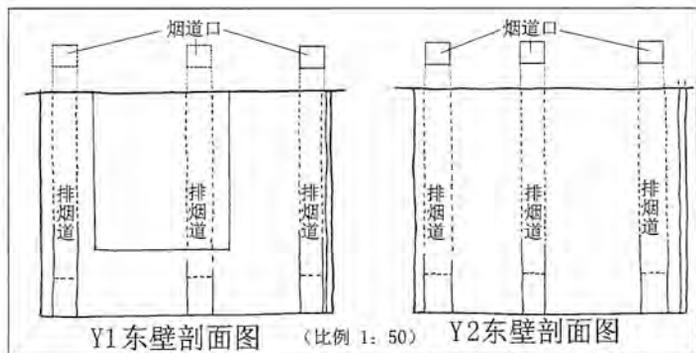
此窑为地穴式双室窑,坐东向西,方向280度。北窑室(暂定为Y1)和南窑室(暂定为Y2)相连紧密,中间仅有一墙之隔,墙厚40~53厘米。两个窑室的形制、内部结构大致相同,两个窑室的大小也相差不多。窑址由操作坑、火门、火膛、窑床、排烟



由西向东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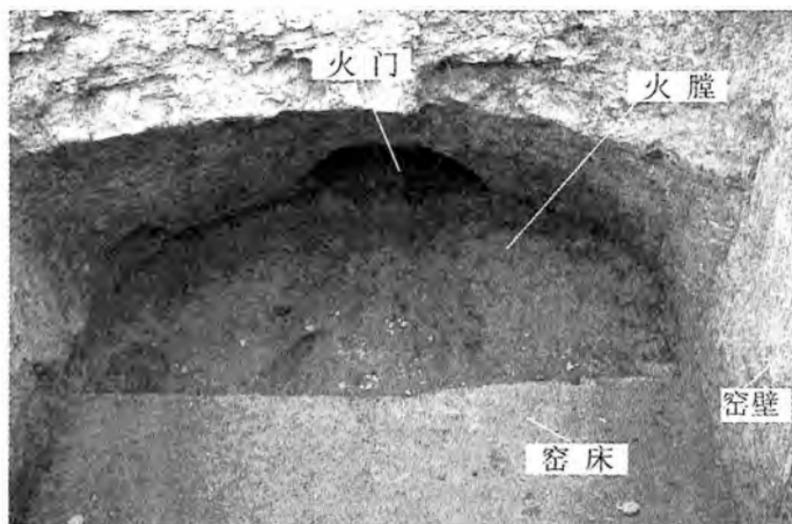
窑址正视图 (比例 1: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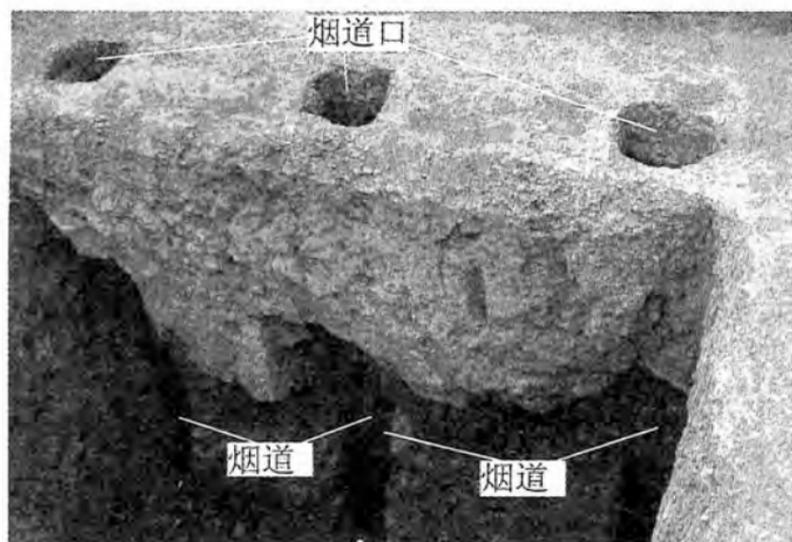
Y1东壁剖面图

(比例 1: 50)

Y2东壁剖面图



窑室的内部结构



道五部分组成。

操作坑:操作坑位于窑的西端,呈不规则形,口大底小,两个窑室共用。坑壁的北、西、南三面不规整,略呈斜坡状;东壁较为规整,Y1和Y2的火门位于东壁的下部。操作坑的底部近似长方形。上口南北长406厘米、东西宽222厘米,底长382厘米、宽174厘米,深132厘米。

火门:两个火门均近似圆弧形,火门的周壁不规整,烧结面凹凸不平。Y1火门宽58厘米、高42厘米,Y2的火门宽68厘米、高56厘米,两个火门的中心相距220厘米。

火膛:火膛位于窑室的西部,西与火门相连,东与窑床相接。底部平面略呈圆弧形,剖面呈喇叭形。

Y1的火膛的底部低于窑床28厘米,底部呈坡状且不平坦,有凸凹的痕迹,内含少量的残砖块。顶部和底部的壁经火烧结后呈黑灰色,较坚硬。火膛南北长204厘米,东西宽94厘米,顶高42~90厘米。

Y2的火膛底部低于窑床26厘米,与火门底部呈缓坡状,底部不平坦。内含有木炭灰颗粒,少许残砖及红烧土。顶上部经火烧结后呈灰色,十分坚硬。火膛南北长186厘米,东西宽86厘米,顶高68~124厘米。

窑床:窑床位于窑室的东部,顶部坍塌形状无法确定;底部平坦,呈长方形。窑壁光滑整齐,烧结面厚度为2~3厘米,烧结面以内为红烧土。Y1的残高142厘米,南北长194~200厘米,东西宽140厘米。Y2的残高146厘米,南北长182厘米,东西宽134~138厘米。

排烟道:每个窑室的东壁,分布着三个形制大致相当的烟道,烟道的上部保存完整,下部残塌严重。排烟道上口平面近似正方形。

Y1的烟道之间的间距为58~68厘米,烟道宽16~18厘米,深度为29厘米。除南

侧一个保存完整外,其余两个被现代开挖的电线杆坑挖掉,只残留底部。

Y2的排烟道间距为50~62厘米,宽18~20厘米,深度为20~24厘米。烟道上部保存完整,下部残塌严重。

二、窑室内的文化堆积与包含物

Y1的窑室内堆积的为黑色杂土,夹杂有较多的红烧土块及木炭灰颗粒。土质松散,内含少量残砖。能分辨粗直绳纹和斜绳纹,其中一块残砖纹饰为波浪纹。

Y2的窑室内堆积的均为黑灰色杂土,夹杂较多的红烧土颗粒。土质松散,含有较少的木炭灰颗粒及残砖块,砖块能分辨清纹饰的有粗直绳纹,其中只有一块板瓦残片出现,饰纹为内布纹外素面,器物口沿残片一块,无纹饰。

三、窑址的年代

关于窑址的建造、使用年代,可以依据现场发掘资料作出初步的推断。从遗迹的叠压关系看,窑址位于唐宋时期的土层之下,处于生土层中,且没有受到唐宋时期人为的破坏。在清理Y1的火门时发现,火门的底部是由汉代的绳纹砖砌成。窑址内的遗物较少,没有发现魏晋及其以后各个朝代的遗物。根据窑址的形制、地层及窑内的包含物推断,该窑为东汉时期建造。

该窑的周围分布了7个砖砌的东汉时期的墓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以此分析,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应由该窑烧制。

执笔:刘保山、朱志刚

摄影:刘凤亮



图 18 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
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形环

浅谈 新石器时代 鸟类形玉器

虞海燕

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出土有各式鸟类形玉器。目前发现出土鸟类形玉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本文以已发表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玉鸟为研究对象，力图全面收集考古发掘资料，对鸟类形玉器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形制、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

一

(一) 红山文化出土的鸟类形玉器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在距今6700~5000年前后。在红山文化的多个遗址中均发现有玉鸟形器。

1.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一号墓出土玉鸟一件，玉鸮二件^①。

玉鸟（图1），玉色灰白，间有淡绿色。为展翅鸟形，翅尾较宽，除头部雕出耳、目外无细部加工。背有横穿小孔，长3.8厘米。

玉鸮二件，玉呈淡绿色，都是正面展翅形，翅、尾有表现羽纹的刻划，背面都横穿一孔。其中一件翅尾较宽，头部雕出耳、目，长2.5厘米（图2）。

另一件鸮头部有尖耳，翅较前一件鸮窄，而尾较伸展，长3.1厘米（图3）。

2. 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出土玉鸟一件^②（图4），玉鸟的形式简单，鼓脊宽尾，背面有横穿孔。

3.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采集到玉鸟形器三件^③，其中玉鸟一件（图5）：两眼微鼓，脊背隆起，扇形尾，用凹凸纹表示，腹面靠头部有横穿孔，长2.5、宽3厘米。

玉鸮二件。其中一件玉鸮（图6）头顶有两个外凸的耳，耳下浮雕圆眼，弧形喙，双翅展开，竖刻两条象征羽毛的凸线纹，尾端平齐，加饰一三角形，两爪并列置三角形上，作攀附状，胸腹微鼓。背面平齐，有三组横穿孔。

另一件玉鸮（图7）形体稍小，头顶平齐，复线刻圆眼，三角形长喙向下凸出，双翅和尾部各有三、五条竖列凸线纹。背面平直，有两组交插穿孔。

4.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出土绿松石鸮一件^④（图8），鸮作展翅状，整体通过浅细的阴刻线刻画出头、目、喙、羽翅、尾等部位。头侧有单孔，背部中央有横穿孔。绿松石鸮长2.5、宽2.8、厚0.4厘米。

5. 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出土小玉鸟一件^⑤（图9），玉呈青白色。形状较为特殊，为简化的展翅鸟，两翼和中央用单刻阴线来区分身与翅。上部中央有一钻孔。玉鸟高2、宽3.3、厚0.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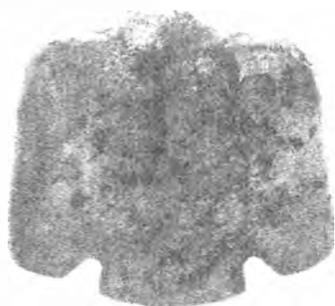


图1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一号墓出土玉鸟



图2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一号墓出土玉鸮



图3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一号墓出土玉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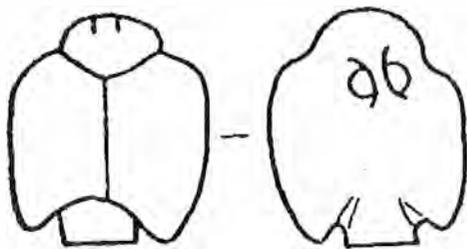


图4 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出土玉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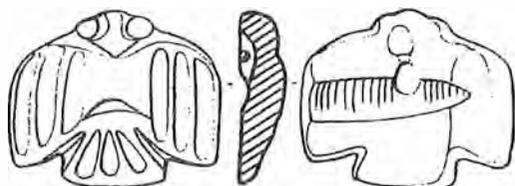


图5 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采集到的玉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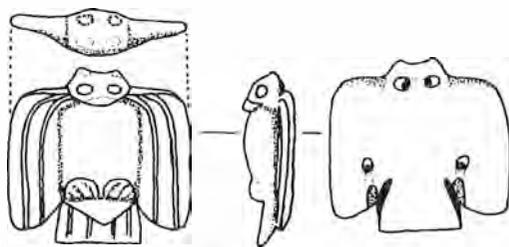


图6 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采集到的玉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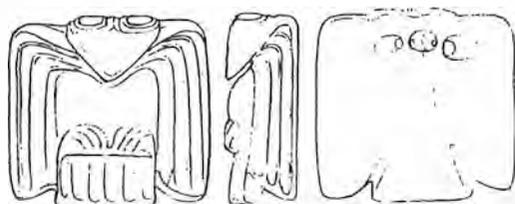


图7 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采集到的玉鸮



图8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出土绿松石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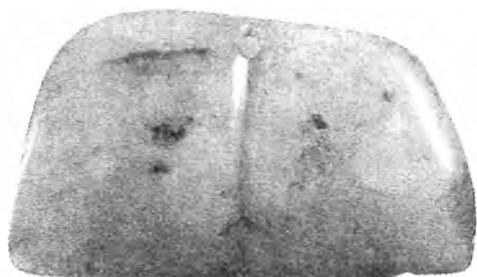


图9 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出土小玉鸟



图11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玉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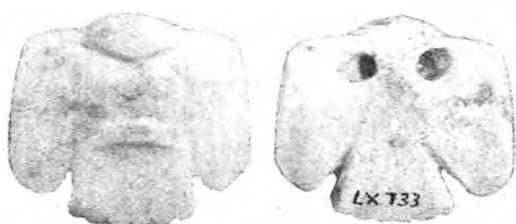


图10 辽宁省阜新县福兴地出土玉鸟正、背面



图12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出土玉鸟



图13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墓14出土玉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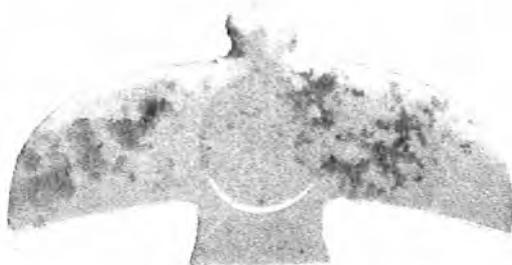


图14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墓17出土玉鸟



图15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墓15、墓16出土玉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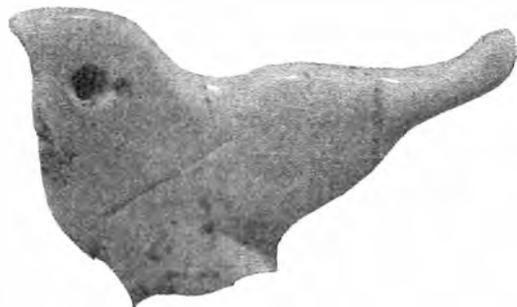


图16 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出土玉鸟

6. 辽宁省阜新县福兴地出土玉鸟一件^⑥(图10),玉呈青白色。鸟展翅下垂,有几道羽纹,并以阴刻线区分头、目、喙,腹部中央隐起一横条状表示爪,锯齿状宽尾。背部无纹,有一对横穿孔。玉鸟高3.1、宽3.6厘米。

7. 近年来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M4中发现了红山文化玉器中的新器类——玉凤^⑦(图11)。玉凤被枕于头下,玉呈淡青色,有钙化。凤高冠,圆眼、扁喙带钩,做回首状。身体的羽毛用阴刻线表示,颈与背羽之间镂空,整体线条优美流畅。背部有四对横穿隧孔,通长19.5厘米。

(二) 良渚文化出土的鸟类形玉器

良渚文化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是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碳-14年代大体处于距今5300~4000年之间。在瑶山、反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玉鸟形器。

1.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现玉鸟一件^⑧(图12),为青玉,整体近似扁平三角形,一端尖突,另一端两翼舒展,中间略凸起。正面尖端用浅浮雕和阴刻线琢出兽面图案。如将鸟嘴向下,犹如俯冲而下的青鸟,又似挺角露齿的牛首。

2.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现玉鸟四件^⑨,鸟尖喙短尾,两翼外张,作振翅高飞状,头部微凸起,背部微凸或微凹,背面均钻一对或两对小穿孔。

墓14出土玉鸟(图13),玉呈黄色,有茶褐色斑点,双眼重圈,微凸,颈、背、尾部微凹,背面一对小孔,长4.3、两翼5.3厘米。

墓17出土玉鸟(图14),玉呈白色,右翼有茶褐色斑点,左翼有浅青色斑点,双眼微凸,未钻圆圈,颈背微凸,背面有两对小孔。长2.6、两翼宽4.7厘米。

此外,墓15、墓16出土的玉鸟(图15)大体与以上器型相近。

3. 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出土玉鸟一件^⑩(图16),玉呈乳白色,为侧立鸟形,鸟似在鸣叫,鸟尾上扬。鸟目为一透孔,浅刻细线

象征羽毛。高1.8、宽2.7、厚0.3厘米。

(三) 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鸟类形玉器

安徽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遗址年代经碳-14测定,距今 $5560 \pm 195 \sim 5290 \pm 185$ 年(经树轮校正)^⑪,与红山文化年代相当,早于良渚文化。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鹰一件。

玉鹰^⑫(图17),玉呈灰白色,两面雕刻相同。鹰作展翅飞翔状,展开的两翅各雕一猪头,头略仰,侧向一面,尾展开。头部雕琢十分逼真,眼睛为一面钻的圆孔。腹部阴刻规整的圆圈,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内又刻一圆,圆内偏上有对钻孔眼。尾部雕琢扇形齿纹,表面抛光。玉鹰长8.4、高3.5、厚0.3厘米。

(四) 石家河文化出土的鸟类形玉器

在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玉器大致有五批集中发现,其中发现有玉鸟形器的地点有: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镇肖家屋脊遗址、湖南省澧县孙家岗遗址。罗家柏岭遗址和肖家屋脊遗址接壤,地层关系基本相同,同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其时间范围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孙家岗遗址的年代有可能属于石家河文化中期。

1. 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形环^⑬(图18):玉呈鸡骨白色。凤尖喙,顶戴羽冠,圆眼,长尾,尾翎分为两叉。长弯喙插入尾翎,凤身卷曲,头尾相交成环状。玉凤的纹饰通过剔地隐起的浅浮雕方式表现,两面纹饰相同,但一面纹饰清晰,一面则较差。肉径4.89、好径2.2厘米。

2. 石家河镇肖家屋脊出土玉飞鹰一件^⑭(图19)。玉为黄绿色,有白色纹斑。正面浮雕,反面光素。鹰作飞翔状,扁钩形喙,小圆眼,背较宽,尾较圆,浮雕羽毛纹。双翅略向上抬举,并向后斜展。翅肩突出,翅近尖处分叉。每翅上有四道平行带钩的羽翎,形象矫健有力。翅尖间最宽4.2、身

长 1.9、尾厚 0.35 厘米。

3. 湖南省澧县孙家岗出土玉凤形佩^⑤ (图 20): 整器用镂雕方式表现, 凤鸟头戴羽冠, 曲颈长喙, 展翅卷尾, 构图巧妙。通长 11.6、宽 6.2 厘米。

二

在这些新石器时期的不同文化类型的墓葬中都出土有鸟类形玉器。鸟在古代先民心目中处于何种地位, 在我国上古时代的综合志书《山海经》中有所体现。《山海经》内容涉及古代地理、物产、巫术等, 其中原始神话、原始宗教的材料颇丰。在这部书中描述的鸟有的能预示福祸、有的具有超凡能力, 例如: “又东五百里, 曰丹穴之山, ……有鸟焉, 其状如鸡, 五采而文, 名曰凤皇, 首文曰德, 翼文曰义, 背文曰礼, 膺文曰仁, 腹文曰信。是鸟也, 饮食自然, 自歌自舞, 见则天下安宁。” “又东四百里, 曰令丘之山, ……有鸟焉, 其状如皋, 人面四目而有耳, 其名曰颡, 其鸣自号也, 见则天下大旱。” “又西二百里, 曰翠山, ……其鸟多鷩, 其状如鸛, 赤黑而两首, 四足, 可以御火。” 在书中有很多这类对鸟的描写, 这可能由于鸟能够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 引起远古人的无限遐想, 认为鸟具有某种特殊的通天本领, 于是对鸟产生了敬畏之情, 这都是源于原始的生灵崇拜。那么出土的玉鸟在各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张光直先生曾经明确提出: “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⑥ 萨满教是北方少数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 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因满一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的巫师称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各族间虽无共同经典、神名(近亲部落除外)和统一组织, 但彼此有一致相同的几个基本特征, 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⑦ 萨满教以巫术为主要形式, 萨满承担

着沟通人神之间信息的职责。直至近世, 我国的满、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达斡尔、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裕固、朝鲜等少数民族中仍保留着萨满教信仰或萨满教遗迹^⑧。

目前, 我国的考古学界, 特别是北方考古学界, 已经把萨满教作为文化源头进行理论思考, 并以萨满教为参照物, 对考古中的信仰遗物进行意义分析^⑨。红山文化是分布在辽西至内蒙古东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正是处于萨满教的文化背景下。在萨满教的祭坛上, 有许多动物神灵, 其中包括大量灵禽。在祭祀仪式上萨满还经常模仿飞禽的动作和鸣叫。“在早期的萨满教野神祭祀的跳神仪式中, 萨满迎请鸟神降临, 模拟鸟类飞腾的多种体态, 气氛最为活跃、火爆、虔诚、感人。”^⑩ 可见, 在萨满教意识中鸟被赋予了超凡的神秘性, 认为它们是上天的信使, 是萨满的助手神灵, 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意升降于天与地, 在人与神之间传达信息。因而在萨满的神服和神器上普遍都有鸟类造型或代表鸟类的饰物: 满族等民族神帽上便有数只奋飞的鸟饰; “乌德赫人在萨满袍后面, 肩部和袖子上缝着四络鹰羽……奥罗奇人也有这种在肩胛处带羽毛的萨满服。”^⑪ 出土的红山文化鸟类形玉器的背面均有牛鼻形穿孔, 可以缝缀在衣物上, 它们应该就是缝在萨满神服上的饰物。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 M4 中发现的玉凤出土时被枕于头下, 也许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死者是位通神的巫者, 将玉凤放置其头下, 是为了将其灵魂与头脑中的信息通过玉凤带到天际, 与神沟通。

在其他文化类型的墓葬中出土的玉鸟形器除了用作装饰外, 也多少都带有原始宗教的意味。例如良渚文化的玉鸟与红山文化玉鸟相似, 在背面有牛鼻状的钻孔, 出土时一般位于墓主人的下肢部位, 有学者推测是缝缀于巫师衣袍下部的一种功能性装饰, 寓意鸟是良渚之神的驭驶工具, 协助巫师与天神沟通。

凌家滩出土的玉鹰有些与众不同。玉



图 17 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鹰正、背面

图 19 石家河镇肖家屋脊
出土飞鹰正、背面

图 20 湖南省澧县孙家岗出土玉凤形佩

鹰展开的两翼雕琢似猪头的形象,可以说集鸟、兽形象于一身。俞伟超先生在分析凌家滩璜形玉器时,对一端饰鸟首另一端饰其他动物的玉璜有如下论述:“应当注意到,这两件璜形器一端皆饰有鸟首这一现象。凌家滩的地理位置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即古史传说中屡屡提到的东夷、淮夷等集团活动的区域,他们刚好以鸟类作为图腾祖先。这就可以认为,璜形器上的鸟首正是当地居民的图腾祖先的象征物。另一端的其他动物自然就是其他氏族的图腾祖先的象征物。两种图腾共处一器的现象,无疑正意味着此器是两地氏族一部落实行通婚的一种物证。”^②这也许对解释玉鹰的集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的原因有借鉴意义。此外,玉鹰的腹部阴刻规整的圆圈,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内又刻一圆,圆内有一孔。也有学者推测玉鹰上的八角星纹与1987年M4出土玉片上刻画的原始八卦图应有密切的联系,可能象征某种宗教观念,也可能是凌家滩氏族徽帜的代表^③。

三

这些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墓葬中出土的玉鸟形器,在选择题材、雕琢工艺上均有着不同的特点。

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鸟大多取像于鹰、鸮等猛禽,在造型上往往表现鸟处于翅膀未完全展开,好似微微抖动正要起飞的状态。红山文化玉器最大的特色就是神似,玉鸟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只是在主要部位加以刻划,线条多为浅凹槽纹,纹饰虽显模糊,却富于变化。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鸟则多取像于鸽雀类性情温顺的飞禽。良渚文化玉器中的动物造型都强调动感,玉鸟亦是如此,都作展翅飞翔或引颈远观状,造型上玉鸟翅膀完全展开,并且突出胸脯,在翅尾处均无线条表示羽毛。虽然出土的这些玉鸟大多光素无纹,没有充分表现良渚文化高超的线刻艺

术,但从瑶山出土的那件玉鸟上阴刻的纹饰也可略见一斑。

凌家滩的玉鹰双翅伸展作飞翔状,但翼端却做成动物头形,似集鸟、兽特征于一身,造型奇异。鹰身腹部刻圆圈及八角星纹。鸟、兽双目均穿孔,和良渚文化玉器中的一些动物双眼做法相似,这种玉鹰制造过程中采用了半圆雕、阴线刻、管钻、镂孔等多种技法,可以说代表了凌家滩玉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石家河文化的玉鸟形器除形象写实的玉鹰外,还有颇具神话色彩的凤鸟形象,造型独特,有别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玉鸟。石家河文化的玉凤皆举首、扬冠、卷尾,显示了当时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同时,玉凤的表现方法也别具一格。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玉凤形环,巧妙地采用头尾相交的方法形成环状,并使用剔地浮雕的方法表现凤羽等纹饰。湖南省澧县孙家岗 14 号墓出土的玉凤佩整器用镂雕技法成形,玲珑剔透。石家河文化的玉凤可以说代表了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雕琢水平。

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大型墓葬或具有祭坛功能的遗址。古人认为玉有灵气,乃得天地阴阳精灵之气交研而成,非一般人所能使用,是巫与神沟通的媒介载体,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以上出土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玉鸟形器,也并非只是一般的装饰品,使用者或为通灵的巫者、或为氏族首领,因此基本上都是属于礼仪用器。有的玉鸟在进行祭祀等仪式活动中充当上天的信使,有的则代表氏族特殊意义。在史前社会,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出土的鸟类形玉器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面貌提供了物证,同时,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玉雕的工艺水平。

①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第2页。

②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第501页。

③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

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第516页。

④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⑤⑥ 辽宁省文物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⑦ 朱达、王来柱:《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5日。

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第48页。

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第29页。

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⑪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⑫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第9页。

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225页。

⑭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⑮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处:《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2期。

⑯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⑰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930页。

⑱ 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⑲ 孟慧英:《考古与萨满教》,《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⑳㉑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㉒ 俞伟超:《凌家滩璜形玉器刍议》,《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㉓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第10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出境管理所馆员)

从出土文物看东周燕文化 与玉皇庙文化的联系

• 胡传耸

玉皇庙文化,得名于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的发掘,年代当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或略晚,主要分布于冀北燕山、军都山及其余脉地带,西可达河北省张家口地区,东部可以到达承德地区。玉皇庙文化目前所见主要是墓葬遗存,包括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龙庆峡墓地、西梁光墓地、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甘子堡墓地、滦平梨树沟门墓地、虎什哈炮台山墓地等多处,据统计共约 830 余座^①,在北京延庆还发现一处西周晚期的窖藏^②,未发现相关的居址遗存。玉皇庙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区别于周围考古学文化,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环首刀、大量的以写实动物纹装饰的青铜带钩、马具以及小件金铜牌饰、弹簧形耳环等为其代表性器物。另外,东西向的墓葬、殉葬马、牛、羊、狗头骨及肢骨,以及覆面习俗等也是玉皇庙文化墓葬流行的特点^③。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族属,靳枫毅等学者认为是文献中所见的“山戎”^④;林沅则认为应该是春秋晚期被赵国灭掉的代国^⑤;韩嘉谷则认为应当属于春秋时期的白狄^⑥。在未达成共识之前,杨建华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都以“玉皇庙文化”指称这一类遗存^⑦,是为比较科学和谨慎的做法,本文从之。

东周时期,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毗邻,后者墓葬中常见的殉牲、覆面习俗以及随葬青铜短剑、小件牌饰等现象,不见于燕文化墓葬中,二者在葬俗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而就器物而言,又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关于两者的差别,本文不再赘述,下面根据考古出土文物对两个文化间的联系加以论述。

一、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⑧

位于怀来县城东,背靠燕山。两墓皆为土坑竖穴墓,东西向,填土夯实,M1 长 15.1、宽 5.1 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顶部夯填土中发现杀殉的马、牛、羊的头骨和肢骨,以及随葬的车马器、漆箱等,棺顶上有殉人骨架一具,是杀后肢解放上的,椁外两陪葬棺,陪葬人皆为俯身直肢葬,骨架旁有青铜短剑、环首刀等。该墓共出土随葬品 61 件,包括铜鼎 1、豆形器 1、壶 1、缶 2、鉴 2 及铜兵器、车马器、服饰小件等;M2 的规模较 M1 小,葬俗与 M1 同,出土少量青铜兵器及金、铜饰件等,未见青铜容器出土。

M1 出土的外翻耳铜鼎,见于河北唐山贾各庄、三河县大唐迥、双村、北京顺义龙湾屯、燕下都东斗城等地的燕文化墓葬中,时代当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北辛堡 M1 铜鼎盖部近平,周缘不加钮饰,腹部略深,属于同类器中较晚的形式;北辛堡出土铜壶,当属提梁壶类,同类形制的壶见于春秋晚期唐山贾各庄燕文化墓葬,也见于山西浑源李峪村等地,非为玉皇庙文化本身因素,当为从周围文化中吸收的因素,此又一与燕文化相通者,论者据其体饰多周弦纹或以为可以晚到战国早期,似嫌偏晚;北辛堡 M1、M2 出土形制近似的青铜戈两件,戈内两穿,戈尾扬起,与唐山贾各庄燕文化 M18 出土铜戟的戈部形态近似,唯贾各庄 M18 戈援部较短,首近圭形,当是比北辛堡两戈更早的形式;另,北辛堡 M1 出土一套车軛及辖,軛体饰“几”字形勾连蟠虺纹,軛基部穿辖处有

两孔,辘身穿入害体后,辘末包含在害体中,并不出露于害体以外,同种形制的害辘在北京顺义龙湾屯燕文化墓葬中出土两套,纹饰亦与北辛堡害近似,龙湾屯墓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比北辛堡 M1 略早。与燕文化形制近似的铜器出现于北辛堡墓葬中,并且形制方面均有细微的变化,除了考虑时代因素之外,或许还可以解释为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二、滦平虎什哈炮台山墓地^①

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丰宁县交界处,潮河的上游,共发现墓葬 35 座,皆为土坑竖穴墓,东西向较南北向多,其中 5 座发现杀牲殉葬现象,根据出土器物和葬俗,可以断定这是一处典型的玉皇庙文化的墓地。

M6 是一座方形土坑竖穴墓,头向西偏北 35 度,葬主为男性,葬具一棺,除出土大量玉皇庙文化常见的环首铜刀、铜镰、带钩、带扣外,还出土铜敦、深腹高柄豆各 1 件。与 M6 铜敦形制近似的铜敦见于北京通县中赵甫、河北迁西县大黑汀的燕文化墓葬中,年代当战国中期;而 M6 陶盖豆的深腹风格则可能会较战国中期更晚一些。

在炮台山墓地器物混杂的两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陶盖豆,比较 M6 出土的陶豆,该豆捉手较高,腹较浅,柄高在器高中占有较大比例,为战国中期形制。

M6 墓葬的规模与同墓地诸墓相比,显不出大的差别,与前述北辛堡两墓的规模相比,则差之甚远。出土铜敦的相关描述录于下:

“通体浑圆,盖顶三鸟形环纽,上饰斜三角雷纹,盖身自上而下以三角雷纹地组成宽带纹一周。宽带纹之上又以云雷纹组成三角形图案一周,顶中为交叉式云雷纹图案。敦上下体以子母口相扣,下体花纹与盖基本相似。口部左右有环耳各一,底有鸟首形环足三,通高 20.6、口径 15.4 厘米。”

通县中赵甫墓葬^②的发掘简报中对其出土铜敦的描述如下:

“通高 21.5、腹径 16.5 厘米。圆球形,

器腹口两侧有二环耳,器和盖皆有三个环足或环钮,足与环钮末端呈鸟喙形。器与盖纹饰基本相同,均饰大三角形、变形蟠虺纹,盖顶中心饰涡纹,钮饰斜角云纹。”

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两件敦无论在尺寸形态还是在纹饰方面都是极其近似的,至少从简报发表的线图及拓片上看不出大的差别。那么这件敦或许可以理解为玉皇庙文化自燕文化内照搬来的文化因素,少见改动;发现的两件盖豆,多见于同时期燕文化墓葬中,而很少见于玉皇庙文化,亦当由吸收燕文化因素而来,不过暂时还不能判断其是否由玉皇庙文化本地制作。

三、唐山贾各庄 M18^③

贾各庄 M18 出土外翻耳高圈足铜盘一件,同样形制的盘见于北京延庆玉皇庙 M18,根据两盘各自共出的铜匜可以明确断定玉皇庙的盘要早于贾各庄铜盘,近似形制的盘见于河北灵寿西岔头春秋墓以及李峪铜器群,虽不能判明该类形制的盘源于何地,但至少表明二者拥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者的联系。

四、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 M61^④

玉皇庙 M61 出土一件细高柄浅盘豆,无盖,圆唇,柄细高,中上部填实,此类形制的豆在玉皇庙墓地中仅此一见,非玉皇庙文化本身的因素;而在春秋到战国时期燕文化的遗址以及墓葬中,此类细高柄无盖豆却是数见不鲜。报告作者据此推断玉皇庙墓地下限或许可以晚到春秋战国之际。这件铜豆亦应该是玉皇庙文化就近吸收来的燕文化因素。

而同一墓地中的 M52 出土一件指甲纹三足陶罐,短颈,斜直口,双环耳,鼓肩,腹斜收内敛,圜底,三实足外撇。除此罐外,未见发表同墓器物,结合整个墓地的情况来看,该墓的年代或许也可以放在简报作者所定的两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际。滦平梨树沟

门墓地 L:1653 鼎侈口束颈鼓腹,腹下三外撇矮足,鼎体形态与玉皇庙 M52 出土双耳三足罐近似,唯其肩附环耳与 M52 颈附环耳风格不同。梨树沟门墓地发掘简报定其年代在春秋早期到战国早期之间。

唐山贾 M24 出土环耳三足罐形陶鼎,与玉皇庙墓地出土三足罐形态极似,亦为颈附环耳风格,据简报言,同类器在贾各庄墓地共出 5 件,分别见于 M9、M21、M23、M24、M36,报告仅发表了 M24:1 的线图和照片。该类鼎“敛口,唇外侈,腹作圆球形,两个环耳由唇向外延伸转折下接于肩,腹下附三个圆锥形足,无盖,手制,表面磨光,腹上划有一周‘ ζ ’形纹,灰褐色,部分作黑灰色,也有全部黑灰色的。个别鼎腹内有烟薰痕迹”。据 M23:14 陶壶及小口壶的形态,贾各庄墓地所见三足罐形鼎的年代大致可以定在战国中期较早段,是比玉皇庙、梨树沟门墓地所见三足罐(或曰罐形鼎)要晚,可以顺其自然地认为此乃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的吸收。

综上分析,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就目前发现而言,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的吸收少于后者对它的文化因素的吸收;而且,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因素的吸收,是见于玉皇庙文化不同等级的人群的,从怀来北辛堡大型墓到玉皇庙、虎什哈炮台山的中小型墓中,都见有燕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靳枫毅、王继红在论及虎什哈炮台山东西向墓和南北向墓共存的情况时,认为这是其文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随了燕和中原文化的葬俗”^⑬,可备一说。同样,燕文化也从邻近的玉皇庙文化中吸收了少许因素,但这些因素的数量是极少,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两个文化的交流中,燕文化是主要的输出者。

皇庙文化范畴之外,靳枫毅等则视之为玉皇庙文化早期的代表,据西拔子出土青铜环首刀、直釜斧以及小型铜泡来看,属玉皇庙文化常见遗存,故本文从靳说。

③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 1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五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十二章第五节“玉皇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靳枫毅、王继红把辽宁凌源五道河子战国墓归入玉皇庙文化的范畴,本文不从其说。

④ 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的问题》,《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 1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五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

⑤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⑥ 韩嘉谷:《从军都山东周墓谈山戎、胡、东胡的考古学文化归属》,《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⑦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 年, P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P524。

⑧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 年 5 期。

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7 辑,文物出版社,1983 年。

⑩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 年 8 期。

⑪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六册,1953 年;下引贾各庄墓葬资料出处与此同,不再另行注明。

⑫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 年 8 期。

⑬ 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 1 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业务人员)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P524。

②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把这一窖藏排除于玉



图一



图二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元代铜权

王燕玲

在历代出土和传世的权衡器中,元权的数量相对较多,而史籍中对元代权衡制度的记载很少。元权的实物资料成为我们研究元代衡器制度的主要依据,可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现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数件元

代铜权及近年出土的元代铜权资料为据,对元代权衡器做一浅探。

笔者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的 8 枚铜权形制汇总如下:

表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元代铜权汇总

编号	形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通高(厘米)	实测重量(克)	秤形	铭文
1	I型	“至正二年”(1342)	“大都路造”	9.5	413		阴刻“至正二年”“大都路造”,“三”。
2	I型	“至正十八年”(1358)	“都府造”	9	374	“同十五斤”	正面阴刻“至正十八年”“都府造”;背面阴刻“都府造”“同十五斤”。
3	I型	“至正十八年”	“都府造”	9	524	“同二十五斤”	正面阴刻“至正十八年”“都府造”“三”;背面阴刻“都府造”“同二十五斤”。
4	I型			8.4	382.5		
5	I型			8.3	382		
6	I型			3.5	26.5		
7	II型		“南京”	10.5	1027.2		正面阴刻“南京”;背面阴刻“皇甫”。
8	II型	“至正七年”(1347)	“大都路较”	9.5	707.3	“同二十五斤”	正面阴刻“天一”“至正七年”“官”;背面阴刻“大都路较”“同二十五斤”。

注: I型:倒梯形环状钮,权身呈扁六面体,束腰,底座亦为扁六面体,上有两道突起弦纹。(图一)

II型:倒梯形环状钮,权身呈球体,上大下小,束腰,底座为喇叭形,上有四道突起弦纹。(图二)

近年来,在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湖南、安徽、浙江、四川、云南等地均发现元代铜权。笔者根据有关刊物做了不完全统计,共摘录 66 件,汇总如下:

表二 历年出土铜权资料汇总

编号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通高(厘米)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铭文	来源
1	Ⅱ型	“中统元年”(1260)		9.8	725		正面阴刻“中统元年”;背面阴刻“官”。	《辽海文物学刊》1997.2
2	Ⅱ型			8.6	400		“十”	
3	Ⅰ型		“大都路”	8.7	310		正面阴刻“大都路”;背面阴刻“皇甫”。	
4	Ⅱ型		“南京”	15.9	3000		正面阴刻“南京”;背面阴刻“皇甫”。	
5	Ⅱ型			8.9	475		正面阴刻“己亥”;背面阴刻“皇甫”。	
6	Ⅰ型	“至元陆年”(1340)	“大宁路”	10.1	600		正面阴刻“□天十一”“至元陆年大宁路”“□家造”;背面阴刻“皇甫”。	《文物》1986.4
7	Ⅰ型	“大德十一年”(1307)	“益都路”	10.8	445		正面阴刻“大德十一年”;背面阴刻“益都路”“大一”。	
8	Ⅰ型	“延祐元年”(1314)	“沂州”	9.8	435		正面阴刻“延祐元年”;背面阴刻“沂州”“益都路”“教同”。	
9	Ⅱ型	“延祐七年”(1320)		9.8	575		正面阴刻“延祐七年”;背面阴刻“政勘□□”“一十”。	
10	Ⅱ型	“至治元年”(1321)	“益都路”	10.5	565		正面阴刻“至治元年”;背面阴刻“益都路”。	
11	Ⅱ型			4.8	90			《文物春秋》2002.6
12	Ⅱ型			10.5	667		阴刻“丕八”。	
13	Ⅱ型	“大德七年”(1303)		8.5	440		正面阴刻“大德七年”;背面阴刻“官造”。	《文物》1990.9
14	Ⅰ型	“大德三年”(1299)	“大德路造”	10	725		阴刻“大德三年大德路造”	
15	Ⅰ型	“大德二年”(1298)	“池州路”	9.5	500		正面阴刻“池州路□□”;背面阴刻“大德二年”。	《考古》1994.8
16	Ⅱ型	“大德元年”(1297)	“汴梁路总管府”	11	290		正面阴刻“汴梁路总管府”;背面阴刻“大德元年工造”。	《考古》1986.8

编号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通高(厘米)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铭文	来源
17	Ⅱ型	“延祐六年”(1319)		10.5	705		正面阴刻“延祐六年”“千五”;背面阴刻“校勘相同”“依样成造”。	《考古》 1991.4
18	Ⅱ型	“天历三年”(1330)		10.5	610		正面阴刻“天历三年”“天”;背面阴刻“校勘相同”。	
19	Ⅰ型	“至顺三年”(1332)	“益都路造”	11.5	900		正面阴刻“至顺三年”“平”;背面阴刻“益都路造”。	《考古》 1997.9
20	Ⅱ型	“至元十八年”(1281)	“池州路总管府”	8.8	620		正面阴刻“池州路总管府”“天四八”;背面阴刻“至元十八年造”。	《考古》 1997.10
21	Ⅰ型	“龙凤六年”(1360)	“都府茂勘相同”	11	700		正面阴刻“龙凤六年”;背面阴刻“都府茂勘相同”。	《考古》 1995.1
22	Ⅱ型	“至大元年”(1308)	“杭州路”	9.3	450		正面阴刻“至大元年”;背面阴刻“十号”,“杭州路”,“人字”。	《文物》 1982.4
23	Ⅱ型	“元统二年”(1334)		9.7	450		正面阴刻“元统二年”;背面阴刻“口州路”,“天”。	
24	Ⅱ型	“至大二年”(1309)	“汴梁路”	12	825		正面阴刻“至大二年”;背面阴刻“汴梁路”,“千”。	《考古》 1988.2
25	Ⅰ型	“至元二十三年”(1286)	“益都路总管府”	10	500		正面阴刻“至元二十三年”;背面阴刻“益都路总管府”。	《考古》 1988.3
26	Ⅰ型	“延祐四年”(1317)		9.5	450		正面阳铸“天”,“廿九”;背面“延祐四年”。	《考古》 1988.6
27	Ⅱ型	“大德四年”(1300)	“扬州路官造”	10.5	970		正面阴刻“大德四年”;背面阴刻“扬州路官造”。	《考古》 1988.6
28	Ⅱ型	“大德十年”(1306)		10	960	“计五十五斤”	正面阴刻“计五十五斤”;“大德十年造”;背面阴刻“廿五号”。	
29	Ⅱ型	“至元廿五年”(1288)		8.8	720		阳铸“至元廿五年”,“付廿四”。	《考古》 1986.9
30	Ⅱ型			7.3	283		正面阴刻“口州”;背面阴刻“路造”。	《考古》 1986.11
31	Ⅱ型	“大德九年”(1305)	“兴元路官造”	9.5	470		正面阴刻“大德九年”;背面阴刻“兴元路官造”。	《考古》 1986.11
32	Ⅲ型	“至元三十一年”(1294)	“泉州路摠管府”	8.5	570		正面阳铸“至元三十一年造天口”;背面阳铸“泉州路摠管府”。	《考古》 1986.11

续表

编号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通高(厘米)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铭文	来源
33	Ⅱ型	“至正六年”(1346)	“懿州路造”	8.5	500	“同二十五斤”	正面阴刻“懿州路造”,“同二十五斤”;背面阴刻“至正六年”,“校勘相同”。	《考古》1990.2
34	Ⅰ型	“至顺元年”(1330)	“南京”	9	900	“同三十五斤”	正面阴刻“至顺元年”,“皇甫”,“同三十五斤”;背面阴刻“南京”,“大都路较”。	
35	Ⅱ型	“至元三年”(1266)		11	1400		阴刻“至元三年”	
36	Ⅱ型	“大德七年”(1303)	“潭州路造”	7	235		阴刻“大德七年”,“潭州路造”,“五”。	《考古》1990.5
37	Ⅱ型	“至元八年”(1271)	“益都路总管府”	9.5	550		正面阴刻“工”,“至元八年”;背面阴刻“益都路总管府造”。	《考古》1996.12
38	Ⅱ型	“至顺元年”(1330)	“益都路口”	12	500		正面阴刻“至顺元年”;背面阴刻“益都路口”。	《考古》1996.12
39	Ⅱ型	“至元二十二年”(1285)	“潭州路造”	7.5	350		正面阴刻“至元二十二年”;背面阴刻“潭州路造”,“六”。	《考古》1996.12
40	Ⅱ型	“大德元年”(1297)		10.8	710		阴刻“大德元年”,“十”。	《考古》1996.6
41	Ⅱ型	“大德元年”(1297)	“刘家造”	10.7	700		正面阴刻“大德元年”;背面阴刻“千”,“刘家造”。	
42	Ⅱ型	“至元八年”(1271)	“博州路造”	11.2	858.58		正面阴刻“至元八年”,“地”;背面阴刻“天”,“博州路造”。	《考古》1993.5
43	Ⅰ型	“泰定二年”(1325)		11.5	764		正面阴刻“泰定二年”;背面阴刻“校勘相同”,“日”。	《文物》1992.5
44	Ⅱ型			10.5	750		“□□二土”	《考古》1995.3
45	Ⅰ型	“大德十年”(1306)	“益都路”	10.7	450		正面阴刻“大德十年”;背面阴刻“益都路”。	
46	Ⅱ型	“大德二年”(1298)		8	275		正背面分别阴刻“大德”“二年”。	《考古》1995.1
47	Ⅰ型	“元贞二年”(1296)	“大都路造”	11.2	750		阴刻“元贞二年”“大都路造”。	《考古》1994.10
48	Ⅰ型	“至正廿四年”(1364)	“永平路总管府”	9.4	490	“重廿五斤”	正面阴刻“至正廿四年”,“重廿五斤”,“三十一”;背面阴刻“永平路总管府”,“官造”。	

续表

编号	型制	年代	铸造与 发行	通高 (厘米)	实测重 量(克)	标重或 秤形	铭 文	来源
49	I型	“至正二年” (1342)	“迁安县”	9.5	400		正面阴刻“至正二年”“迁安县”;背面阴刻“官平”。	《考古》 1994.10
50	II型		“大都路较”		220	“同一十五斤”	正面阴刻“大都路较”“同一十五斤”;背面阴刻“上二号”。	
51	II型	“大德元年” (1297)	“益都官造”	9	400		正面阴刻“大德元年”;背面阴刻“益都官造”。	《考古》 1992.1
52	I型	“大德五年” (1301)	“大都路造”	10.5	750	“三十五斤秤”	正面阴刻“大德五年”“大都路造”;背面阴刻“三十五斤秤”及八思巴文。	
53	I型	“大德五年” (1301)		10	580	“二十五斤秤”		
54	I型	“延祐元年” (1314)		8.8	400		阴刻“延祐元年”“王”。	
55	I型	“延祐元年” (1314)		9.6	350		正面阴刻“延祐元年”;背面阴刻“十”,“教同”。	
56	I型	“至元二年” (1336)	“般阳路总管府”	10.6	625		正面阴刻“至元二年”“校勘相同”;背面阴刻“般阳路总管府”。	
57	II型	“中统二年” (1261)		8	402.5		阴刻“中统二年”	《文物》 1987.11
58	II型	“至元八年” (1271)	“中都路造”	8.4	497		正面阴刻“至元八年”;背面阴刻“中都路造”。	
59	II型	“天历三年” (1330)		9.8	665.5	“同贰拾五斤”	正面阴刻“上二”“天历三年”“皇甫”;背面阴刻“大都路较同贰拾五斤”。	
60	II型		“济南路”	10.5	725.3		正面阴刻“济南路”;背面阴刻“官教同”。	
61	I型	“元贞元年” (1295)	“大都路造”	11.2	933	“三十五斤秤”“斤半锤”	正面中间阴刻“元贞元年”“大都路造”,左侧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回鹘蒙文“斤半锤”;背面阴刻汉文“三十五斤秤”及八思巴文“斤半锤”,左侧波斯文“斤半锤”,右侧回鹘蒙文“三十五斤秤”。	

续表

编号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通高(厘米)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铭文	来源
62	I型	“大德八年”(1304)	“大都路造”	11.2	900	“三十五斤秤” “斤半锤”	正面中间阴刻“大德八年大都路造”,左侧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回鹘蒙文“斤半锤”;背面阴刻汉文“三十五斤秤”及八思巴文“斤半锤”,左侧波斯文“斤半锤”,右侧回鹘蒙文“三十五斤秤”。	《文物》 1987.11
63	I型	“大德元年”(1297)	“保定路”	8	422		正面阴刻“大德元年十二月口日造”;背面阴刻“保定路校勘相同”。	
64	I型	“大德十年”(1306)	“大都路造”	9.4	616	“一十六斤秤” “一斤锤”	正面中间阴刻“大德十年大都路造”,左侧波斯文“一十六斤秤”,右侧回鹘蒙文“一斤锤”;背面阴刻汉文“一十六斤秤”及八思巴文“一斤锤”,左侧波斯文“一斤锤”,右侧回鹘蒙文“一十六斤秤”。	
65	I型	“至正二年”(1342)	“云需总管府较”	9.5	598	“三十五斤”	正面阴刻“至正二年正月造”“三十五斤”;背面阴刻“云需总管府较”。	
66	I型	“至正十八年”(1358)		9.4	510.5	“同一十五斤”	正面阴刻“至正十八年二月十五造”;背面阴刻“都府较同一十五斤”“李”。	

注: I型:倒梯形环状钮,权身呈扁六面体,束腰,底座亦为扁六面体,上有两道突起弦纹。(图一)

II型:倒梯形环状钮,权身呈球体,上大下小,束腰,底座为喇叭形,上有四道突起弦纹。(图二)

III型:圆环形钮,通体为扁钟形,上薄下厚。

上述元代铜权(表一、表二)形制较为简单,除福建泉州市发现的为扁钟形外(表二:编号32),多数集中于两种类型:以图一为代表的I型,上部为倒梯形钮,权身呈扁六面体,束腰,底座为扁六面体。以图二为代表的II型,上部为倒梯形钮,权身呈球体,上大下小,束腰,底座为喇叭形。从表二看出,同为大德元人权,型制既有I型(表二:编号63),也有II型(表二:编号16);同为益都路造(表二:编号10;表二:编号19),型制也不同。可见元代铜权的形制没有年

代早晚与地域界限的区分。

元代铜权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是当做秤砣来使用的,重量多集中于300克至1000克之间。元代铜权多有铭文,一般为阴刻,也发现少量为阳铸,文字种类以汉文为主,也有汉文与波斯文、八思巴文、回鹘蒙文合铸的,此类铜权均为大都路造,是适应元大都多民族的贸易交流而产生的。

年号是铜权中最的一类铭文。表一、表二中共计74件铜权,有60件铸有年号,占81%。以上铜权的年号有元世祖忽必烈

“中统元年”(表二:编号1)、“至元十八年”(表二:编号20),元成宗铁穆耳“元贞二年”(表二:编号47)、“大德元年”(表二:编号16),元武宗海山“至大元年”(表二:编号22),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元年”(表二:编号8),元英宗硕德八剌“至治元年”(表二:编号10),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泰定二年”(表二:编号43),元文宗图帖睦尔“天历三年”(表二:编号18)、“至顺三年”(表二:编号19),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元统二年”(表二:编号23)、“至元二年”(表二:编号56)、“至正二年”(表一:编号1)等。

元代至元年号共使用过两次,一次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共34年;一次为顺帝时期,共6年。资料中共发现三枚至元六年以前的铜权,一枚为河北盐山发现的“至元二年”权(表二:编号56),上有“般阳路总管府”铭文,般阳路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所置,故此权应为元顺帝时物;一枚为北票市文管所收藏的“至元陆年”权(表二:编号6),上有“大宁路”铭文,大宁路元初为北京路,至元七年(1270)更名大宁路,二十五年(1288)更名武平路,二十九年(1292)复名大宁路,可知此权也为元顺帝时物;另一枚为“至元三年”权(表二:编号35),上无铭文,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

上述铜权中,我们发现年代最早的是中统元年的铜权,最晚的是至正廿四年铜权,以上铜权年号基本涵盖了元朝的各代皇帝,并且历任皇帝年号更改,也都发现相应的铜权。可以说终元一代,铜权的使用是连续的,未曾间断过,历任皇帝改年号也必铸发新的铜权。

元代铜权是由官方铸造,再发行各地使用。多数元代铜权都标注铸造发行单位。上述74件铜权中,有48件标有铸造及校勘部门,占65%。

铜权的标准器由中央掌握,由工部向各路颁发。史籍载,各路总管府“照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校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①山东发现的延祐六年铜权(表二:编号16)

“校勘相同依样成造”的铭文就体现了这一制度。

元代铜权铸造的主要部门是各路总管府。上述铜权(表一、表二)铭文中属中书省的大都路、中都路、保定路、益都路、永平路、博州路、济南路、般阳路;有属辽阳行省的大宁路、懿州路;有属河南行省的南京路、汴梁路、扬州路;有属陕西行省的兴元路,有属江浙行省的杭州路、池州路、泉州路;有属湖广行省的潭州路等。也有的铜权是由路的下属行政部门县制造的,见于铭文的有“迁安县”(表二:编号49),属中书省永平路,“沂州”(表二:编号8),属中书省益都路,说明路一级的下属行政部门县也可铸造颁发铜权。由于铜权资料收集并不完全,不能说未发现铜权的地方就没有铜权。但就现有铜权看,明显以北方铸造数量居多,南方次之,北方又以大都路居多,反映了元代铜权的铸造使用集中于经济贸易较为发达地区。

元代铜权铸成后,还要经有关行政部门校正方可发行使用。如铜权铭文上的“校勘相同”即反映了这一制度。负责校勘的主要是各路总官府,如“益都路教同”、“大都路较”等,还有的省略为“官”、“教同”等。另发现一枚铜权上铸有“云需总管府较”字样(表二:编号65),云需总管府设于延祐二年(1315),是专门管理察千淖尔行宫的机构,说明也有校勘铜权的权力。

上述铜权铭文中还有“三”、“天一”、“十”、“口天十一”、“大一”、“一十”、“丕八”、“千五”、“天”、“平”、“天四八”、“十号”、“人字”、“天廿九”、“廿五号”、“日”、“三十一”、“上二号”、“上二”等字样。此类铭文为铜权的编号,其中数字为铸造的数量编号,而“天”、“大”、“丕”、“平”、“人字”、“上”等为批次编号,如“天廿九”即为“天”字批次的“廿九”号铜权。

铜权作为实用器是则轻重的。见于铜权铭文的有秤量和自重两种类型,秤量铭文如“同一十五斤”、“同二十五斤”、“同三十五斤”等,自重铭文如“一斤锤”、“斤半锤”

等。元代在铜权上铸有秤量和自重,其目的在于运用法定的杆秤形态保证称量的准确性。宋代时初创此制来校勘宫中的标准权,元代将其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使元代杆秤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形态。自重与秤量的比率反映了杆秤的形态,元代大德年间大都路

造的“一斤锤”标重为“一十六斤秤”,比率为6.3%，“斤半锤”标重为“三十五斤秤”，比率为4.9%，均接近于现代钩秤5%的比率,说明元代杆秤形态已基本成熟。

笔者将表一、表二中铜权的实际重量与其标重或秤重摘录于下:

表三 称量“一十五斤”铜权与实际重量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I型	“至正十八年”(1358)	“都府造”	374	“同十五斤”
II型		“大都路较”	220	“同一十五斤”
I型	“至正十八年”		510.5	“同一十五斤”

表四 称量“一十六斤”铜权与实际重量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I型	“大德十年”(1306)	“大都路造”	616	“一十六斤秤” “一斤锤”

表五 称量“二十五斤”铜权与实际重量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I型	“至正十八年”(1358)	“都府造”	524	“同二十五斤”
II型	“至正七年”(1347)	“大都路较”	707.3	“同二十五斤”
II型	“至正六年”(1346)	“懿州路造”	500	“同二十五斤”
I型	“至正廿四年”(1364)	“永平路总管府”	490	“重廿五斤”
I型	“大德五年”(1301)		580	“二十五斤秤”
II型	“天历三年”(1330)		665.5	“同贰拾五斤”

表六 称量“三十五斤”铜权与实际重量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I型	“至顺元年”(1330)	“南京”	900	“同三十五斤”
I型	“大德五年”(1301)	“大都路造”	750	“三十五斤秤”
I型	“元贞元年”(1295)	“大都路造”	933	“三十五斤秤” “斤半锤”
I型	“大德八年”(1304)	“大都路造”	900	“三十五斤秤” “斤半锤”
I型	“至正二年”(1342)	“云需总管府较”	598	“三十五斤”

表七 称量“五十五斤”铜权与实际重量

型制	年代	铸造与发行	实测重量(克)	标重或秤形
Ⅱ型	“大德十年”(1306)		960	“计五十五斤”

从表三至表七看,一十五斤铜权的实际重量最高相差 137 克,二十五斤铜权的实际重量最高相差 217 克,三十五斤铜权的实际重量最高相差 335 克。以上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会引发两种状况:

1. 相同秤重的铜权实际重量不同,要想保证所称之物的准确,只能使用不同的称形,即秤杆的长度与刻度不同,如此导致了秤形的不一致。

2. 如果使用的秤形相同,而相同秤重的铜权实际重量不同,必会导致所称之物重量的不一致。

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会混乱度量衡制度。元朝实际的度量衡制度又是怎样的呢?《元史·刑法志》记载:“令诸度量权衡不同者,犯人笞五十七。司县正官,初犯罚俸一月,再犯笞二十七,三犯别议,仍记过名。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提调失职,初犯罚俸二十日,再犯别议。”^②如此严厉的惩罚制度恰恰体现了元朝权衡制度的不规范与混乱。元代铜权的铸造权在官府,主要是路一级的总管府,根据中央颁发的标准器统一铸造,并经官府校勘。出现铜权重量不一致的问题,责任想必应该在官而不在民。

元朝由于连年战争,出现国用不足的局面。忽必烈即位之初就确立了以理财为中心的施政方针,并将能搜刮钱财作为选拔官

员的标准之一。元朝中下级官吏大半由胥吏出身,他们可以满足元朝政府对中、下级官吏精于“钱谷、刑赏”的要求,为元朝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但这些胥吏依仗其刀笔权,舞文弄法,苛敛百姓。混乱的衡器可以为他们盘剥百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通过盐茶等政府垄断贸易获取高额利润与回扣。《元史》记载:“每中统钞一贯,买盐二斤四两,毋令杂灰土其中,及权衡不得其平。”“今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③可以说,秤不如法是政府的有意行为,这让他们在官府垄断贸易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而这种盘剥百姓的行为使民间怨声载道,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成为导致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题头图摄影:王殿平)

①《元典章》卷五〇,《刑部十九·诸禁·禁私斛斗秤尺》。

②《元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三》。

③《元史》卷九十七《志第四十五》。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助理馆员)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婚俗文书举要

李彩萍

中国是礼仪之邦,一向重视“礼”。婚姻礼俗是人生礼俗中的一件大事。《礼记·昏义》描述,“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故君子重之。”又称“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婚聘礼仪上升到“礼之本”的高度,所以婚姻不仅是男女个体的事情,它关系到一个家庭、家族血脉的延续,也是构成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婚书”指的是男女婚嫁文书。通过婚俗文书,可窥视我国婚嫁习俗,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政治体制、经济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婚书收藏为华夏婚俗研究提供重要历史实物依据。下面将从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清末民国时期婚书文物来展示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婚姻习俗。

一、婚俗概说

传统的婚俗非常讲究礼节、礼数,程式也非常复杂,包括议婚、订婚和结婚。传统婚俗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社会道德、伦理、心理、生理、文化、感情等方面的内容。谈到传统婚俗首先要了解传统的“六礼”。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其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四礼均是议婚、订婚之礼。

纳采是议婚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步商定婚姻的意向。旧时的婚姻均要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讲究门当户对,男女双方必须托媒人提亲,经得双方父母同意后,首先要过“门户帖”,两家各用一红纸折子,写上男女双方各自的姓名、年龄、生辰八字、籍贯、三代、官职等,由媒人送给对方,称为“问名”。经过双方按照“阴阳八卦”,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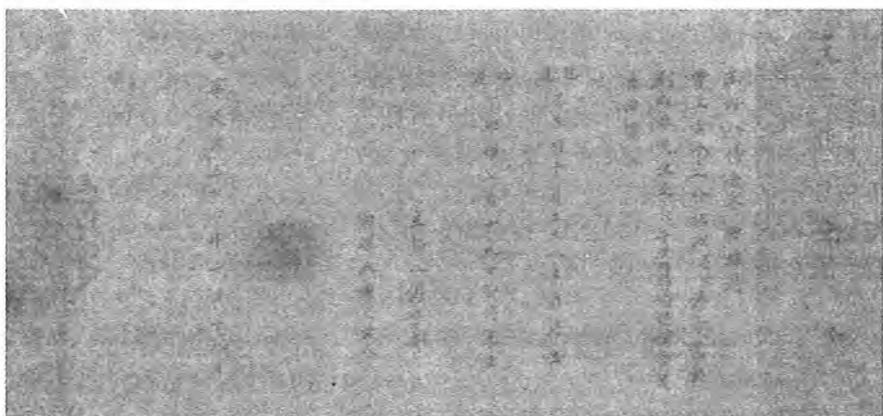
议合婚,如认为属相相配,不犯忌讳,便可联姻,谓之纳吉,便可定亲。纳吉定亲之后,男女两家均需到当地县衙,领取龙凤官帖,尊章纳税,并填写好定婚人双方及家长、主婚人和媒人的姓名,并签押盖章,证明婚姻已取得合法手续。这时男方将聘礼送到女方家,称为过大礼或大定,定物一般为银锭、首饰、衣料,称为纳征,纳征之后,男方即可选定吉日举行婚礼,并请媒人通知女方,谓之“请期”,即定日迎娶。迎亲的一套仪式更为复杂,有规定的文书来约定,有讲究的排列仪仗,有迎轿、下轿、跨火盆、射轿、拜天地、坐账等一套议程。行礼如仪完毕,结婚即算告成。“六礼”的每项程序中都有各种帖式来告知,有合婚帖、请婚帖、允婚帖、交换庚帖、生辰八字、订婚帖、聘财礼单、奁财清单等,这套婚礼文书贯穿于“六礼”之中,指导着婚礼的进行。

二、合婚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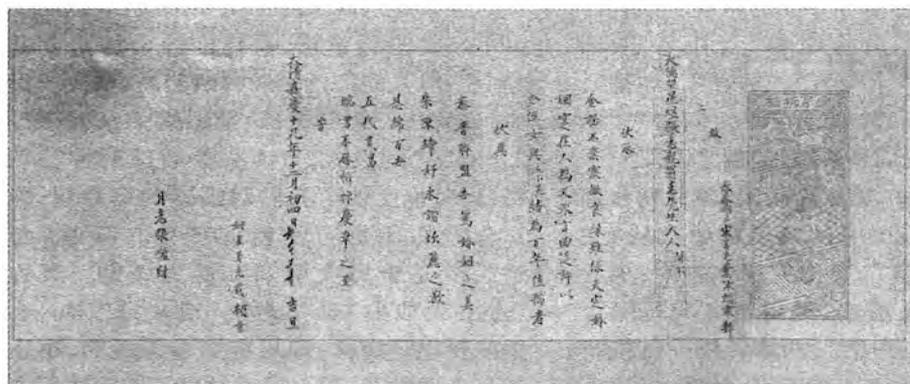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重要因素,婚姻对于一个家庭至关重要,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基础。旧时人们把婚姻的和谐美满,取决于天命,认为是天定姻缘,确定婚姻关系要举行“合八字”的仪式,带有极为浓厚的神秘色彩,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婚姻的宿命观,男女合婚的风俗习惯就此产生。所谓“合婚”,就是合男女两家二性为婚姻。又称“过书”,或称“合年命”、“合庚贴”等。合婚前要先写庚帖,即写有当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的帖子,写上男女的生辰八字进行占卜(图一),庚贴分为男庚、女庚两种。合婚有两种形式:一为自我合婚,一为命馆合婚。



图一 合八字图谱



图二 男女甲庚合婚帖



图三 一式请婚帖

自我合婚有两个方面,一是问卜于神、佛、祖宗祠庙,一为看男女双方的命相、属相是否相合。命馆合婚要请星命家进行合婚批八字,把男方和女方的生辰八字合书一红帖,谓之“男女甲庚合谱式”(图二),经过批八字以后如门户相当,五行相生,属相不克,则合婚成功,然后要在红纸上书写“乾命坤命,相辅相成,天作之合,人兴财发”、“乾坤定矣,宜室宜家”等吉祥语,男女双方家庭认可,男家托媒人向女家报喜,婚仪可以往下进行。

三、请婚帖

通过合婚之后,双方可以签订草约,但不算正式文本。按照媒人的旨意,男方请人用红纸写上求婚之意,并附上男方三代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姓名、官职等内容,称为求婚帖,或庚帖、请婚帖,由媒人送到女方的家里,并等待女方的允婚帖。

1. 一式请婚帖(图三)

该帖用红纸、手书,首折为蟾宫折桂的图案。过去称呼非常讲究,对长辈称大德望,平辈称大姻望,晚辈称大懿望;对长辈自称眷姻晚,平辈自称眷姻弟,晚辈自称眷姻爰。

黍眷姻弟宋美光薰沐端肃拜

启

上

大德望星煜张老亲翁老先生大人阁下

伏承

金诺不弃寒微良缘

虽系天定婚姻是在人为

又永言曲泛

许以令侄女与五小儿结为百年佳偶者

伏冀

秦晋联盟世笃婚姻之美

朱陈伟好永谐坎鹿之欢

恩绵百世

五代其昌

临书不胜忻忭庆兴之至

崑

大清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四 天长地久(此四字仅为左半部) 吉旦

姻弟美光载顿首

月光张顺才

2. 二式请婚帖(图四)

该帖用红纸印刷,红纸五折,首折为蟾宫折桂的图案,注有男方“三代”的姓名、官职及家庭住址等内容,具体如下:

荷蒙

冰议不弃寒微许以另媛与小儿为百年鸾友

恩铭五内

庆洽三生

曷胜荣之至

右启

上

大德望姚老亲翁先生大人阁下

忝眷姻愚弟程通明薰沐端肃拜

——世居同马里六甲世居下栅村人

——三代曾祖讳八虞

——祖讳九功

——父讳通明

——在身名守仁年一十六岁四月二十五日午时生

冰人任体泰盟婚

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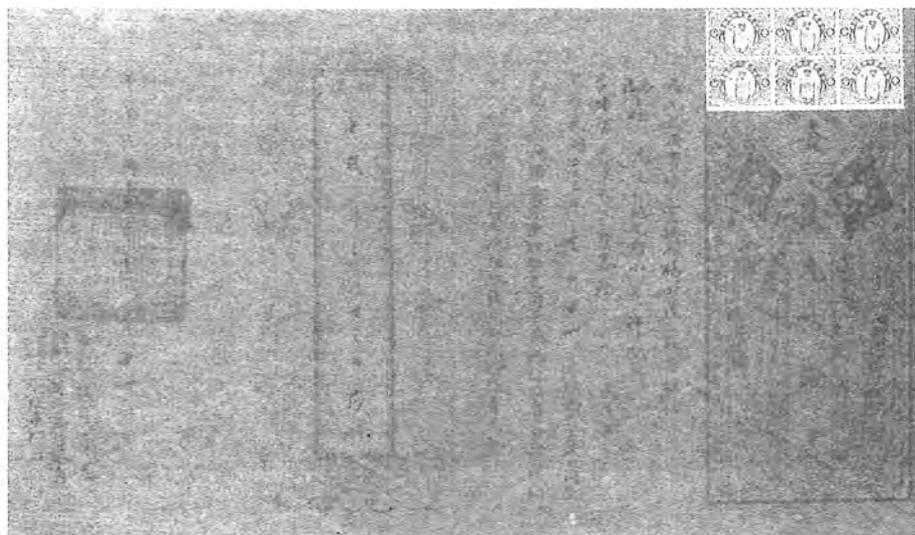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盟婚 穀旦

四、允婚帖(图五)

男方向女方求婚之后,女方如果同意,要给男方下允婚帖,表示初步同意该婚事。求、允婚帖,最早是手书,但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有专印的红纸烫金的“求”、“允”字帖。这张允婚帖是印刷和手书合一。一张红纸四折,首折及三折上有吉祥图等,女允帖证书,上方题有中华民国印花税票,末折上有每副捐洋壹元,附加筹还警饷洋贰角,其内容如下:



图四 二式请婚帖



图五 允婚帖



图六 一式行聘礼帖

立允婚证书

坤宅主婚人杨功茂兹凭媒证，

乔程二位先主介绍，允将小女许配与李烟陞

先主令郎高魁为妻，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冬月十一日结婚

订秦晋同盟之约

两好无猜

绘朱陈嫁娶之图

于飞共效

所有文定聘仪均经照礼妥办

百年好合

戚谊永敦

立此允婚书为证

坤造壬戌年三月十三日戌时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五、行聘礼帖

行聘礼在“六礼”中称为纳征，就是送女方彩礼作为聘礼。《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男方送财礼往妇家，表明聘定女方为妻。下聘礼后，虽还未行婚礼，但女方名分已定，夫妻关系已确立。过去聘礼多送定金、服饰及饰物。在婚仪中也称为放大定。行聘礼要按照男女家庭的经济状况、门第的高低不同，放大定在北京是迎娶前的两个月或一百天举行，放了大定就等于正式迎娶了，男女两家开始筹备婚仪。

1. 一式行聘礼帖(图六)

这张礼帖，七折，首折上为广寒宫殿图案，印有国民政府的印花税票

忝眷姻生梁成们薰沐端肃拜

启

上

大硕德广辉武亲翁先生大人阁下

伏以

璧种蓝田预兆宜家之瑞

朱生合浦欣瞻照乘之光

时臻月吉之良

礼重人伦之始 恭维

亲家大人门下

圣世天民

清时鼎望

幸蒙亲慈不弃寒微

曲从媒议允以 翁之

舍五第兴生之长女结为百年佳偶者

虽云天定良缘 实由人事作合也

今将菲仪开陈于左

谨具

雪银长命绳七成支

雪银时式班则成付

雪银时样万子成付

雪蓝湖谿腰巾成条

月老郭起鹤订盟

肯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双喜合同(此四字仅为右半边)毅旦

2. 二式行聘礼帖(图七)

该行聘礼帖，首折上写有双喜，末折上书写有“纳采之敬，眷姻弟李秉忠脱帽鞠躬”。这张聘礼帖没有标明确切年代，但一般明清时期常书写“顿首拜”，民国时常用“鞠躬”或“三鞠躬”，因此断定该文书时代为民国时期。

谨具：镀金 文明 宝锁成挂

雪银 蕙花 手镯成对

镀金 骑牛 贺喜成串

雪银 铜铁 顶针三个

真红 时织 毛料成线

红美 生葛 裤料成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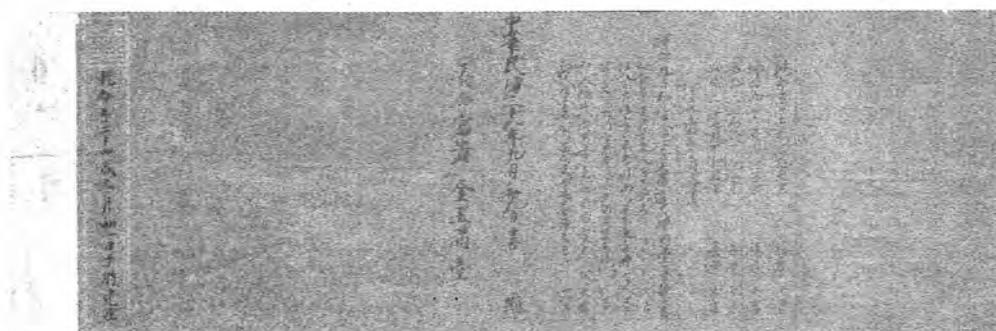
真红 湖谿 斜料成幅

六、课书(图八)

也叫“喜课”或“龙凤通书”、龙凤帖。在“亲迎”前，要选择办婚事的时间、方位和确定需要回避和禁忌的事宜。要请星命家给请求合婚的男女双方写出鉴定，以此作为“亲迎”指导文书。从此件文物中能够看出有选择良辰吉日，喜神的方位，择亲迎娶的日期，婚礼上禁忌的属相。在清朝时，只有



图七 二式行聘礼帖



图八 课书



图九 添箱簿

双方拿到龙凤帖才算正式办理结婚手续,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这份课书年代为民国三十八年,宽25.5厘米,长65厘米,为红纸刻印,字体竖排,题有课书两字,画面周围有花草图案,内容如下:

乾命五十三岁不犯天罡 福寿

大吉

坤命四十九岁不犯河魁 福寿大吉

男命二十四岁不犯命星 喜庆大吉

女命二十七岁不犯岁星 喜庆大吉

尊通书合时写书

择于九月初九日癸巳喜天黄道不将明堂喜庆大吉

新人用娶送男女客人忌用虎马狗三相人不用大吉

新人上下轿宜用辰巳时面向东南西喜神大吉

新人出阁过门宜用辰巳时天开黄道喜神天官贵人大吉

新人按床宜用正房东间贴南宜用辰巳时大吉

新人坐床开面向东南迎喜神辰巳时大吉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喜期

长命富贵 金玉满堂

取得了这份《龙凤通书》就算是完成了合婚手续,可以订婚迎娶。

七、添箱簿(图九)

在待婚喜庆的日子,有一套庆贺婚礼的仪俗,凡遇亲朋家中有娶聘喜事,人们都要先送礼金或礼物,称为行人情。嫁女的妆奁主要有两种,一是聘婚自家采办,谓之“攒妆”,二是亲友赠送,谓之“添箱”。嫁妆成为门第的标志,在过去以嫁妆的多少来判断女方经济状况好坏,比如,王府、宅门、富商、房产,以瓦作为象征,陪送一座瓦房,以送包有红布的瓦作为象征。陪送地亩,以土坯作为象征。陪送一个铺面,以商号匾额或蓝皮红签的账册为标志。

这本添箱簿是六必居的段掌柜为他的

次女出阁而陪送的账册,蓝皮红签。为大清光绪元年三月十六日。封面题签:添箱簿。内有当时天德会、全丰当、裕隆当、乾庆丰、宝全永等110多位商号名字,有京都大川酒店马爷赵名财送的聘礼,有众多亲友添妆奁,还有本家段永收承中礼单。从礼单中看出以礼银为多,还有物品,如白银纽扣,宫绉马褂料、丝带、戒指、礼钱、祥针、定装粉褂镜、招君套、鞋面、银粉、品红丝带、杏仁、织花手巾、花丝带等。最后统计“京城共收礼银贰拾叁两捌钱,收添箱银,贰两柒钱,收添箱礼物拾四宗”从这本添箱中可以看出当时六必居段老板家与亲家经济的情况,可以看出老板的用人,当时对于女儿婚姻的态度,反映当时的人际关系,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一户中等人家的社会交往。

传统婚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也有许多糟粕。通过这套婚仪文书可以看出:过去的人们,对婚姻和男女交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男女交往、家庭子女的责任感。这种道德舆论监督力量扼制着婚姻道德的沦丧等等。然而,正是这种力量和千百年的传统风俗在影响、主宰着中国人的心灵和行为,使每个人自觉地成为旧婚俗的载体。从纷繁复杂的婚俗文书中看出中国婚姻的神圣、庄严和中国人对待婚姻谨慎而不草率的郑重态度。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婚姻习俗有所改变,去掉了很多繁杂的礼节。但现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传统的婚礼仪式。不管形式怎样,在从古到今繁杂的礼仪当中,恐怕没有再比婚礼更加隆重的礼仪了。从婚礼的繁杂中也能够体会到,人们对稳定、和谐家庭的渴望与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人们有了对婚俗行为的共识,才能礼尚往来,进行有效的社会交流和合作。有了稳定的家庭,社会才能和谐,有了社会和谐,人民才能在有序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作者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

北京地区长城概述

张展

长城在中国版图北纬 40 度线左右,横跨北方 9 省(市、区),总长度超过六千余公里,是中国最雄伟的古代文化遗存。1961 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山海关、八达岭和嘉峪关名列其中,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长城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2001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长城——司马台段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北京市公布万里长城(北京段)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万里长城北京段尚未列入国保单位的部分与国保单位八达岭、司马台长城合并为一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里长城——北京段。

长城始建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史记·匈奴列传》记:“秦昭王时(公元前 306~302 年)……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这一时期,燕、赵、秦三国首先在自己的北部边境修筑长城以防御东胡和匈奴的入侵。这是长城最早修筑的记录,地域相当于今天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的范围。

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后,

“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

汉代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在北方修筑了规模更大的长城。

从战国秦昭王至汉武帝二百年间长城不断地修筑完善,奠定了至今仍存在的长城的基本规模和走向。南北朝时期北魏、北齐、北周都继续修筑长城。最大规模的长城修筑是在明代。明朝推翻元朝,元顺帝逃至漠北,蒙古人的势力仍然强大,对明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明初,洪武和永乐二帝曾数次发兵,深入漠北征伐蒙古瓦剌、鞑靼,并筑长城用于防御。明中期以后,瓦剌、鞑靼再次强大,不断入侵北京,“土木之变”中甚至俘虏了明朝皇帝。此后百余年间,明王朝把修筑长城当成重要工作,从未懈怠直至明亡。

明朝时修筑长城成就是最大的,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民族、地理的背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曾被历史评为“天子戍边”,说明边务的险要。长城就是这一政治、军事背景的产物。

明朝非常重视北疆的防御,浩大的长城工程前后共 7 次大规模修筑,持续了 100 多年,终于建成了以秦长城为主体的嘉峪关到辽东全长 12700 华里的“外边”长城,并设

九边重镇,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每镇设总兵,统兵数万至数十万不等,长城守兵达百万之众。为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又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指连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一段),以及大量的“重城”,北京怀柔、延庆一带“重城”数道,固若金汤。

文献记载,北京地区长城修筑始于战国。《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大古城北七里)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置上谷(今河北怀来大古城)、渔阳(今北京怀柔区梨园庄)、右北平(今天津蓟县)、辽西(今辽宁义县)、辽东(今辽宁辽阳)郡以拒胡。”清光绪《延庆州志》载:“古长城在延庆州南二十余里,即燕塞,燕昭王用秦开谋,置上谷塞,自上谷以北至辽西。秦始皇因其旧址而大筑之,至今岔道以北迤迳而至永宁一带遗址犹存。”《西关志·居庸卷》记:“长城岭在居庸关西南一百零五里,马跑泉西,离镇边城一十五里,相传秦始皇所建。”文物调查也证实战国燕长城从今河北怀来大山口、东湾、羊儿岭进入今北京延庆县,再向东北经石峡峪、帮水峪,再北向八达岭南四楼继续向东北延伸。秦长城在今门头沟镇边城西15里长城岭东入延庆的石峡、向东至慕田峪、再至古北口。据此推断燕秦长城在今河北怀来南山、北京延庆、怀柔慕田峪、密云古北口达辽东一段是秦沿着燕之北长城走向修筑。北京地区各时代长城的传承关系是解决几个时期长城走向的关键。因为,自古北京地理形势未变,区域界线未变。军都山脉作为中原与漠北草原的天然屏障,长城建在此山中位置的选择余地不大,故各时期长城方位不会有大的调整。北京战国燕、秦长城的存在纠正了过去一些史学家在古史地图上所标定的战国、秦长城位置在北京以北的错误记录。

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国力自不待说。燕是周王朝最北部的诸侯国,越过北部的军都山,即为戎狄之地,这种华戎交界的地理位置是天然形成的,一直到后世都是如

此,也是长城得以存在二千年的历史条件。燕昭王修筑长城,其遗迹在今河北、北京北部仍存在。秦统一后,将秦、燕、赵北方长城连接成一体,历史上首现“万里长城”。在慕田峪西沙沟深处有“秦皇旧址”摩崖石刻二块,为明代万历年间李逢时所刻。明人断为“秦皇旧址”的这段长城,即为(光绪)《延庆州志》“秦因燕城之旧而整饬之”的长城。文物调查表明,北京北齐长城遗迹相当一部分是覆盖燕秦长城,在今延庆帮水峪长城仍可看到北齐长城与燕秦长城交汇、覆盖的现象。明长城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长城,明长城相当一大部分就是覆盖叠压燕秦长城修筑的,在延庆80%的明长城是建在燕秦长城旧墙体之上。在八达岭东四楼往南东沟南侧有明长城将燕秦长城“包芯”在内的遗迹。

关于北京是否有汉代长城遗迹。2006年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考证今延庆县古崖居应为汉代“烽火台”的结论,这种提法目前没有文献和考古学的根据。以前也有很多书籍描述北京汉长城,但至今都没有找到北京存在的汉长城遗迹。在北京以北河北省的承德、隆化、滦平、丰宁都发现汉长城及烽燧的遗址,这些汉长城遗迹没有与北京对接的接口。

燕、秦之后,史载,计有八个大小朝代在北京境内修筑过长城。北魏修筑的长城“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魏书》)。北魏上谷郡领平舒、居庸二县,上谷郡治于居庸县,居庸县即今日延庆县。北齐天保六年筑长城,“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下口即居庸下口,今为昌平区南口镇。《北史》称,北齐长城“东至海”,即东达渤海。则北齐长城也进入了北京地区。

公元550年北齐立国。在北齐27年的历史中,为防御北方柔然、突厥的入侵,曾多次修筑长城。《资治通鉴》记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六月“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北齐夏口即今北京昌平南口。据文物调查,北京昌平、门头沟、延庆有几处怀疑是北齐长城遗迹。



图2 延庆县八达岭镇帮水峪村
——北齐长城

图3 延庆县八达岭镇帮水峪村
——明长城(拐脊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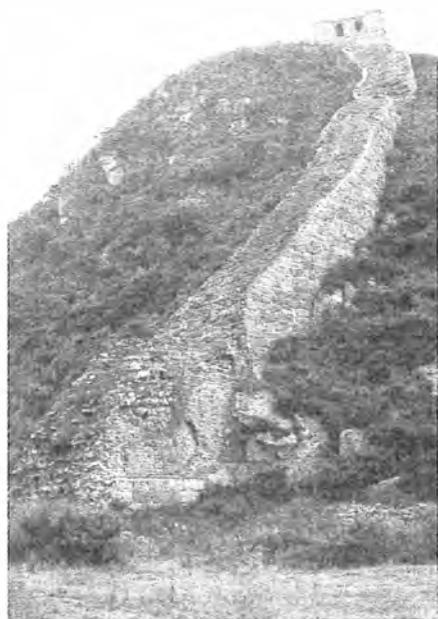


图1 延庆县八达岭镇帮水峪村
——战国长城

在北起昌平西北黄楼院,经流村乡、老峪乡和高崖口乡交界的锅顶山、南鳖鱼岭,折向马刨泉的北祁岭南入门头沟的一段长城,全长30公里。自然坍塌严重,早已没有成型的建筑遗存,只是一段一段凸起的残垣,这是探索北齐长城的重要线索。

延庆帮水峪村有一处燕秦(图1)、北齐(图2)、明(图3)三道长城并行的遗址,是探索北京境内早期长城的重要线索遗迹,最具典型意义。

延庆帮水峪村南一公里花家窑沟中,从北往南有土、砖、石三道长城。土长城为燕长城,往东向营城子村方向延伸,往西到石峡关;砖长城为明长城,与八达岭残长城衔接,向西出石峡关入河北怀来陈家堡;石长城为北齐长城,往东直至清水顶,往西多为明代砖长城覆盖。

明朝北京境内长城横跨北京北部燕山山脉军都山区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区县的崇山峻岭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城墙现在仍是北京市与河北省的界墙。

明朝修筑长城又不同于前代修筑长城,明朝一是统一中国的大版图,二是定都北京“天子戍边”。所以,明长城修筑成了绵延一万多华里的砖石建筑的空前壮观坚固的巨大军事防御体系。终明一代,近三百年统治的稳定有赖于长城的修筑,也给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位。同年七月遣常遇春北伐元大都(今北京市),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北出居庸关逃至开平(今内蒙内多伦南)。徐达入大都,即陆续修筑慕田峪关堡,居庸关城,南口石城。洪武五年(1373年),徐达北征和林,元将扩廓帖木儿在和林大败徐达,明军十五万全军覆没。自此后,明军不敢出塞,退守秦汉长城一线,闭关自守。建墩台、塞隘口、修城堡,直至洪武帝朱元璋去世,明廷并没有修筑长城。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经过十年休养生息,重修南口城、上关城、慕田峪隘口。永乐

一生南北征讨,将人力、物力、财力全耗费在征伐蒙古瓦剌的战事上,并未修筑长城。

宣德至正统年间,在长城防御上仍是筑台、修城堡,将疆域边防向北推至张家口一带。正统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族俘虏,明廷元气大伤,更无暇修筑长城。

成化以后,明廷才开始连墩于墙,列城于垣。成化十年(1474年)延绥建榆林长城。成化十五年(1479年)修筑开原至鸭绿江边墙千余里。二十一年(1485年)修筑张家口外边七十余里。弘治十年(1495年)整饬边备,又修筑了山海关抵居庸关的城堡270处,塞垣千余里,十五年(1500年),修筑辽东山海关至开原边垣千余里,这才开始修筑边缘土垣,即明代早期长城。

成化以后,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数代,长城得到大规模修筑。在嘉靖年间,瓦剌族三人畿内,京师震动,朝廷大臣更番御敌。

隆庆二年(1568年),调抗倭名将谭纶为兵部左侍郎,总理蓟、辽、保定军务。拜戚继光为大将军,总理蓟、辽、保定练兵事。

隆庆三年(1569年)蓟、辽、保定总督谭纶修筑长城。总兵官戚继光督修蓟镇两面御敌的砖石长城,起山海关至渤海所(今怀柔黄花城东)。昌镇总兵杨四畏督修昌镇两面御敌的砖石长城。蓟镇长城1474华里,昌镇长城282华里,总长1756华里。至万历九年(1581年)共12年,新型砖石长城全面竣工。

明朝长城主体是山海关至嘉峪关。但明后期北方蒙古部对中原的威胁减弱,而东北女真族成为新的隐患,这期间长城的修筑以北京防务圈为主,修筑了环卫京师的内长城,并将内长城的修筑外扩至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内三关长城。

长城作为一个防御体系,所防御的对象和地区前后期有很大不同。战国秦汉,政治中心在今西安附近,防御重点自然就在西北方面的匈奴;明朝永乐后期迁都北京,元朝残余势力在北京北部,故长城的防御重点自

然就移至北京正北。今天所能看见的长城遗存,西北地区秦汉长城遗迹壮观;而明长城遗存自然是华北、北京地区蔚为壮观。这与长城前后期战略位置是一致的。

北京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从自然地理环境分析,北京处于华北平原北端,北面和西面有著名的燕山山脉横贯其境,是中原通往东北地区和北部坝上蒙古草原的天然屏障,使燕山成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天然的分界。长城即处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分界线和民族区域的分界线这一特殊的位置上。

自然的分割使北京与东北、蒙古草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文化圈。从民族分布分析,北京与中原同属炎黄体系,而燕山东北、坝上蒙古地区则是戎狄之地。《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北京的地理位置:“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馆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正是由于长城的地理位置,历代统治者都把这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也证明,每当中原统治者内部稳定,需要对外扩张时,都以长城作为经略北方的前哨阵地。当中原势力衰微时,蒙古草原和东北少数民族政权跨过长城侵略中原,把长城作为南下的据点。

长城作为中原与北方的界墙,一直存在到明末清初。需要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国家、疆界与今天国际法的国家和国界不是一个定义,两种概念不能混淆。今天中国的版图是经过元朝统一中国时将蒙古大地纳入中原版图和清朝统一中国时东北满族将东北大地纳入中原版图而形成的。而当时的长城,恰恰是防御上述两个民族的。

北京境内长城走向及现状。北京境内长城从东到西计算,长城从北京与河北蓟县交界的北京平谷区将军关进入北京境,向西延伸1000多华里,从北京门头沟最西界的灵山走出北京境,进入河北省涿鹿县。

长城在平谷县将军关附近进入市界后,在平谷县黄松峪、密云县墙子路一带呈南北走向;向北过密云县东北部黑关后,走向急

转向西,沿密云县曹家路、新城子、古北口、白马关一线的北部山区分水岭构筑。过白马关后,长城走向转向西南,经密云县冯家峪、北石城、南石城而达怀柔县的神堂峪、慕田峪,这一带城墙主要构筑于平原、谷地西侧的山麓地带。

从慕田峪向西,在怀柔县黑坨山附近,长城分成两支。其一,呈北西走向,经延庆县的四海到暴雨顶后分成北西两路;北路经白河堡出市界;西路经佛爷岭一带出市界,然后向河北赤城、宣化延伸。其二,西南走向,分为南北两线:北线从延庆县杨树台长城结合点开始,沿延庆海字口、东灰岭、小张家口、八达岭而达青水顶;南线从怀柔县旧水坑西南长城结合点开始,经昌平区黄花城、龙泉峪、黄花梁、西岭、八达岭而达青水顶。北线构筑于延庆盆地南缘,南线构筑于军都山中。二者在青水顶汇合后,继续向西南延伸,在禾子涧以北再度分成南、北两线。北线在黄楼洼越出市界后在镇边城以西重新进入市界,在笔架山、广坨山等地中断;尔后在沿河城附近复出,经黄草梁、东灵山越出市界,然后向河北省易县、山西灵丘方向延伸。南线沿禾子涧、郭定山、老峪沟、大村一带东山脊南延,至得胜寺中断。

北京地区长城总的分布格局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二者在怀柔旧水坑西南分水岭上汇合,北结合点位于东经 $116^{\circ}30'6.3''$,北纬 $40^{\circ}28'55''$;南结合点位于东经 $116^{\circ}29'38.9''$,北纬 $40^{\circ}27'45''$ 。其中南结合点对于了解北京地区长城分布格局、研究北京地区两大长城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结合点命名为“北京结”。东西向长城体系,在北京结以东,以单层状为主,只在隘口附近才出现环状、多层状;在北京结以西,则比较复杂,除主要隘口附近构筑多层状、环状城墙外,在延庆盆地与北京平原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构筑相互平行的两道城墙,彼此相依,形成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北西向长城体系,在北京市境内主要为单层状,与前者相比,结构简单得多,两大体系区别比较明显。

在昌平区十三陵以北,从外桃园至西岭一带,人工建筑的墙体比较零星,除大部分因年代久远毁坏殆尽外,可能也与沿线以山险墙代替有关。此外,在镇边城一带,南、北两线长城是否合并,与沿河城、东灵山一带长城是否相连,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查明。

长城现状,主要是指长城的墙体、城台、关城的保存及损坏程度,以及城墙的外形结构、特点、质量、材料等情况。

将军关——墙子路——古北口——白马关——慕田峪——黄花城——八达岭——青水顶——笔架山——东灵山。这一线长城现状保存较完好,气势雄伟,构成北京长城的主体。墙体建筑以砖包结构为主,石砌墙次之,山险墙也有多处分布。墙体高大宽厚,城台最为密集。

砖包墙有宽窄两种,宽墙体顶部一般在4.5米左右或更宽,窄墙顶部宽一般在2.5~3米左右。从山海关过来的长城,由东面进入市界后,沿山脊向北穿过将军关。这段长城主要是砖包结构,墙顶宽3.5米、墙高4.5米左右,城台分布均匀。但墙体上部、女墙垛口全部损坏,墙体顶部损坏近四分之一,尤其在将军关口东侧,墙皮全部脱落,墙残高仅1米左右,并且只剩关城基座的痕迹。从将军关关口过黄松峪到外河口抵爱台子,墙体大部损坏,时断时续,只剩残迹,偶尔能看到敌台的分布和几段较好的砖墙,但延伸不长。从爱台子向北,在墙子路一带,是长城东线的精华,墙体保存最好,城台密集,墙顶宽3.5米左右,砖包结构。沿墙子路北面的山脊向黄沿口延伸到黑关,这一段的城墙墙体大部分是砖墙,城台和墙体时有时无,并且有大段山险墙的分布,较好的敌台偶有出现。从黑关向西,过关门、金山岭、古北口到破城子,长城气势雄伟,砖墙大都完好,城台密集。在关门附近,墙体有环状分布,环状北面是砖包墙,其上城台密集;环状南面是石土结构,没有发现城台。在关门的东面,有一条长达4公里的山险墙,悬崖绝壁,气势非常壮观。在关门西面,也就是在主线南面,有一段土石结构墙体,

连绵不断。从破城子再往西,到白马关,墙体大部分坍塌,只残存一些痕迹,偶尔可见城台的分布,并且发现一处坡顶城台。白马关南面,有石土墙的分布,土墙残高不足0.5米。从白马关过营口沿密云水库西岸,到南石城抵北石城,长城墙体以砖包墙为主,城台相对较密集,墙体顶宽3米左右。在鹿皮关附近河道中,还有保存比较好的水道建筑。这大概是北京地区长城唯一保存的典型过水建筑。从北石城向西南到大水峪,长城墙体毁坏严重,时有时无,并夹杂山险墙和劈山墙。从大水峪向西,过河防口到莲花池,墙体以砖包墙为主,并有两小段石墙分布,墙体顶宽在3米左右,上部全部毁坏,墙体只剩下三分之二。从莲花池往西,过慕田峪、黄花城到龙泉峪,这段长城非常雄伟,尤其在北京结,长城纵横交错,墙体渐宽,顶宽在4米左右,城台密集,并且出现双垛口,景色格外壮观。在旧水坑附近,长城出现了闭合段,南边闭合段为石土结构,其上无城台。这类墙体可能是重新修葺时遗弃的老墙体,对研究北京长城时代和建筑工程技术很有意义。

再往西南,过外桃园、西岭,到八达岭。这一线十三陵北面的城墙为土石结构。尤其从龙泉峪到外桃园和西岭到八达岭之间,土石结构的墙体连续不断,墙宽2米、残高1米左右。在外桃园和西岭之间多是一些山险墙的分布,墙体全面坍塌,时有时无。从八达岭到青水岭抵禾子涧,长城主要是以砖包墙为主,石墙次之。八达岭长城是北京地区长城的精华,城墙高大宽厚,城台密集。上部女墙、垛口齐全,墙顶沟槽中植被较稀少。在八达岭西南过青水顶到禾子涧这段,长城墙宽3.5米左右,墙体由不规整的岩石砌成,城台为砖包结构,在青水顶和石峡地段有封闭椭圆形墙体分布,左、右半圆墙体在结构上有明显的不同。从沿河城过黄草梁到东灵山,墙体相当残破,并有大段大段的山险墙分布。只在黄草梁有1~2公里比较好的砖墙,其次是东灵山和沿河城附近的墙体,也有三分之一部分遭到损坏。

北京结——四海——暴风顶——白河堡。这一线长城主要是砖石结构墙体，城台分布均等，并兼有山险墙的分布。墙体宽度较窄，在3~4米左右。沿线墙体大部分损坏，城台比较稀疏，仅个别保存较好。这一线最好的墙体有两小段，一段在距北京结点1公里处，另一段在长城干线以外至四海镇的东侧山脊上。这两段墙体连续完整，女墙垛口及城台均保存较好。

从杨树台向西北，沿四海北面山脊到营盘及马道壤到白河堡一带的长城，外观结构和毁坏情况基本一致，墙体以砖石为主，有均等的城台分布。墙体、城台严重损坏，大部分呈断壁残垣，残墙高度在2米左右，但墙体连续完整。

从马道壤向西到佛爷岭一带，墙体、城台坍塌殆尽。

在马道壤以东，营盘东沟一线，墙体零星出现，夹有山险墙的分布。

从老虎坑向北延伸，靠主墙的东侧山脊上有一段不太长的土石墙体，损坏严重。墙体顶部宽在2米左右，残高不足1米，墙体上无城台痕迹。

杨树台——东灰岭——西拨子——青山顶。这一线墙体主要以砖包墙为主，石砌墙次之，仅局部有少量山险墙。城墙大部严重损坏，其中仅西拨子附近墙体、女墙及垛口完整，砖石齐全，虽然残留不多，仍然不失为北线长城的代表。次之，在小张家口过西拨子到青水顶间，以及东部的岔石口到海字口之间，残墙较高，也比较连续，是此线长城相对较好的段落。

在三司到小张家口一带，墙体大部呈断续分布。残墙高不足2米，残存城台高3米左右，墙体仅剩夯土堆，完好的砖石均被拆光，偶尔有碎砖块散落。

在黑坑过凤凰坨到东灰岭之间，长城墙体全部毁坏，沿线散落物形成宽达百米的散落带，其中还偶见城台的圆形残迹。

北京境内长城沿线共有140~150座城堡，现存有130座。分布在6个区县，其中密云50座、延庆42座、昌平4座、怀柔21

座、门头沟2座、平谷11座。这些城堡中只有20%左右保存相对完整，多数分布在山区和人很难攀登上去的地方。约有30%保存一般，现场尚看到一些残损的墙体。另有50%的城堡只有遗迹，城堡地面已无可辨认的痕迹，要靠当地老人回忆，才能发现遗址的位置。

北京境内的重要关口。长城关口是为行人往来之用，也是军事防御的重要措施。北京境内长城大小关口有数百之多，较大型的有将军关、墙子路关、大黑关、司马台关、古北口关、白马关、鹿皮关、河防口关、莲花池关、黄花城关、撞道口关、九眼楼关、八达岭关、居庸关、沿河城关。这些关口今日尚存，仍是南北交通的要冲，汉魏以降，直至民国时期长城抗日，北京境内长城关口屡经战事，其中以居庸关、古北口为最。燕山、军都山是华北平原最北部的一道天然屏障，长城是北方入侵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长城，即可长驱中原乃至长江流域。元朝入主中原，明末李自成起义推翻明王朝都是从八达岭、居庸关进入北京平原，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都北京。大小关口的选择都是经过严格论证，既是交通要冲，又是山险要地。八达岭到居庸关之间的30里关沟，是山岭之中唯一的通道，因而成为北京最关键的“北门锁钥”。

从战国燕至明长城，墙体多数是重叠覆盖，但也有没有重叠覆盖的地段，这呈现出北京境内长城有几道边的现象。从现场考察看，没有重叠覆盖的地段主要是局部位置的调整，从相对平缓之地调整到相对险要之处。这种没有覆盖的旧墙体，当地文物工作者称为“甩边”。“甩边”现象在北京延庆、密云均有多处。与明代的重城和内外长城现象明显不同。长城的一些关口、要隘处，筑有环状、双层或多层墙体，这些墙体有的与加强要隘口防御有关，有的从残留墙体性质特点上明显可见是不同时期的产物。此外，在主长城线两侧偶可见伸出支线，这些支线一般长几百米或几公里，其建筑特点及材料质量多数与主墙一致，其作用和功能尚

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北京境内长城调查研究的情况。北京地区长城文化遗存是整体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北京地区存在修筑年代最早的战国燕长城和作为明朝首都防御体系的最雄伟的明长城保存最完整的长城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长城文化遗产。据文献记载,北京地区的长城从战国始建,至少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明各朝不断修筑完成。这些朝代在北京修筑长城,有些地段有确切年代依据,有些仅依据文献推定,或是根据保存现状和结构、材料等因素推测出年代,缺乏科学的考古手段。以前的调查虽然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手段上存在严重缺陷。调查资料的完整性、科学性都有欠缺。相关研究跟不上,在断代研究上既没有考古资料,对文献往往是先立论,后选证,结论百出,自相矛盾。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完整的北京市长城实地勘测图,以至于长城的长度、走向、年代、性质都是模糊的。古文献记载也仅限于当时对长城的推断,很少实地调查,有些是以讹传讹,谬误至今。正因为如此,关于北京长城,特别是早期长城,仍是北京文物工作有待深入调查研究的课题。也需要组织力量与和北京长城相连接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单位沟通交流,了解长城的连接关系以及他们的断代意见和断代依据。

1984年至1985年,国家地质矿产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对北京地区长城采用航空遥感技术进行现状调查,仍是迄今为止公布的最完整的北京地区长城资料。根据这个资料可以看出北京长城的分布和现状,查明了长城的空间布局及损坏情况,并进行北京地区长城长度测量,首次公布北京地区长城全长629公里,全线共有城台(包括墙台、敌台或战台)827座,关口74座,营盘及古遗址8座。并提出,北京地区有明以前长城73公里。

1995年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平谷、

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区县)长城粗略测量汇总数长度约为670.5公里。具体分布为:平谷区将军关至北水峪村黄门子段60.5公里;密云县大城镇下栅子村至西田各庄镇西沙地村约300公里;怀柔外长城小水峪至独石口加外长城慕田峪共61.5公里;延庆外长城九眼楼至独石口及九眼楼至西拨子黄花镇、内长城延庆、怀柔界河至大庄科乡解字石村北及石佛寺村川字一号敌台至延庆、昌平、怀来三县界的206公里、昌平原流村镇西北山顶至与河北怀来交界处2.5公里、门头沟八达岭西南至东灵山约40公里。

为切实加强北京地区长城的保护,2006年春季北京市文物局启动了划定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工作,并精确测量北京地区长城长度及绘制长城现状图,整个工作预计于2008年前完成,届时会向社会公布最具权威的北京地区长城数据资料。

长城绵延几千公里,横贯中国东西,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即长城沿线与长江、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成长的摇篮之一。万里长城北京段像一条巨龙,横卧在北京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是中国人民爱戴的民族象征。长城作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早已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清王朝建立之后,广袤的蒙古大地和东北平原与中原已成为一体。从清朝建立之初至今长城已荒废了近400年。近半个世纪以来,长城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得到了重视和保护。1956年郭沫若同志倡议修缮八达岭并对外开放,此后,长城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每天接待大量国际国内游客,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

北京先农坛

建筑组群布局与坛内诸神

董纪平

北京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行耜田礼的场所,是明清皇家坛庙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北京市政府对先农坛建筑群实施清理整顿、腾退修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先农坛殿宇重重、坛台相映、绿草青青、槐柏呈荫,基本上恢复了历史的原貌。历史上的先农坛几经易名、改建和近代帝国殖民者的蹂躏与战争的破坏,30年代先农坛体育场的建立等等,均使得人们几乎忘却了先农坛作为皇家坛庙的历史。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认识先农坛、研究先农坛,有着现实意义。

一、先农坛特殊的组群布局

北京先农坛的前身是山川坛。史籍记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建山川坛,“永乐中建坛京师,制如南京”,“坛之西有先农坛,东有旗纛庙,西有耜田”。山川坛“正殿七间,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东西庑各十五间,祭京畿天下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将,祭都城隍之神”(《明会典》卷85)。这里先农、太岁、山川诸神,共同组成一处坛庙建筑群。明世宗朱厚熹礼制改革后,山川坛内发生了变化,嘉靖十年(1531)于耜田北建置观耕台,十一年(1532)将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诸神迁出内坛,在南侧另建天神、地祇坛。由于原来的山川坛内坛只剩下先农神、太岁神及四季月将神,外坛又增建了天神、地祇坛,于是更山川坛名为神祇坛。万历四年

(1576)因为神祇坛诸神已不再专祀,便又更名为先农坛,并“改铸神祇坛祠祭署印为先农坛祠祭署印”。(《明会典》卷85)先农坛的称谓由此确立并被一直保留,直至有清一代没有改变。清乾隆十九年(1754)对先农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撤旗纛庙迁建神仓、改临时搭建的木观耕台为固定的琉璃台座、更名斋宫为庆成宫,并下谕广植松柏榆槐等。(《清会典》)经过一系列经营改造,先农坛形成一处格局比较完整的坛庙建筑群。历史上的先农坛,自清代乾隆十九年进行较大规模改建以来,其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基本上保存完整。作为礼制性建筑,先农坛内每组建筑组群均坐北朝南,自成中轴对称格局,布局严谨,体现了坛庙建筑应有的形制和氛围。但是先农坛的总体格局没有一条统一的中轴线,坛内建筑群似乎排列无序、规划布局显得似不统一。先农坛建筑组群的规划布局显示出它自身独有的特色。

明清北京先农坛占地1700亩,平面北圆南方,呈天圆地方形,由内外两重坛墙环绕。外坛墙东侧开两门,其北为太岁门,隔京城中轴线永定门大街与东面天坛的祈年门相对;其南为先农门隔永定门大街与东面天坛的圜丘门相对。内坛门有四,其南北、东西各不相对,北为北天门、南为南天门、西为西天门、东为东天门,东天门与外坛的先农门相对。内坛建筑群有四组,由西向东分别为:先农坛—神厨建筑群,先农坛位于神厨正南与其成轴线格局;太岁殿建筑群,其正南为南天门;具服殿—观耕台—耜田建筑

群,此三者由北至南成轴线格局,观耕台正东为东天门;又有神仓建筑群,位于先农坛内坛最东侧,其东北原有祠祭署,现已无存。外坛建筑群有三组:庆成宫、天神坛、地祇坛。这里除了天神坛、地祇坛是左右对称于先农坛内坛南门之外,其余五组建筑群,既不相互对称,也不在一条轴线上。它们由西向东,或南或北、错落排列、各自独立。这种独特的布局,一反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中轴对称布局特点。先农坛的总体布局表面上看去,显得十分凌乱分散,似乎无体系可言。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皇帝在先农坛开展的祭祀活动之后,就可以发现,原来这些建筑群之间是被祭祀活动这条看不见的主线有序串连起来的。明清时期,皇帝于每年春三月吉亥日来到先农坛举行祭享先农及亲耕典礼,大体上要按序完成如下几项活动:首先,祭享先农神;其次,御诣太岁殿在拜殿行拈香之礼;再次,进具服殿更衣后到具服殿南面的耜田行亲耕礼。如果皇帝是登基后首次行亲耕礼,那么最后还要到庆成宫行庆贺礼。而坛内的这五组建筑群正是依照上述顺序,由西向东按序排列的。最西面是先农坛——神厨一组,神厨院落的正殿为神版库,这里供奉着众神的神牌。祭祀时礼部尚书率员上香行礼从正殿请出神农牌位,安奉于先农坛上。皇帝由先农坛外坛北门进入先农坛,首先来此祭祀先农神。顺次往东,北面是太岁殿院落,正北为正殿,内有太岁坛。正南为拜殿,皇帝在此拈香后再往东。东南面是具服殿,皇帝来此更衣后南行到耜田行亲耕礼,亲耕礼成之后则起驾回宫。若皇帝是首次来先农坛,亲耕礼后还要再向东行,来到最东面的庆成宫行庆贺礼。礼成之后由先农坛东门出坛回銮。这五组建筑正是由于各自不同的使用功能,被祭祀活动的主线有序连接起来的,这一布局由西向东,序而不乱,一以贯之。

我们看到由于建筑的使用功能不同,坛内的建筑呈现出造型各异、体量有别、占地面积大小不等的局面。这使得建筑群与建筑群之间、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较大反差。

例如,庆成宫,它是在斋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分别由寝殿、正殿、东西配殿组成,前有宫门两重,东有钟楼,围有宫墙(庆成宫原为斋宫,东南有钟楼一座,用以报时,无鼓楼,这是坛庙建筑群的特有格局。清乾隆以后斋宫易名不为之用,钟楼用以禀报、传递皇帝祭祀的仪程。上世纪50年代拆除)。庆成宫改建后的使用功能,是耕耜礼成之后犒劳百官行庆贺礼的场所。它的使用功能既有皇帝的歇息之所,又有百官朝贺、赐茶的场面之地。庆成宫的占地面积是坛内这五组建筑群中最大的,为13529平方米。其内最大的建筑是正殿,建筑面阔为23.4米、面积(含月台)为510余平方米,为削割瓦绿琉璃剪边庀殿式建筑、单昂单翘五踩斗拱、外檐施金龙和玺彩画、面阔五间、前有月台丹陛、崇基石阑,建筑规格高。庆贺礼时,皇帝升座,三公九卿立于丹陛之上、文武百官按翼排班立于月台之下。丹陛大乐响起,百官行跪叩礼,皇帝赐茶,场面宏大。先农坛内最小的建筑群——神仓建筑群,是用来存储皇帝亲耕地亩所获,粮食接收、加工以及相关农具存放也都在此。神仓虽然是两进院落,但仅占地3435平方米,建筑小巧、布局紧凑。神仓内最小的建筑收谷亭,其面阔仅6~7米,面积也不足50平方米,建筑形式为四坡攒尖顶,不施斗拱。这两组建筑群及其建筑无论从规格或体量上相比反差都极大。又如,先农神坛青砖素砌、古朴肃穆,皇帝观耕的御台雕龙缠莲、流光溢彩。如果将这些建筑一律看齐,排列在一条或南或北、或东或西的轴线上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若真正实施起来,不但增加坛域的面积,也会使得祭祀的各个环节由于距离的加大而徒增行走之劳。从建筑美学上看也会显得唐突无序,不甚协调。

聪明的古人并没有这么去做。我们看到这五组建筑群,在形式上虽然是由西向东顺次排列,但实际上并不是一字排开,而是大小相间、南北相错布局的。例如,太岁殿院落占地面积大,为7700平方米,它坐落在北侧;具服殿——观耕台——耜田一组,分

散、无外墙,皇帝亲耕时场面热烈隆重,要求较大的活动空间,位居南侧,与宏伟的太岁殿院落南北相对。小巧紧凑的神仓夹在体量大、面积大的太岁殿院落与庆成宫院落之间。尤其是各建筑组群,设有各自独立的院墙,院墙不但划分了建筑的功能归属,还可以遮挡视线,避免了建筑由于造型、体量上的差异,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冲突。我们看到先农坛内的建筑,造型各异,色彩丰富,既有集中又有分散,既有高大宏伟又有小巧别致,既有古朴素雅又有华丽典雅。建筑组群安排疏密得当、张弛有序,颇具韵律,在松柏榆槐的掩映下,坛庙除庄严肃穆的气氛之外,也平添了许多亲切祥和的氛围。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也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中,祭祀是无与伦比的头等大事,礼仪制度是国家政治统治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维护国家秩序的重要社会功能。环绕于京城四周的坛庙建筑是国家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是国家典章礼仪的重要演示场所,也是皇帝向天下臣民显示其天子统治、教化臣民的神圣舞台。笔者认为,先农坛虽然历史上进行过几次易名、改建,但是无论其建设之初或改建之时,古人对先农坛建筑组群的设计规划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其安排得当、经得起推敲,令后人佩服。

二、先农神与坛内其他诸神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农业文明发展最早的民族之一。原始的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崇拜自然、敬畏自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其文化的最大特点。山岳河湖、风云雷雨以至自然节气等等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与农作物成长的诸方面自然因素均成为崇拜的对象,农业文明的始创者更给予特殊的崇祀。对农作物成长直接产生影响的是集合于先农坛内的众神。

北京先农坛内祭拜的神灵,在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基本固定下来。除了先

农神之外,在太岁殿院落内有太岁神、十二月将神,天神坛内有风伯、雨师、云师、雷师,地祇坛内又有五岳、五镇、五陵山、四海、四渎之神及天下、京畿的名山大川之神。统计起来,祭拜神祇的神坛有4座,供奉的神祇牌位有45位之多,可谓众神云集。

先农神即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旧汉仪》有“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将炎帝神农氏作为耕藉礼前供奉祭享的神主,是自汉代树立、后代效仿而历代相沿下来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几度更改,例如唐神龙年间,将先农与社相并提,曾改先农坛为帝社稷)。考古发掘研究证明,我国在距今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以前,就有粟、稻等农作物的人工栽培,原始农耕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炎帝时代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历史古籍中对炎帝的功绩有很多的记载。《周易·系辞》记:“包牺氏没,神农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三皇本纪》载:“耒耜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周书》又记:“神农耕而作陶”、“治斤斧,为耒耜耒耨”,创造生活用具及生产工具,《帝王世纪》记:“尝百草,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发明中草药等等。目前学术界关于神农、炎帝,持一人说或两人说,各执一词,尚无定论。但或许他只是个氏族部落的首领,其数代子孙沿袭祖先称号,以其先进的农业文明而著称于世,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同黄帝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得到公认与崇祀。

宋代罗泌撰《路史》记:“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湖南长沙北有炎陵县,地方志书《酃县志》记载汉时此地已有陵。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建庙,官府祭祀“三岁一举,率以为常”,形成定例。至今千余年的历史中,朝廷官府祭祀炎帝陵的活动以明清两代为最。1988年国家投巨资,陵殿重新修复一新,现建筑有五

进,金碧辉煌,重檐翘角,气势恢弘。近年来,政府在此组织大型的祭祀活动,公祭这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陵对炎帝神农氏的祭拜,不同于先农坛内对炎帝神农氏的祭拜。前者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后者则是作为掌控天下五谷收成的农神,主宰农作物生长的神祇。“祀于外为社,祠于内为祖”(《礼记·祭礼》)。炎帝陵祭拜炎帝神农氏于金碧辉煌的大殿之内,通过对先祖的瞻仰、缅怀他的功绩,起到对整个民族的激励与教化作用。先农坛则将炎帝神农氏的牌位供奉于露天的神坛之上,通过一系列祭拜活动,表明敬畏之情,祈福消灾,祈求丰收。另外,先农坛的“先农”之意又有王者率天下先,先行农事的含义。天子以身为先,祭祀农神,亲自耕作,为天下百姓做表率、示范,达到教化百姓、敦本务农的治国目的。

对农神的崇祀在世界上许多农业文明古国都曾有过。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印度的地母神、玛雅文化的农业女神、印第安的玉米神、两河流域的丰产女神等等。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及本土文化中都有对各种农神的祭祀活动。韩国汉城每年的四月份在城东门广场举行大型的祭祀先农活动,据说活动由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担任主祭人,同时举办大型的欢庆活动,农者欢跳农乐舞,高举着“农者天下之大本”的字幢,以此预祝一年的好收成。在韩国的汉城,祭祀先农活动被列入有形文化遗产的名录中,历史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发扬。

我国古代崇祀的农神又有后稷、柱、先啬、田祖等多种称呼,其中关于后稷的传说最多。后稷与炎帝神农氏并非一人。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周人认为他是开始种稷与麦的人。西周时国家设立农官亦称为后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有烈山氏之子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郑玄有注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今湖北随县有厉山,又名烈山。隋、唐及宋、元、明历朝的官

祭先农的仪程里都曾有过以后稷作为配祀的,甚或主祭神的。

另外,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农业的丰欠直接影响到民生、关乎国家的命脉。“社稷”一词,“社”代表土神,“稷”代表谷神,泛指五谷,对社稷的祭祀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社稷更成为国家的代称。唐代神龙元年(705)曾将先农改作社稷,在耕田内进行祭祀。在古代中国的信仰中,社稷不同于先农,社稷之重在于国土疆域;先农之祭重在不误农时、敦本务农。最终,炎帝神农氏作为国家祀典的农神被固定下来,且多不配祀其他神祇。

先农神坛“制方,南向,一成,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四出阶各八级”。先农之祀,明初列为大祀,后改为中祀,清代沿之。祭祀时“先农神座于坛正中南向施黄幄”,皇帝的拜位在“坛上正中北向”。(《清会典事例》卷1079)坛下文武百官、钟磬鼓瑟,预先列阵于坛下,静候皇帝的到来。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簇拥着皇帝由坛东门进入。皇帝自神坛南阶登坛,至拜位。中和韶乐响起,文、武舞生歌舞齐发,皇帝率百官,经初献、亚献、终献、望瘞等几道程序,向先农神行三跪九叩大礼,完成对先农神的祭享。

太岁神系值年之神。太岁者,古代纪年所用值年干支的别名。古人认为与天上的岁星相对应,地下有太岁在运行,所谓“岁阳右行于天,岁阴左行于地”。天上的岁星即木星,十二年一周天,自西向东运行;太岁也有方位,自东向西,同样十二年一循环,因此以每年太岁所在方位纪年。例如,逢甲子年即岁在甲子,此年太岁为甲子。以此类推,乙丑年即太岁为乙丑。后来又以天干地支相配组成六十干支。人们以每年的太岁为值年之神,认为它主宰着四时寒暑的运行。又因为它有方位,故与动土兴建、迁徙、嫁娶的禁忌都有关联,以至民间有俗语——“不得在太岁头上动土”。早在先秦就有太岁的禁忌,《诸子百家·荀子》记“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南而迎太岁”,上世纪60年代湖北出土青铜兵器“兵避太岁”

戈。汉代民间,以太岁所在方位为凶,建房、出行均要回避太岁方位。王充《论衡·难岁》对这种迷信现象评论说“假令太岁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称东西若徙四维”。后来太岁演变为道家之神,北京白云观有元辰殿,供奉六十甲子神。宋代以前太岁的信仰多在民间流传,并不列入国家祀典。明代世宗朱厚熹拟祭太岁,令礼官考典。礼官考证“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于南城享祀之所”,并以“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今祭太岁月将则四时与寒暑之神也”(《春明梦余录》),阐明了祭祀的理由。明世宗朱厚熹笃信道教,太岁神正式登堂入殿,列入国家祀典,始于此时。(《明史》卷49)清代沿之,每年孟春岁暮遣官祭祀。皇帝到先农坛享先农行耕耜礼,有时也到太岁殿的拜殿行拈香之礼。皇帝亲征、凯旋或国家遇灾异等均祀之。如清圣祖玄烨,亲征准葛尔,遣官祭祀太岁神(《清史稿·礼志》)。

北京先农坛内的太岁神平时供奉于先农坛神厨院落的神版殿中,致祭时请于太岁殿正殿,殿内正中南向设有太岁坛,是为汉白玉须弥座,高1.4米,广3.18米,深1.6米。致祭时神牌书“某干支(年)太岁神”,供奉于台上,祭祀毕将祭品、祝版等焚烧于拜殿东南的焚帛炉内。许多人曾提出质疑,认为先农坛内的建筑,为何太岁殿如此高大宏伟?太岁殿单檐歇山顶、黑琉璃瓦绿剪边,面阔七间、进深九檩,施重昂单翘七踩溜金斗拱,内檐彩画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外檐施金龙和玺彩画,坐落在六层台阶的高台之上,是先农坛内最为高大宏伟的建筑。考太岁殿始建年代为永乐建山川坛时,时殿内祭祀着除太岁神外,又有十二月将神、风雨雷电、岳镇海渎、京畿山川、京城城隍及皇陵山等众多神祇。嘉靖十一年(1532)改山川坛为天神、地祇坛后,相关众神迁出先农坛内坛,仅剩除先农神外的太岁神及十二月将神了,但建筑没有变。可能太岁乃凶煞之神,触犯不得,此殿之大便延续历史保留下来。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目前尚无找到更

为有力的论据,希望得到同界们的指教。四季月将之神分祭于太岁殿院落内的东西两庑,东殿为夏、冬二季月将。西殿为春、秋二季月将。原来京畿山川、京城城隍与十二月将之神分别祭祀于东西两庑。后来京城城隍撤出山川坛,另建庙宇专祀;京畿山川归并于地祇坛。同太岁坛宇之祭一样,十二月将之神的专祀也为明代所始,祭期同太岁。农业社会,农时节气关乎作物的成长收获,耽误一个农时、错过一个节气,往往影响到一年的收成。先秦《礼记·月令》记述了各个月份的政令政务,贯彻于其中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按部就班的宗教典礼活动,这既是农业文明信仰所需,也是统治者治国的需要。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现象,恰如耕耜礼,其功能是为了告示百姓耕种季节到了,开始生产,莫误农时。

天神,即指风、云、雷、雨四神,系影响天气的气象现象,气象现象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好坏,对于完全靠天吃饭的古代社会,这些神灵的祭祀是不可少的,直到现在一些民族地区依然存在。天神坛“制方南向一成,方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阶各九级,坛北刻云形青白石龕四座,各高九尺二寸五分”。(《清会典事例》卷865),祭祀时神位供入龕中。明代嘉靖时期,风、云、雷、雨四神虽然在先农坛内设专坛祭祀,但在天坛的圜丘坛,每岁冬至祭祀时,以风、云、雷、雨四神从祀。(《明会典》卷81)尤其清雍正以后京城内建立了凝和庙、宣仁庙、昭仁庙等庙专祠,天神坛便更是形同虚设了。

地祇诸神为五岳、五镇、五陵山、四海、四渎之神及天下、京畿的名山大川之神。古人认识到山林川谷丘陵等自然地理地势影响着云雨气候的变化,同时又是物产的来源,影响着民生。对这些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敬而神之,自古有之。地祇坛“制方北向一成,广十丈纵六丈高四尺,四出阶各六级,坛南设青白石龕五,刻山形者三均分五间,刻水形者二均分四间,各高八尺二寸。坛东从位石龕刻山水形各一,西如之,各高七尺六

(下转第39页)

阮旻锡及其《燕山纪游》考

车
萍
萍

阮旻锡是明末清初人,1666年来到北京,后在北京燕山太子峪的观音庵出家为僧,“留滞燕云二十余载”。其间,他将游览北京及周边的见闻写成《燕山纪游》一书,此书是研究清代北京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文献。关于阮旻锡的生平事迹,相关文献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甚至有错漏之处。而《燕山纪游》在流传过程中也已散佚,其佚文主要见于朱彝尊《日下旧闻》等书,但辑录不惟不全,而且有所删削错讹。本文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拟对阮旻锡的生平及其《燕山纪游》佚文做进一步考辨,以期补文献之阙,正转引之误。

一、阮旻锡生平考述

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出家为僧后,名超全,自称“轮山遗衲”,在其著作中,还曾署名“鹭岛道人”。祖居金陵,明洪武年间以军功袭百户,移居福建厦门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大致可推算出阮旻锡的生卒年月:其一,据嘉庆

《同安县志》中载：“闯贼陷京，旻锡方弱冠，……年八十余卒。”^①明末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间为1644年，此时阮氏年方弱冠。《礼记》称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这表示已经成人，但体还未壮，所以称做弱冠，后来16至20岁男子都可泛指弱冠。其二，阮旻锡在其《海上见闻录定本》自序最后写道：“岁丙戌六月朔日，八十叟轮山梦庵书。”^②根据上一条的时间范围，可确定丙戌年应为康熙四十五年，即1706年，此时阮旻锡80岁；其三，《闽中理学渊源考》中收录了阮旻锡为丘葵《却聘诗》所作的辨正，此文落款为“癸巳仲春上弦，后学八十七叟轮山阮旻锡书于类村之回清亭。”^③癸巳年为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此时阮旻锡87岁。以上三条大致可确定阮氏的生卒年月，其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后。

阮旻锡的父亲阮伯宗与明末名臣曾樱曾有患难之交，因此在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后，阮旻锡拜曾樱为师，并追随其抗清。1651年，厦门被清军攻破，曾樱自尽殉节，阮旻锡和陈泰冒险收尸。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设立六官及储贤馆等，阮旻锡是储贤馆的成员之一，也就是郑成功的幕僚，所以他对郑氏事迹非常熟悉。1663年秋，阮旻锡“从鹭岛涉江，栖止无定。”^④在离家远游其间，阮旻锡“又得曹石仓所游之友杨能元、池直夫，闻其绪论，讲习风雅，如是者十六、七年。”^⑤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666年^⑥，抵京师。客居京师期间，阮旻锡游览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名胜古迹，每游一地，都留下了抒情感怀的诗篇。1683年，阮旻锡在燕山太子峪的观音庵由古槐和尚剃度，出家为僧。从《夕阳寮诗自序》中可知，他在1680年就有归隐山林的想法：“戊申，舍弟辈移居邑东夕阳山下。山有夕阳寺，唐宣宗为沙弥时游息处也。庚申^⑦，返自京师，葬二亲于山麓。念欲归隐此山，守先人丘垄，有怀未遂。癸亥^⑧，予在燕山依古槐剃发，从此故乡亦不复思返矣。”

从1666年到1688年，阮旻锡在京居住了大约22年，正合其在《海上见闻录定本》序中写道：“迨海山破后，弃家行遁，奔走四方，留滞燕云二十余载”之语。1688年，阮旻锡到武昌访友丁雁水。1689年，再至金陵，并买屋隐居城南，其所居之所匾曰“夕阳寮”，他的诗集、诗文也以此为名。1694年^⑨，阮旻锡老归故里，在武夷山天心寺为僧。

阮旻锡工于诗，青年时便闻名于闽地。其诗集《啸草》“罗罗清疏，言必称乎情。如咏郑所南《心史》及赠陈白云、和王百谷诸作，皆峭出无世俗雕镂绮缛之习。”^⑩阮旻锡一生所做诗文很多，单是现存的《夕阳寮诗稿》、《夕阳寮存稿》就收录了各体诗517首，可窥见其诗歌一斑。阮旻锡的知识非常广博，不仅深究性理，默契六经，还“旁及道藏释典、诸子百家、兵法战阵、医卜、方技之术靡不淹贯。”^⑪其著述颇丰，主要有：《四书测读》、《易阙疑》、《金刚经说》、《续佛法金汤》、《海上见闻录定本》^⑫、《谈道录》、《清源会诗篇》、《燕山纪游》、《夕阳寮诗稿》、《慧庵倡和韵选》、《轮山诗稿》、《幔亭游稿》、《啸草》、《夕阳寮存稿》、《击筑集》、《涉江诗钞》等。另外，阮旻锡对茶艺也很有研究，他所写的《武夷茶歌》与《安溪茶歌》是研究武夷山茶文化的名篇，是关于乌龙茶制作的第一手资料。

二、《燕山纪游》辑考

阮旻锡与北京有不解之缘，他在北京出家为僧，并客居燕山二十余载，除故乡外，北京可算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了。其著作《燕山纪游》记录了他游览北京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该书成稿时间不晚于1680年^⑬，此书是研究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阮旻锡的著作大多已散佚，现今能见到的只有《海上见闻录定本》、《夕阳寮诗稿》、《夕阳寮存稿》等几种而已。《燕山纪游》原书已佚，幸好现存的《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盘山志》等书中，还存

有《燕山纪游》的部分佚文,兹录如下:

1. “表忠寺门左右各二松,一石,俱奇古。”^⑭

2. “昌化寺殿壁绘阿罗汉五百尊,穿崖渡海,神通游戏,宣庙时吴伟小仙笔也。”^⑮

3. “圣水寺下临涧泉。阁后一松,直而多荫。松后石窟,夏月阴凉,坐久毛发尽竖。旁有一石楼,极高峻,下指村庄,为福田、嘉禧诸寺。”

4. “洪福寺松萝俱古。度念佛桥,即宝珠洞也。”

5. “石径山孤峰特立,洞皆凿石而成。最上为金阁寺,有塔,宜远眺。东南行至林衡署,有古松数百株,参错平野间。其地盖先朝果园也。”

6. “滴水岩在万山中。出磨石口至三家村,浑河倒映,崖壁峭绝,皆作丹黄青碧色。河流其下,迂纤其上,度十余里入军庄,一峰侧出,而腹藏洞者,为建阳洞。舍河行枣园,越仰山岭,乱山拥塞,几不得路。循山趾行,夹壁中有村临谷口,为桃源村。村前孤峰矗立,中有洞,昔人避兵处也。复沿洞过仰山村,山多梨树,秋深红叶如烧。折而西上黄牛冈口,径愈仄,壁愈狭,峰愈变,转十八叠,有垣而垠屋而丹,是谓滴水岩矣。悬崖千仞,岩洞皆削成无缝。泉布石面,大珠小珠,游移如屋漏然。旁有穴,燃炬以入,广可三十余丈,洞中石乳为莲花垂,为象鼻。右一石床,幕以石,龙见其上。中石坳开其窠,侧身螺旋而下,水光所射几灭炬,再入,则潭深莫测矣。从岩侧取径而上,杖履铿然。山石骨而中虚,俯岩背,视岩犹谷底。二十里至北顶,连冈伏岭,势反平坦,可望居庸诸塞。归从仰山寺,金大定中栖隐寺也。”

7. “从滴水岩而上大云寺,山最高,是西山万峰之岭也。”^⑯

8. “阮旻锡《上方山记》:度卢沟,循房山而西,到接待亭,一望皆丹崖翠壁,游者舍骑扶策,径旋步折,得稍平处为欢喜台。前登兜率门,两峰壁立,中砌石级,铁锁高垂,凡三转至毗卢顶。山中为刹七十有二。寺

之古者曰兜率,创自隋唐,多华严师遗迹。峰之岐处为朝阳洞,传有白猿听经于此。洞中二泉,澄泓可鉴毫发。山坞早龙潭,龙去潭枯,然纤尘不入,峰最尊者为斋星陀,华严于此斋星。曰摘星,讹耳。僧巢其巅下,如飞鸟然。”^⑰

9. “银山度岭数折,峰渐分为三,左一峰石卓立如锥,峰下有塔凌空,为法华寺。寺建于金天会三年,曰大延圣寺。正统间,太监吴亮修。寺后古佛岩乃后人新凿。再上为邓隐峰说法台。复蹶危蹬五、六里为中峰,顶峰石锐上如斧刃,悬索升之,凡两转至顶,一石台方丈许,翼以扶栏,中一石龛供石佛。左悬一钟,升者击焉。寺塔七,高各数丈。”^⑱

10. “盘山异迹,有除夜佛灯。灯出通州孤山塔上,分为数千百,远绕盘山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塔中舍利光也。”^⑲

11. “九华峰最丽,寺曰千像。天门开,两岩相揖,崖悬壑绝,必继而后可登。”^⑳

以上十一条佚文皆为朱彝尊《日下旧闻》^㉑的原文。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在纂修《日下旧闻考》时,在卷一百四十九增加了一条:“过仰山村,山多梨树,秋深红叶如烧。”并注明引自《燕山纪游》,这一条实属第6条佚文,在此不把该条单独列为一条佚文。这种情况在《日下旧闻考》中多处可见,如卷九十引《长安可游记》^㉒:“燕地苦寒,江南群芳不易得,即有携种至者,仅可置盆盎中为几席玩。其有进御者,皆为火迫而发,日月朝夕之艳,无经岁岁计也。”这段文字是《日下旧闻》的原文,为了说明京师的物产,《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又将此段文字增录进卷一百四十九中。《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十五还增加了一条阮旻锡的《游盘山记》,引用书目为《盘山志》:

“阮旻锡《游盘山记》:盘山壁立,又名盘龙峰。岁乙卯秋仲,路出三河,逾数岭至卫公庵,登舞剑台。考《唐史》,公为定襄道总管,岂当日或登此峰欤!至上盘,礼定光佛舍利塔。右一峰,黄龙祖师殿也。暮宿云罩寺,望上方,僧言九华峰最艳丽,寺曰千

像,唐开元寺也。天门开,两岩相揖,崖悬壑绝,必继而后可登。戚继光、袁宏道而后,无继者。若夫悬空摇动诸石,及潭洞有黑龙、白猿之胜,竟以人踪希绝,怅然者久之。次日从山腰下大中盘,询宝积大师禅堂道场,荒芜久矣。山中灵迹,有除夜佛灯之异。灯出自通州孤山塔上,中分为数千百朵,远绕盘山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此灯即塔中舍利光也。”

对照第10、11条佚文,可知这两条佚文是阮旻锡《游盘山记》中的文字。为何《游盘山记》一文的引用书目是《盘山志》而不是《燕山纪游》呢?笔者查阅了康熙年间释智朴纂辑,朱彝尊、王士禛校订的《盘山志》及乾隆时蒋溥等纂辑的《钦定盘山志》。《钦定盘山志》卷十六“杂缀”有:

“阮旻锡《燕山纪游》:盘山异迹,有除夜佛灯。灯出通州孤山塔上,分为数千百,远绕盘山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塔中舍利光也。”

这段文字和《燕山纪游》第10条佚文一字不差,应是转引自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另外,《钦定盘山志》中收录的阮旻锡诗文在《盘山志》中都能找到,但《盘山志》中收录阮旻锡的《出下盘》等诗,《钦定盘山志》却未收录。《钦定盘山志》成书时间在《盘山志》后,显然,《钦定盘山志》中所收录的阮旻锡相关诗文是转引自《盘山志》,《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十五所引阮旻锡的《盘山记》不完整,应以《盘山志》一书为准,现转录如下:

“盘山记

盘山壁立薊门,远而望之,四正如一,浑然一峰耳。入山中,则奇峰叠出,盘桓起伏,百有余里,故又名盘龙峰。皆累石而成,石磊磊然;泉穿石罅而出,水淙淙然;介泉石间者,古松罗列,郁郁苍苍然。夫山有石矣,未必千峰皆石,无肤寸土也;泉矣,未必万壑皆泉,随处可挹也;松矣,未必万松偃盖,中鲜杂树也。斯则山之独擅其胜者乎?岁乙卯秋仲,余同远公诸君路出三河,取侧径,逾数岭,至卫公庵,顾瞻泉石而叹,有似吾岛中山

也。登舞剑台,考《唐史》,公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岂当日或登此峰欤?晨历青杨峪,猿攀蚁附,可二十里至上盘,礼定光佛舍利塔。右一峰,黄龙祖师殿也,俯视八垠,如观掌,果最奇绝者。是日,秋清气爽,望卢龙古塞、黄花、白狼三千里内,烽台、濠塹了然睫中。而塞外山特高峻,屹立万仞,横绝北纪,始知大荒之外别有五岳三山,而瓮底醢鸡、井中蛙蛤为见小也。暮宿云罩寺,望上方霭霭苍崖间,僧言九华峰最艳丽,寺曰千像,唐开元寺也。天门开,两岩相揖,崖悬壑绝,必继而后可登,戚继光、袁宏道而后无继者。若夫悬空摇动诸石,及潭洞有黑龙、白猿之胜,竟以人踪稀绝,怅然者久之。次日,从山腰下古中盘,询宝积大师道场,则荒芜久矣。山中灵迹,有除夜佛灯之异,灯出自通州孤山塔上,中分为数千百朵,远绕盘山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塔中舍利光也。噫!世人终岁劳攘,迫除之夜,方将与妻孥团圆,杯酒间,孰肯向空山寂静冷然借僧床一觉哉!而余久客燕山,亦终未能一睹,可慨也夫!”^②

那么阮旻锡的《盘山记》到底是不是其《燕山纪游》的一部分呢?这个问题朱彝尊应该是清楚的。朱彝尊生于1629年,卒于1709年,他与阮旻锡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期。朱彝尊《日下旧闻·抄撮群书目录》中明确记载有“阮旻锡《燕山纪游》”,该书是目前所见最早引用《燕山纪游》的书籍,加之《日下旧闻》成书于1687年,与《燕山纪游》成书时间相去不远,朱彝尊应见过《燕山纪游》的原书。朱彝尊纂《日下旧闻》时,虽将其所摘资料一一注明出处,但采取节录的方法,破坏了资料的完整性。阮旻锡的《游盘山记》就属这种情况,他只是取其中的一部分文字,而不是收录全文。而释智朴纂辑的《盘山志》收录的阮旻锡《盘山记》一文没有注明出处,《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转引阮旻锡的《盘山记》时引用书目为《盘山志》而不是《燕山纪游》,造成这种引用书目不一致的原因还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于敏中等人可能没有看《燕山纪游》的原书,直接转引了《日下旧闻》和《盘山志》中阮旻锡

的相关文字；二是《燕山纪游》一书在乾隆年间已经散佚了，所以《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们不知《盘山记》是《燕山纪游》的一部分。综上所述，《盘山志》中收录的阮旻锡的《盘山记》确为《燕山纪游》的一部分。

在此，应引起注意的是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奉敕纂修的《日下旧闻考》虽搜罗详洽，辑录丰富，堪称迄清为止最为详备的北京历史文献。但该书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编纂者在收录、编纂资料的时候，存在删削与节录的现象。如上文阮旻锡的《盘山记》。其二，《日下旧闻考》成于众手，所见书籍不同，出现了同一篇文献摘自不同书的现象。如该书卷九十引《析津日记》：“芍药之盛，旧数扬州，刘贡父谱三十一品，孔常父谱三十三品，王通叟谱三十九品，亦云瑰丽之观矣。今扬州遗种绝少，而京师丰台连畦接畛，倚担市者日万余茎。惜无好事者图而谱之。丰台之名，不知所始，询之土人，并无台也。”这条是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原文。而在卷一百四十九于敏中等人增加了一条：“《析津日记》云：‘京师丰台芍药连畦接畛，荷担市者日万余。’”引用书目又为《涿州志》。其三，从他书中转引已散佚的书籍时，有未注明出处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日下旧闻》与《日下旧闻考》并不少见。如《茅斋自叙》、《入燕录》、《陷燕录》等书早已散佚，其佚文皆出自《三朝北盟会编》，但《日下旧闻》与《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没有注明这些佚书的出处，而直接引用佚书，容易使人误解这些书未散佚。因此，在转引《日下旧闻考》中的文字时，应尽量与原书进行核对，原书已散佚的需考察最先引用佚文的书籍，详加考证，避免以讹传讹。

三、结 语

从《燕山纪游》的佚文大致可了解其记述内容为北京及周围的景观，该书有较重要的价值：

第一、该书所记内容是作者客居北京时亲身游历的所闻所见，所以阮旻锡的的记述

史料价值较高。《燕山纪游》佚文可与明清时期北京地方史志及笔记、杂记相互补充，为考证当时历史地理情况提供证据，也为研究北京历史民俗提供了参考。如康熙年间仰山村（今门头沟妙峰山镇南沟村）不仅产梨，还有“秋深红叶如烧”的美景。

第二、为开发北京周边旅游业提供有用的信息。从《燕山纪游》佚文看，阮旻锡对景观的记述很有条理，其游览的路程、方向、距离记载明确，有助于相关部门收集旅游信息，分析景观资源的可利用程度，从而确定兴办旅游业的可行性。如，时下北京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镇正组织开发、修复滴水岩、仰山栖隐寺等景观，《燕山纪游》第6条佚文中，仰山的景点如今有的还未被开发、有的已废弃，如建阳洞、滴水岩、仰山栖隐寺等，阮旻锡的记述可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第三、从《燕山纪游》现存佚文看，此书不仅有史料价值，其文学价值也颇高。如《盘山记》一文，作者仅用几百字就概括了盘山的主要景点及掌故，语言简洁清晰，叙述生动，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

另外，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释智朴的《盘山志》中还收录了阮旻锡游盘山时写的十首诗，其中的四首：《盘山》：“五龙塞外飞，一龙塞内止。飞作卢龙蟠，止作盘龙峙。有峰皆怪石，无壑不秋水。古松奋苍髯，更欲盘云起。黄龙老尊宿，遗殿空山里。似憨肤间虫，蛄腩内生死。余本餐露人，不学屠龙技。敢卖卢龙塞，微名点青史。西登舞剑台，将军忆故李。”《出下盘》：“万壑松声万壑泉，芒鞋踏破五峰烟。惊魂犹向岩间坠，快意无如洞里眠。弹指遍开弥勒阁，分身却下大罗天。唐碑宋碣曾何有，愁闭空山六百年。”《游盘山归，苍林上人有诗见讯，依韵答之》：“老尽渔阳侠客心，青霜匝地冷龙蟠。五更谁打冬冬鼓，百岁空为数数吟。晓梦无端云易散，秋灯有焰月先沉。近来不用参方丈，会得盘山卖肉砧。”《古中盘游大博和尚塔院并呈宗上人》：“偶随烟外钟，已到松间寺。中峰紫盖尊，群山皆拱翠。法师

南方来,重辟法云地。梵刹银榜新,勋戚金钱施。一期大教兴,三叹影堂闭。传法老比丘,已得无碍智。面莹爪甲长,开关为客至。顾我钝根深,不受箭锋利。盘山古道场,法幢开宝积。普化示风颠,振铎偶游戏。到今已千年,宗风谁继嗣。落日下秋山,山间明月坠。峰峰皆见月,清光照无寐。”在《日下旧闻》与《日下旧闻考》等书中并未收录,故不敢断定是否为《燕山纪游》中的一部分。但可为阮旻锡的其他著作做补辑,据《夕阳寮诗稿》前的编者按:《夕阳寮诗稿》的卷一、二已佚,诗稿收录的是阮旻锡自康熙二年(1663年)到康熙癸酉(1693年)三十年间所写的诗作合集,那么阮旻锡游盘山时写的诗应都在此范围内。现存的《夕阳寮诗稿》、《夕阳寮存稿》只收录《盘山登挂月峰晚眺》、《盘山宿李靖庵》、《定光佛塔诗》、《盘山绝顶次戚少保韵》、《宿云罩寺》、《题盘山图》等六首诗,今将《盘山志》中阮旻锡所作的其余四首诗辑录出来,以补《夕阳寮诗稿》之缺。

①(清)吴堂、刘光鼎等修纂:《同安县志》卷三十三“人物”,光绪十二年刻本。

②(清)阮旻锡撰:《海上见闻录定本》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缩微胶片,2003年版。

④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九册《夕阳寮诗稿》“夕阳寮诗四首并序”,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嘉庆《同安县志》卷三十三“人物”。

⑥厦门市修志局修纂:民国《厦门市志》卷廿二“艺文志”引阮旻锡《击筑集》自序云:“《击筑集》者,阮子客燕作也。阮子自丙午入都,计六易寒暑矣。”按:丙午年为康熙五年,即1666年。

⑦1680年。

⑧1683年。

⑨《海上见闻录定本》序曰:“庚戌春,老归旧里,意当时同事诸君必有所记录,而耆旧凋残,无可寻访,搜求数载,乃得先藩户官都事杨英所记《海上实录》二本。”查庚戌年为1670年,当时阮旻锡在北京。疑庚戌为甲戌(1694年)之误,阮旻锡68岁,与“凋残耆旧”、“搜求数载”等语相符合。

⑩民国《厦门县志》卷廿二纪许国《啸草序》。

⑪林学增、吴锡璜等修纂: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十二“人物录”,《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2000年版。

⑫阮旻锡弃家远游时曾草就《海上见闻录》一册,老归故里后重新修订成《海上见闻录定本》。

⑬民国《厦门县志》卷廿二《阮畴生诗》:“《魏敬士文集》云:先生于闽尝师事峡江曾公樱,……庚申夏,先生携其《涉江》、《燕山纪游》、《诗》来访家大人于翠微园,因属家大人序其集。”庚申年,即1680年。

⑭《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二引《燕山纪游》。

⑮《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引《燕山纪游》。

⑯第3至第7条佚文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引《燕山纪游》。

⑰《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引《燕山纪游》。

⑱《日下旧闻考》卷一三四引《燕山纪游》。

⑲⑳《日下旧闻考》卷一十六引《燕山纪游》。

㉑清乾隆年间,于敏中等纂修的《日下旧闻考》是根据康熙年间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原本,删繁补阙,援古证今,一一详为考核,定为此本。《日下旧闻考》编纂凡例云:“凡朱彝尊原引,则加一‘原’字于上,朱昆田补遗者,则加一‘补’字于上,其新行添入者,则加一‘增’字于上,逐条标识,以期一目了然。”

㉒《长安可游记》明宋启明撰,已佚,其佚文首见于《日下旧闻》。

㉓(清)释智朴纂辑:《盘山志》卷六,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山水志丛刊》山志卷四,2004年版。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史方向研究生)

空调系统造成的

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与对策

刘树林 刘恩迪

一、引言

长期以来,有害微生物一直是威胁文物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物所处环境的相对封闭状态,加剧了这种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这种影响长久伴随文物,危害就更显严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对文博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博物馆的基本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标志之一就是文物展室、库房及办公区域安装了空调机组,使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中的尘埃量得到有效的调控,对文物保护起到良好的保障。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由于空调系统使用、维护不当而造成的室内空气中微生物污染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二、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的危害

1. 对文物的危害

众所周知,有害微生物是文物保护的大

敌。它们可以将有机质地材料作为营养物质,不断地分解吸收,使文物遭受霉腐破坏;它们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有机酸,不仅对有机质地文物造成损害,而且还能加速石质文物、金属文物的破坏与腐蚀;有害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分泌出颜色各异的色素,不仅影响了文物的外观,而且将文物上的纹饰、图案、文字等具有珍贵价值的内容遮盖。凡此种种,表明有害微生物对文物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因此,长期以来,有害微生物的防治一直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对人类健康的危胁

如今,室内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被公认为是人类健康最危险的杀手之一,其中有害微生物造成的污染占有重大比例。迄今已知的能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有 200 多种,这些感染的发生绝大部分是在室内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原体经空气传播是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室内空气中积聚到一定的浓度时,就会有传染的危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空调系统使用维护不当是造成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的重要原因。

2004 年 2~4 月卫生部对全国 60 多个城市的 937 家公共场所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进行了监督检查,结果令人堪忧:其中空调风管积尘量、积尘中的细菌和真菌含量,合格率仅为 6.2%,通风管道内的最高积尘量达到 $486\text{g}/\text{m}^2$,是标准的 486 倍。由此可见:分布于各类公共场所的大量空调系统正在变成有害微生物的传播媒介,这就完全违背了安装空调的目的。

在“非典”流行的日子里,一些装有空调系统的博物馆展室由于通风条件不佳,又缺乏良好的动态消毒技术,为了防止“非典”的传播蔓延而不得不暂时停止开放;还有一些博物馆由于使用了不适宜的消毒药剂而带来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三、空调系统产生危害的原因

空调系统为什么会造造成室内空气微生物

物污染?研究发现,由于长期运行、维护不当等原因,传统空调机组往往会形成产生微生物污染的关系链。在空调系统的某些部位,如:热交换盘管,尤其是冷却去湿盘管、凝水盘、水封、加湿器及其存水容器、各部件的横向接缝或内表面、较大涡流区的部件如消声器和静压箱、长期处于高湿度下的空气过滤器等,非常容易在局部产生积尘和水分。这些尘埃和水分的积累为细菌、霉菌等有害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旦其他条件合适,它们就会大量滋生繁殖。例如空调箱在整个系统待机期间(如下班或放假),室外空气渗入,箱内温度回升以及冷凝水的积水不断蒸发,箱内的空间成为有害微生物大量快速繁殖的理想场所,其浓度可骤然上升几十万倍;这些有害微生物在繁殖过程中还会产生多种代谢物,如气味、毒素、过敏物质(如细胞膜、碎屑)及尸体等。

对于这些污染物,如果空调系统的过滤装置能够将它们有效地拦截并加以杀灭,就可以向室内提供良好的空气。但目前国内空调系统的大部分过滤器不具备这种功能,一些过滤器所用材料为亲水型滤纸,属于有害微生物滋生繁殖的营养物质,一段时间后有害微生物就很容易地穿过滤器,通过送风管路传播到室内。

通常情况下,安装有空调装置的房间密封性都很好。例如: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文物库房大多要求窗户少且小,近年来一些单位还建造了地下库房,根本就没有窗户;许多文物展厅出于调控温湿度和除尘保洁之需要,也将窗户予以密封或基本不用。这样,就全然没有了自然通风的渠道,室内空气只能通过空调系统与室外进行交换。这种状况下,如果空调系统的过滤装置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则势必造成大量有害微生物在室内积聚。久而久之,室内空气质量就会不断恶化,进而对室内人员的健康和文物的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四、解决的方法

由以上分析可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是需要寻求一种安全高效且能长期发挥作用的过滤消毒技术。科技人员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开发,其中酶杀菌技术和光触媒技术便是二项较为理想的成果。

1. 酶杀菌技术

酶杀菌技术是将从生物体中提取的溶菌酶固定在过滤器的材料中,通过它将空调系统中积存的细菌杀灭。

酶是有触媒作用的天然物质,溶菌酶属于加水分解酶的一种。它通过溶解(切断化学结合键)细菌的细胞壁(细菌的蛋白质外壳),使构成细菌细胞壁分子的结合部分(配糖物、氨、肽等)被加水分解切断,继而受细胞内部浸透压的影响,使细胞膜破裂、细胞死亡从而达到杀灭细菌之效果。

酶杀菌技术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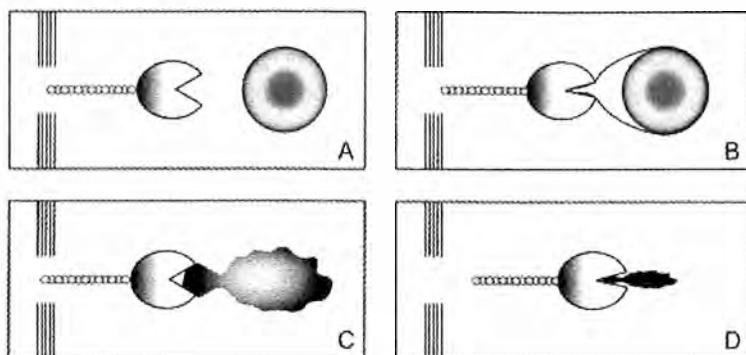
(1)能够迅速有效地杀灭细菌,防止过滤器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细菌滋生繁殖及二次污染。

(2)酶杀菌技术的核心是使溶菌酶以分子状态结合的形式固定在过滤材料上,这种结合具有高度稳定性,不但能保持溶菌酶的活性以高效杀灭细菌,而且不会影响原有过滤材料的过滤性能,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剥离、飞散,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

(3)酶是生物催化剂,反应过程中基本没有消耗,因此被认为具有半永久性的使用寿命,至少在过滤器的使用寿命范围内,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使用简便经济,一次投资后,不需要外加能量和装置,不需要补充材料和增加费用。

(4)酶杀菌技术对环境对人体无毒无害。酶是生命体所必需的物质,在食品卫生法中,酶作为天然的食品添加物,其使用安全性被认为“与普通食品相同”。有资料

介绍,溶菌酶含于需要长期保存的鸟及鱼的卵中,可防止外部杂菌引起腐烂;含于人体及动物的眼泪及唾液中,可阻止细菌进入体内引起感染,担当了细菌防护堤的重要角色。



溶菌酶灭菌过程示意图

2. 光触媒技术

光触媒是指以纳米级二氧化钛为代表的——类半导体氧化物。在光的照射下,它们会发生类似光合作用的光催化反应。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在吸收光能量之后,分子运动变得特别剧烈,成为激发态,可以产生带正电的空穴 h^+ 和带负电的高活性电子 e^- ,



带正电的空穴可以将吸附在二氧化钛表面的水分子 H_2O 氧化成氢氧自由基($\cdot OH$),



带负电的高活性电子 e^- 与附在表面的氧气起还原反应后,生成超氧化物负离子(O_2^-)



氢氧自由基($\cdot OH$)和超氧化物负离子(O_2^-)具有极强的氧化作用,可以在瞬间(1/1000秒内)将与其接触的有害微生物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

光触媒技术的特点:

(1)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具有极强

的灭菌功能,它可以破坏细胞的细胞膜,使细胞质流失至死亡,凝固病毒的蛋白质,抑制病毒的活性,并捕捉、杀除空气中的浮游细菌。实验表明,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对不同种类的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化脓菌、绿脓菌、枯草芽孢等)、霉菌(如黄曲霉、黑曲霉、赛氏曲霉、土曲霉、焦曲霉、球毛壳霉、多主枝孢、桔青霉、拟青霉、绿色木霉等)均有很好的杀灭效果,杀菌能力可达99%。此外,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还能抑制一些病原体的传播。

(2)一般常用的杀菌剂能使细菌细胞失去活性,但细菌杀死后,尸体可释放出有害物质,如内毒素。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不仅能影响细菌繁殖力,而且能攻击细菌细胞的外层,穿透细胞膜,破坏细菌的细胞膜结构,达到彻底降解细菌,防止物体表面生长霉菌,防止内毒素引起的二次污染。

(3)通过特殊工艺,可以制备出8~15nm的二氧化钛颗粒,并将其装载于空调系统的过滤网表面,同时保证材料颗粒单独存在于基材之上而不产生团聚现象,从而获得切实可靠的灭菌效果。

(4)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属非溶出型光触媒,化学稳定性非常高,使用时无任何药物溶出或挥发,其灭菌机理在于光催化作用,而不是靠药物的渗出和游离再产生灭菌作用,因此对环境无污染。二氧化钛本身安全无毒,在用于解决室内污染之前,已在食品、日常生活用品、化妆品、医药、养殖业及其他生产、生活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可见对人体是十分安全的。

(5)由作用原理可知,纳米级二氧化钛在光催化时,内部电核产生带正电的空穴 h^+ 和带负电的高活性电子 e^- ,进而生成氢氧自由基($\cdot OH$)和超氧化物负离子

(O_2^-),再对与其接触的有害微生物加以分解;在光催化结束时,电核即行返回原位,在此过程中,材料本身并没有消耗。这种特性就像铁会导电,但本身并不发电,所以不会消耗本身的能量一样。因此,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的抗菌功效具有半永久性。

五、结 语

1976年在美国发生的军团病疫情和2003年在我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非典”,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失,也引起了各国政府部门、有关国际组织以及科学技术界对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一些专家研究指出人类在经历了“煤烟污染”和“光化学烟雾污染”之后,当前正经历着以“室内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第三次污染时代的到来。由传统空调系统使用维护不当导致的微生物污染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方面。它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而且对文物具有重要的破坏作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了解和重视。

空调系统造成的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是伴随着空调系统的普及而出现的问题,解决它需要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因此,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内外不断研发的各种新技术、新材料,经过认真、科学的筛选,将那些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加以移植、引进。这样,我们就能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采取适宜的对策,给予有效的解决,获得良好的结果。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6 年三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7月4日 东城区召开“蓝天工程”一周年表彰大会,老舍纪念馆被评为优秀资源单位。

7月5日~14日 “凤凰,一个美丽的传说”——《凤凰卫视十年成就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7月6日 法海寺二期修缮工程开工,投入修缮经费 600 余万元,北京市文物建筑设计研究所设计,北京怀建集团有限公司施工,计划于 2007 年底完工。

7月15日 由首都博物馆与墨西哥国家人类历史学院合作举办的《美洲豹崇拜——墨西哥古文明》展览开幕仪式在首博礼仪大厅举行。墨西哥文化部部长萨里·贝尔穆德斯、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展览持续到 10 月 15 日。

7月20日 列入市政府“折子工程”的德胜门消防供水工程正式开工,施工单位为北京海安宏昌消防工程公司,预计 10 月份竣工。

7月27日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北京地区博物馆行业奥运培训工作启动仪式,标志着我市博物馆行业奥运培训工作进入全面组织实施阶段,来自全市 81 座博

物馆的 120 余名讲解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8月4日 在市文物局机关礼堂召开全市拍卖公司上半年工作会议,会上对我市 46 家参加《文物拍卖许可证》年审换证工作的企业进行了工作总结,其中有 42 家企业通过年审,另外 4 家予以暂缓。

8月14日 第 27 次局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原由图书资料中心主办和管理的《收藏家》杂志移交首都博物馆主办和管理。8月17日,在《收藏家》杂志社,于平副局长主持了移交工作现场办公会,资料中心主任张展与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高凯军分别代表各自单位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

8月18日 北京市文物公司、荣宝斋、中国书店等八家国有文物商店召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事宜的专题研讨会。

8月23日 市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联合召开“传世与出土宋元瓷器的比较”专题研讨会,会议邀请到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文物鉴定站、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及在京的文物鉴定和收藏界专家进行了研讨。

8月29日 市政协文史委何卓新、匡国良、张妙弟等 20 余位委员视察了大高玄

殿、皇史宬、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等三处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隐患整改进展情况,文保处王玉伟处长陪同。

2006年局系统信息工作会在和敬公主府宾馆召开,局办公室副主任范军同志主持,于平副局长总结了2005年信息工作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机关业务处室、局属各单位主管信息工作的领导及信息员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

8月30日 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在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的陪同下,对目前北京市文物经营状况进行现场考察,并在古玩城进行了座谈。

8月份 德胜门瓮城东西值房修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9月1日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拒马河至大宁水库)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小组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管理局、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市文物局、市水利设计院组成。专家组及各有关单位对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物保护工程现场验收合格。

9月5日 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缮,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恢复对社会公众开放。

9月7日 在市文物局机关大礼堂召开落实李长春同志视察北京文物工作讲话精神及市委市政府领导重要指示座谈会,会议由巴爱民同志主持,孔繁峙局长、舒小峰副局长、于平副局长出席。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机关各处室正副处长约40人参加了座谈会。

9月19日 局党组印发《市文物局2006~2008年关于进一步开展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意见》并部署有关工作。

9月19日~24日 市文物局机关工会组织会员赴甘肃、青海考察拉卜楞寺、塔尔寺、麦积山等文物保护单位。

9月20日 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在孔繁峙局长的陪同下到孔庙和国子监视察指导工作。

9月21日 市文物局与市发改委在市文物局机关大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会公布《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志到会并作讲话。

9月24日 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组织召开《孔子展览(暂定名)》专家论证会,听取了李存山、钱逊、周桂钿、张学智等专家学者对展览提纲的意见。

9月27日 正阳门修缮工程竣工庆典暨《正阳门历史文化展》开幕仪式在正阳门城楼举行,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蕴荣及文物专家王世仁出席。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与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签订“历史学专业就业实习基地建设协议书”,大觉寺正式成为联大应用文理学院的就业实习基地。

9月份 市文物局与市公安消防总队联合开展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对全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彻底清查,将于11月底结束。

三季度 万寿寺东路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取得较大突破,总政歌舞团和总政话剧团在居民腾退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翟鸿祥、吉林、孙安民三位副市长已批示同意总政歌舞团和总政话剧团提出的意见。

三季度 根据文化部颁布的《博物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开始对全市博物馆进行重新登记。

三季度 制定《关于局属博物馆开展经营性活动的管理规定》,并拟定了“博物馆经营巡视检查方案”,加强了对局属博物馆开展经营活动的管理。

三季度 成立了由孔繁峙局长任组长的“博物馆评估定级”课题组,完成了资料收集,初步拟定了分级指标。

三季度 完成了十三陵、北海等35家国保单位的巡视检查和15家重点市保单位的抽查工作,对13处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了抽查,对18家博物馆和文物收藏单位进行了检查,对局属单位进行日常检查20余

次,重要时期、节假日及夜间检查 60 余次。

三季度 完成了 2006 年人文奥运安防项目中的十方诸佛塔、滦州起义纪念塔等 6 家单位的安防项目的验收工作。

三季度 组织对公检法部门涉案文物鉴定 21 次,接待前来鉴定的人员 40 余人次,共计鉴定涉案文物及复仿制品 200 余件,起草、打印鉴定意见 21 份。

2006 年第三季度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 生	老 人
首都博物馆	168402	112667	36655	8590	22270
大觉寺	38059	26828	11231	2156	4978
正阳门	闭馆改陈				
徐悲鸿纪念馆	18534	3641	14893	1485	2921
智化寺	14736	10197	4539	1949	2590
辽金馆	2403	0	2403	625	1004
西周馆	6160	0	1751	3130	1279
艺 博	31432	21961	9471		7100
团 城	13238	0	13238	2088	4809
大葆台	10414	0	10414	2186	
大钟寺	20038	13243	6795	2715	2228
古建馆	17926	14196	3730	249	2648
白塔寺	21825	7281	14544	1572	6540
老舍馆	6325	2536	3789	1638	1353
德胜门	41528	35537	5991	1280	1802
石刻馆	12680	11496	1184	461	1184
孔庙国子监管理处	47988	44063	3925	13030	1285

(本表由博物馆处提供)

《北京文博》2006 年 总 目 录

文物工作

- 关于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总结和思考
…………… 梅宁华(2006.1)
- 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首都城市功能的展示
与延续
——总体规划修编后对北京历史名城
保护工作的探讨之二……………
…………… 孔繁峙(2006.1)
-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工作总结及 2006 年
工作要点 …………… (2006.1)
- 关于口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李 萍(2006.1)
- 关于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几个问题……………
…………… 梅宁华(2006.2)
-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中传统四合院胡同的保护
与发展
——对总规修编后北京历史名城整体
保护工作的探讨之三……………
…………… 孔繁峙(2006.2)
- 北京的文物志与文物百科全书……………
…………… 张 展 胡欣慧(2006.2)
- 卢沟桥宛平城文化区的保护与规划构想
…………… 张 量(2006.2)
- 文物保护单位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的作
用及意义
——对总规修编后北京历史名城整体
保护工作的探讨之四……………
…………… 孔繁峙(2006.3)
- 孔庙和国子监建设与发展思路……………
…………… 徐 明(2006.3)
- 北京旧城范围内四合院建筑类文物资源调
查及概况 …………… 董绍鹏(2006.3)
- 浅谈考古学研究与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相互
关系 …………… 郭京宁(2006.3)
- 恢复御河原貌与皇城传统文化理念的发掘
及保护 …………… 孔繁峙(2006.4)

博物馆学

- 浅谈博物馆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
创新 …………… 周正义(2006.1)
- 浅议现行博物馆管理体制对我市文博工作的
影响及其对策 …………… 李学军(2006.1)
- 乘风借势 开拓创新
——北京市 5·18 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
动回顾……………
…………… 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2006.2)
- 搭建国际间博物馆交流平台 展示中国传
统建筑文化
——与加拿大安省皇家博物馆合作的
几点做法和体会 …………… 陈 旭(2006.2)
- 正阳门“北平国货陈列馆”研究 ……………
…………… 夏明明(2006.2)
- 论首都博物馆老北京民俗展……………
…………… 沈 平(2006.3)
- 数字化博物馆研究初探……………
…………… 顾 莹(2006.3)
- 北京博物馆学会奋进与丰收的十年……………
…………… 马希桂(2006.4)
- 博物馆图书资料数字化的途径……………
…………… 周 丹(2006.4)
- 关于异地展览的几点思考……………
…………… 蒋 潇 王鹏远(2006.4)

考古简报

- 地铁四号线圆明园车站考古发掘报告……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06.2)
- 岩上墓葬区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 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2006.3)
- 延庆县火焰山营盘遗址重要发现……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化委员会(2006.3)
- 国家体育馆墓葬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06.4)
-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工作

- 圆满结束
 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2006.4)
 平谷区王辛庄镇西杏园村北的汉代窑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平谷区文物管理所(2006.4)

文物研究

- 房山镇江营西周卜骨与《焦氏易林》
 连劲名(2006.1)
 试说北京现存转轮藏的宗教文化
 李妍(2006.1)
 浅谈法海寺曼陀罗的深刻内涵
 苗天斌(2006.1)
 清代龙袍的十二章纹饰
 孙秋霞(2006.1)
 清代恭王府花园名称考略
 张军(2006.1)
 相邦赵胜戈及相关问题
 杨颺(2006.2)
 北京房山清代金陵考略
 王世仁(2006.2)
 中国古代附属艺术品——囊匣
 王金生(2006.2)
 釉里红瓷器浅探 李宏(2006.3)
 颐和园佛香阁早期建筑及陈设探究
 翟小莉(2006.3)
 万寿寺中路建筑群的五大格局
 孔祥利(2006.3)
 北京宝禅寺大雄宝殿中的藻井
 马英豪 成大生(2006.3)
 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收藏的北京宏
 善寺铜钟 庾华(2006.3)
 修石塘路大水峪五座楼敌台刻石研究
 陈倩(2006.3)
 浅谈新石器时代鸟类形玉器
 虞海燕(2006.4)
 从出土文物看东周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
 联系 胡传耸(2006.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元代铜权
 王燕玲(2006.4)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婚俗文书举要
 李彩萍(2006.4)

北京史地

- 试探无终 韩嘉谷(2006.1)
 北齐长城调查小记 岳升阳(2006.1)
 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
 陈康(2006.1)
 试论五代前期幽州的军事与战争
 郝志群 王新迎(2006.1)

- 明熹宗天启六年地震新考
 于德源(2006.1)
 琉璃河桥维修纪略 孔庆普(2006.1)
 清末民国国家体制的转型与北京寺庙历史
 变迁——以北京外城西部寺庙为例
 何岩巍(2006.1)
 吴佩孚与故宫三大殿 张小林(2006.1)
 唐贾氏家族墓志简析 刘丽玲(2006.2)
 唐任紫宸夫妇墓志考 鲁晓帆(2006.2)
 再论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
 郝黎(2006.2)
 拈花寺谈往 韩建识(2006.2)
 北京东岳庙庙会 解育君(2006.2)
 从卫星遥感照片寻找古河道
 王同祯(2006.2)
 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与桃源观
 张文大(2006.2)
 唐檀州街新考 罗保平(2006.3)
 《北京金代皇陵》序 徐莘芳(2006.3)
 北京金代皇陵历史沿革与墓主人考
 黄秀纯 熊永强 陈亚洲(2006.3)
 北京国子监孔庙进士题名刻石调查
 邢鹏(2006.3)
 从康熙御制诗看孝懿仁皇后
 徐瑾(2006.3)
 八十年来妙峰山民俗研究概述
 齐鸿浩(2006.3)
 北京地区长城概述 张展(2006.4)
 北京先农坛的建筑组群布局与坛内诸神
 董纪平(2006.4)
 阮旻锡及其《燕山纪游》考
 车萍萍(2006.4)

文物保护

- 北京上地出土古菱齿象牙与现场起取保护
 董玉刚(2006.2)
 空调系统造成的室内空气微生物污染
 与对策 刘树林 刘恩迪(2006.4)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2005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
 记 杨康明(2006.1)
 北京市文物局2006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
 记 杨康明(2006.2)
 北京市文物局2006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
 记 杨康明(2006.3)
 北京市文物局2006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
 记 杨康明(2006.4)
 《北京文博》2006年总目录 (200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2006. 4/ 张展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402 - 1816 - 9

I. 北… II. 张… III. 文物工作 - 北京市 - 丛刊

IV. G269. 27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559 号

北京文博(2006 * 4)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定价: 10 元

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

(续八)

北京大学学生宿舍

- 年代：1935年
- 说明：这栋建筑是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体现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早期作品之一。设计人梁思成。该建筑注重功能的合理，建筑形式已成为内部功能的自然反映。它是研究国际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影响的重要实例。
- 地址：东城区沙滩北街乙2号
- 管理使用单位：中宣部宿舍



京华印书局

- 年代：1920年
- 说明：这座建筑位于交通要道一角的道路之间，所以平面为不规则矩形。整个建筑像一艘轮船，俗称“船楼”。它采用当时很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梁柱结构，以获得大跨度的工作空间，主要功能是印刷厂房。建筑外观的造型处理还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但已很大程度地展示现代建筑的主要特征，是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标志性建筑。
- 地址：宣武区虎坊桥北口





ISBN 7-5402-1816-9



9 787540 218164 >

定价: 10元